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巴蜀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13

巴蜀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第13卷 巴蜀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責任編輯 段書安

排版者 北京迅即印刷有限公司

製版者 蛇口以琳彩印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者 東莞新揚印刷有限公司

裝訂者 東莞新揚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九四年六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0-0773-X/J·267

（京）新登字〇五六號

國內版定價 二八〇圓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凡例

一　《中國青銅器全集》共十六卷，主要按時代分地區編排，力求全面展示中國青銅器發展面貌。

二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選標准：以考古發掘品爲主，酌收有代表性的傳世品；既要考慮器物本身的藝術價值，又要兼顧不同的器種和出土地區。

三　本書爲《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十三卷，選錄巴蜀青銅器精品。

四　本書主要内容分三部分：一爲專論，二爲圖版，三爲圖版說明。

巴蜀青銅器概論

趙殿增

中國西南的四川盆地及其附近的廣大區域，古稱『巴蜀』。先秦時期這裏曾建立過『巴』、『蜀』兩大古國，創造出了璀燦輝煌的『巴蜀文化』。近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八十年代的考古新發現，證明從距今三四千年到兩千年以前，這裏已具有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神秘而奇特的巴蜀青銅器，代表了巴蜀古代文明的最高成就，具有很高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

一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青銅器群的發現，轟動了海內外。這裏發現的立人像、人頭像、人面具、神樹、鳥獸等青銅藝術品多達六百餘件。形體碩大、形象奇特、造型優美、內涵深邃，不僅爲中國青銅文化所稀有，而且在世界青銅藝術中也極爲罕見。

巴蜀青銅器的發現與研究，至今已延續了半個世紀。早在本世紀初，一些巴蜀兵器被陸續發現，但當時并不知其爲先秦巴蜀遺物，誤將它當作是『夏式劍』（周偉《中國兵器史稿》等）。三十年代前後，在廣漢月亮灣一帶發現了大批玉石器，并進行了正式的考古發掘，提出了『廣漢文化』的概念，但當時這裏并未發現青銅器。四十年代初期，一批學者陸續來到四川，他們在成都舊貨市場上發現很多形制奇特的青銅兵器，據查多出于成都西北郊白馬寺一帶。衛聚賢等學者在《說文月刊》上公布了這一發現，正式提出『巴蜀文化』的命題。五十年代初，寶成、成渝鐵路建設中，發現了衆多的『船棺葬』，以巴縣冬笋壩和昭化寶輪院墓群最爲重要，不僅明確了巴蜀青銅器的出土狀況，而且開始認識了青銅兵器與容器、印章的時代特徵和組合關係。一九五六年新繁水觀音遺址的發掘，一九五九年彭縣竹瓦街銅器群的發

現，進一步認識了商周時期巴蜀銅器的特點。七十年代之後，巴蜀文化考古掀起了一個高潮，一九七二年在涪陵小田溪發掘了巴王族陵墓，一九八〇年在新都發掘了蜀王大墓，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二年蜀國故都『三星堆古城』的考古新發現，相繼取得重大成果。這一時期還在成都、大邑、蒲江、彭縣、郫縣、廣漢、什邡、綿竹、滎經等地發現衆多船棺葬墓地，在峨嵋、犍爲、蘆山、漢源、寶興以及成都附近發現了大批土坑墓群，其中以成都最爲集中，以綿竹、什邡、滎經、峨嵋、寶興、茂縣等墓群較爲重要。八十年代的文物普查、文物鑒定和搶救發掘工作中，在東起巫山、達縣，西到汶川、石棉，南至越西、會理、瀘州，北到廣元、青川的廣大區域內，都發現了巴蜀銅器，幾乎遍布了四川盆地全境。和四川相鄰的陝西漢中、寶鷄，湖北宜昌、荆州，以及湖南、貴州、雲南、甘肅等省，也都有巴蜀青銅器出土。巴蜀青銅器發現地已達百餘個縣市、數百個地點。可以説，目前已初步認識到歷史上曾存在過這樣一個獨具特色的『巴蜀文化區』，在一千多年的歷程中，形成了巴蜀青銅文化體系。

二

巴蜀青銅器的發展過程，從商代開始，歷經西周、春秋、戰國、秦漢各時期，在西漢中期基本結束，前後長達一千多年。從器物的種類、作風看，巴蜀青銅器可以明顯地分爲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相當于商至西周，以成都平原祭祀坑、窖藏出土物爲主，也包括分布在四川各地的一批商周青銅禮器。典型器物除三星堆大型人像、動植物造型之外，還有以罍、尊爲主的青銅禮器和戈、矛、鉞等青銅兵器，多具有濃厚的宗教祭祀和禮儀性質。後期爲春秋晚期、戰國，直到西漢初期，以各種類型的墓葬中隨葬的青銅器爲主，典型器物爲成套的『巴蜀式兵器』（柳葉劍、三角形戈、烟荷包式鉞、長骹矛）、成組炊容器（鍪、釜、甑）和肖形圖語式的印章。前期後期之間又有密切的文化聯繫，共同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發展序列。

巴蜀青銅器的發展，大致可分爲六個階段。第一階段：商代早期，是巴蜀青銅器的誕生期；第二階段：商代中晚期，是以三星堆爲代表的前期巴蜀青銅藝術鼎盛期；第三階段：西周時期，是巴蜀青銅器的完善期；第四階段：春秋晚期到戰國早中期，是後期巴蜀銅器的形成期；第五階段：戰國晚期，從秦并巴蜀前後到秦統一全國之前，是晚期巴蜀青銅器的擴展期；第六階段：秦代到西漢前期，是巴蜀青銅器的衰變期。前三個階段（商代到西周）爲『巴蜀青銅時代前期』，後三個階段（春秋戰國到西漢中期）爲『巴蜀青銅時代後期』，或稱『晚期巴蜀文化』。

巴蜀青銅器大約起源于商代早期。從殷商時期的三星堆祭祀坑青銅器群高度發達的技術水平和成熟的造型特徵分析，在此之前，巴蜀青銅器已經有一個相當長的產生與發展的過程。目前發現的一些線索，爲探討巴蜀青銅器的起源和早期面貌，提供了寶貴的信息。

一九七六年在三星堆遺址以西的高駢鄉磚廠一個淺坑之中，出土了一組造型古樸的玉石禮器和一件長方形的銅牌飾（原定名『銅嵌飾』）。牌長十二點三、上寬五、下寬七點三厘米。牌身呈圓弧狀隆起，兩側各有一對繫耳。牌面上有鑲嵌綠松石的幾何圖案，自下而上，形狀近似于嘴、鼻、眼、眉和額心裝飾，共同組成了一個獸面形。它與一九八一年河南偃師出土的二里頭文化『嵌綠松石饕餮紋牌飾』的形制、作風大體相似，時代約爲商代早期。同出的玉刀、玉斧、玉矛，也都具有夏商時期玉器的風格，與銅牌的時代特徵相一致。

一九八七年在廣漢三星堆遺址內，又發現了兩件形制相似的銅牌飾，均出土于遺址東北部一個小型器物坑中，同出的還有璧、環、斧、鑿等玉石禮器。其中一件牌飾長十三厘米，爲上寬下窄的長方形，下端呈圓弧狀，兩側有對稱的兩組繫耳。牌面微凸，中軸貫穿，兩側鏤空三對枝杈，組成對稱的圓圈紋、勾雲紋，其間鑲嵌綠松石。整個圖形象一具變形的獸面，以圓圈、枝杈等分別表現眼、眉、鼻、嘴和額飾，圖形趨于圖案化，但總體形態風格仍與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牌飾相似。另一件銅牌飾，長十四厘米，器身兩側有對稱的四個繫耳，正面紋飾進一步圖案化：中央一主干上下貫通，兩側各有五組相互對稱的『S』形鏤空勾雲紋，空隙處用鏤空的三角紋填補。該牌飾獸面紋的形態已不明顯，但仍然有上述諸牌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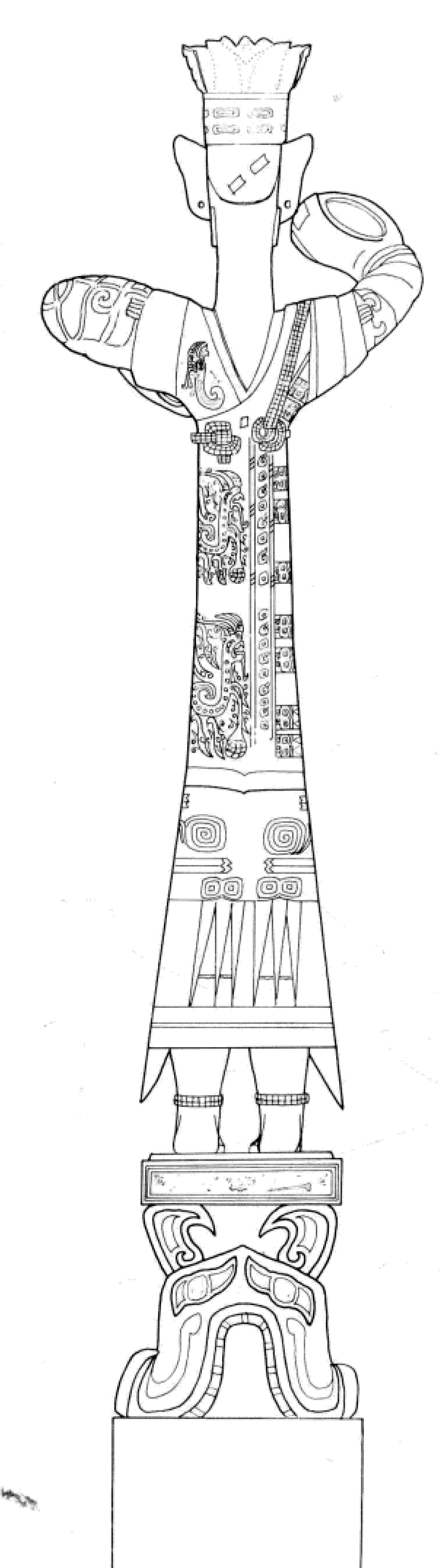
的造型風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李學勤先生從國外收集了九件同類的獸面銅牌飾資料加以排比研究，確定其時代爲二里頭文化晚期到商代早期。他認爲三星堆附近出土的這些銅牌飾屬于同一類型，四川的這些銅牌飾與二里頭文化銅牌飾之間有一定的文化聯繫。四川早期巴蜀青銅器正是在夏商青銅文化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時代約爲商代前期。與銅牌時代相近的巴蜀銅器，還有漢源背後山出土的形制簡約的兵器和工具。如方形銅鉞、扁平式銅斧、銅鑿等。一九五七年新繁水觀音出土的一組兵器，部分學者認爲屬于商代早期，近年十二橋遺址等處的考古發現證明此説是正確的。如銅戈扁平細長，內、闌、援部之間没有明顯的分界，器小體薄，具有早期青銅器的特徵，近似于鄭州白家莊出土的商代早期銅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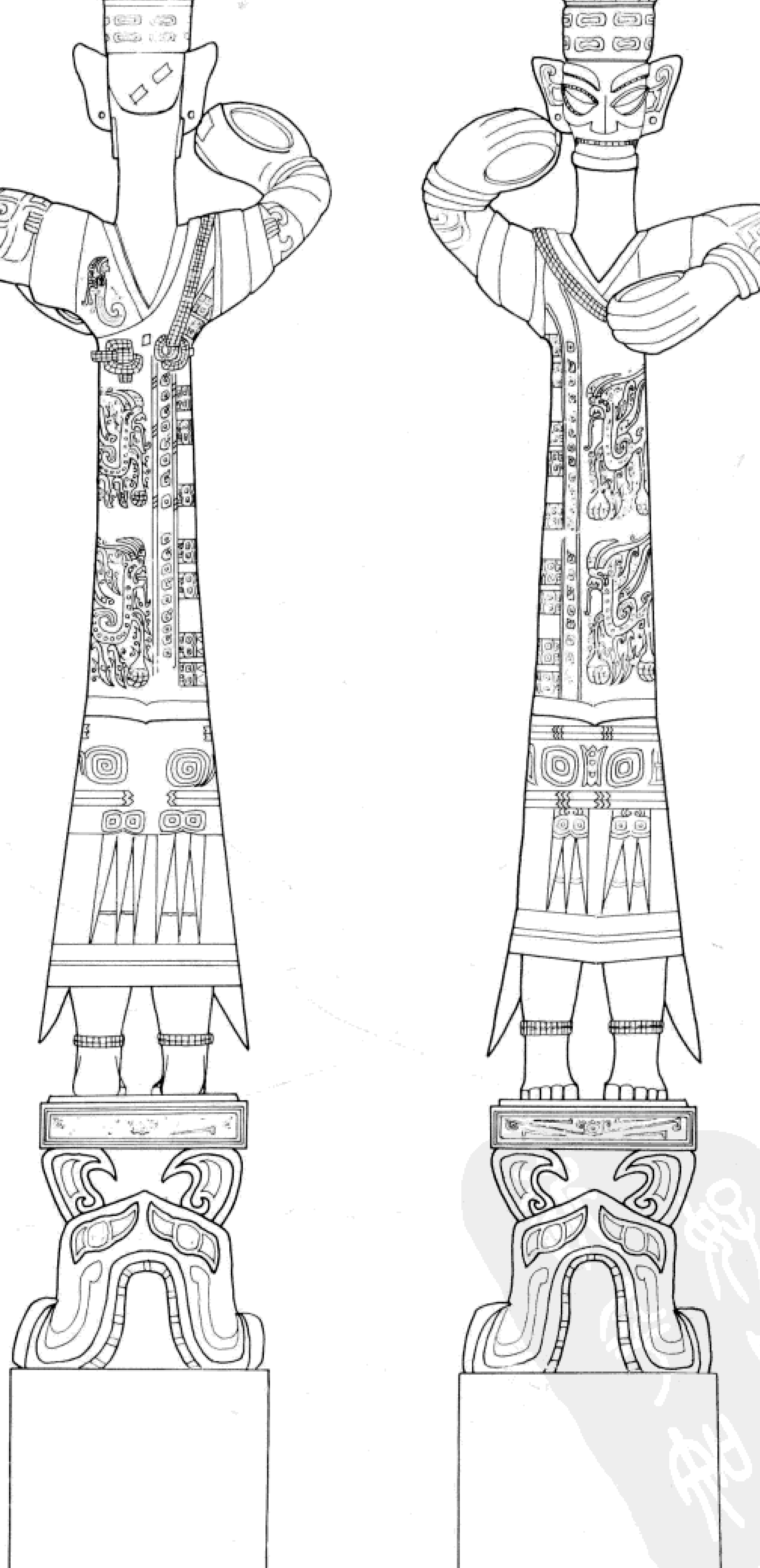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四川廣漢、新繁、漢源等處所出土的青銅器，形制簡單，造型古樸，既有一定的地方文化特色，又與商代早期中原青銅器相近似。因此可以把這組青銅器作爲巴蜀青銅器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年代大體相當于商代早期，即公元前十六至十四世紀。

商代中晚期，商文化與蜀文化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逐步交匯于陝西漢中地區，它們互相撞擊，互相融合，產生了一組形制獨特、紋飾豐富、種類齊全的青銅器。近二十多年來，在漢中的城固、洋縣一帶，發現了衆多的窖藏銅器，出土了五百多件商代中期至商代晚期青銅兵器和禮器。北京大學考古系李伯謙先生將它們分爲甲、乙、丙三組。甲組銅禮器，如尊、瓿、壺等，爲典型的商代中原式青銅器；乙組包括三角援戈、弧刃直內鉞、等腰三角形戈（戣）、長援直內戈等兵器，數量最多，地方特色也比較明顯；丙組爲圓刃方銎人面形鉞、人面具、牛頭形鋪首等。李伯謙先生認爲乙組、丙組爲蜀式青銅器，大部分學者也認爲這些銅器與蜀有關。特別是其中數量最多的三角援戈，已具有典型巴蜀式兵器的基本特徵，可能是巴蜀青銅器的重要源頭之一。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數百件相當于商代中晚期的青銅器，代表了巴蜀青銅藝術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構成巴蜀青銅器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這一時期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是大批青銅人像和動植物等造型。人像有大型立人像（插圖一）、小型祭祀人像和人頭像。其他器類有突目人面具、平目人面具，有獸面和人首鳥身銅像，有大量人眼形飾件，還有龍、虎、

插圖一　立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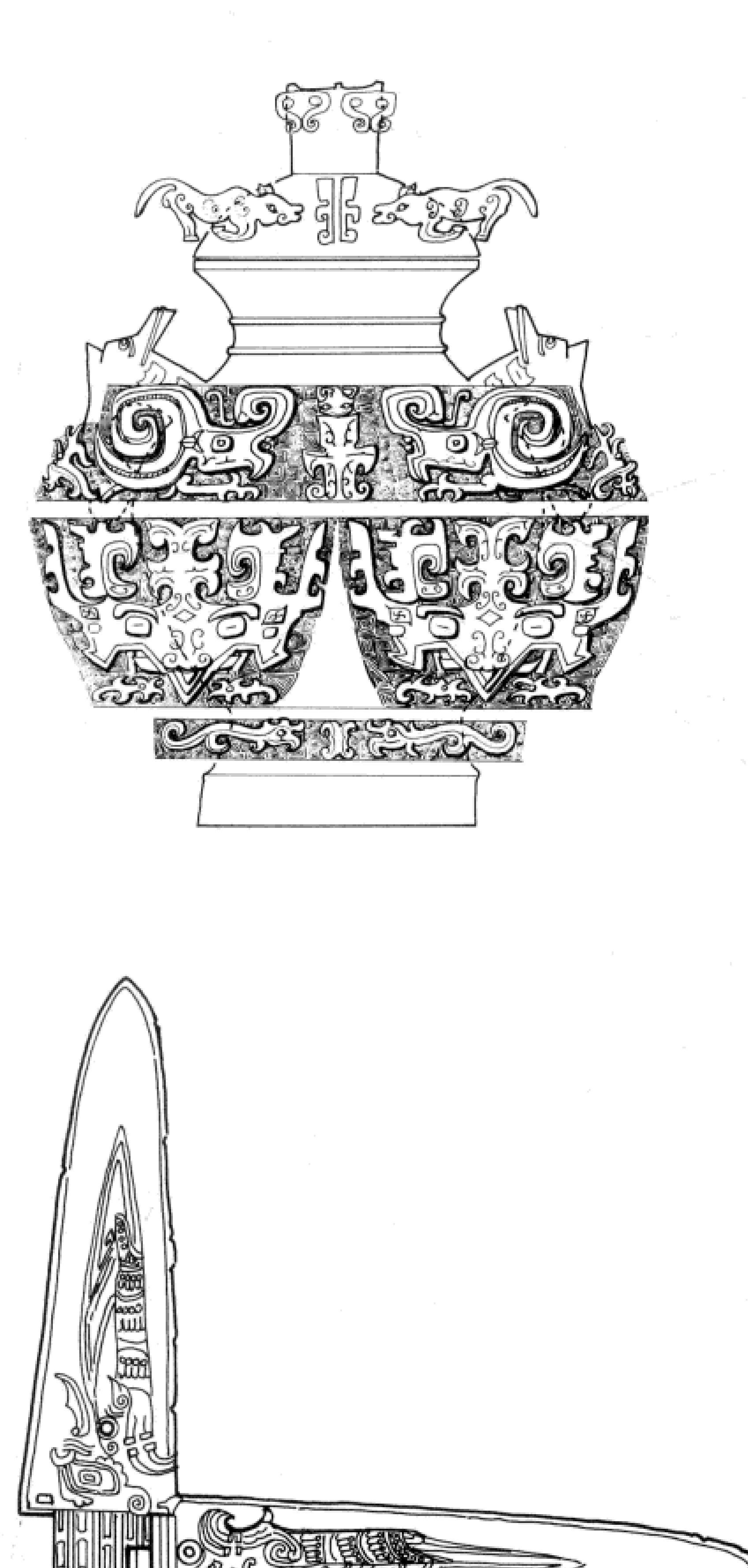


蛇、鳥、鳳、鷄等動物和樹、葉、花、果等植物造型。這批青銅藝術品，形體碩大、造型優美、數量衆多，在東方青銅文化中獨樹一幟。這一時期的青銅禮器，以罍和尊爲主，在借鑒中原同類器物造型藝術的同時，形成和發展了自己的造型風格和裝飾特色。同時出土的鋸齒狀長援戈、方形與圓形瑗、動植物形或獸面紋銅鈴、鳳鳥狀的銅牌掛飾，均有獨特的地方特徵，既反映了其功能上的神秘性，又表現了早期巴蜀青銅藝術的獨特面貌。太陽形飾件等

器物，更有濃厚的宗教意義。這一批用于祭祀禮儀的大型青銅器，是巴蜀青銅器中的杰作，體現了巴蜀青銅文化前期的典型風格。廣漢城西單獨出土的一件銅尊和三星堆遺址西北部出土的一件嵌綠松石銅虎牌飾，均具有商代風格，與三星堆祭祀坑的時代大體相當，爲殷商時代巴蜀青銅器中的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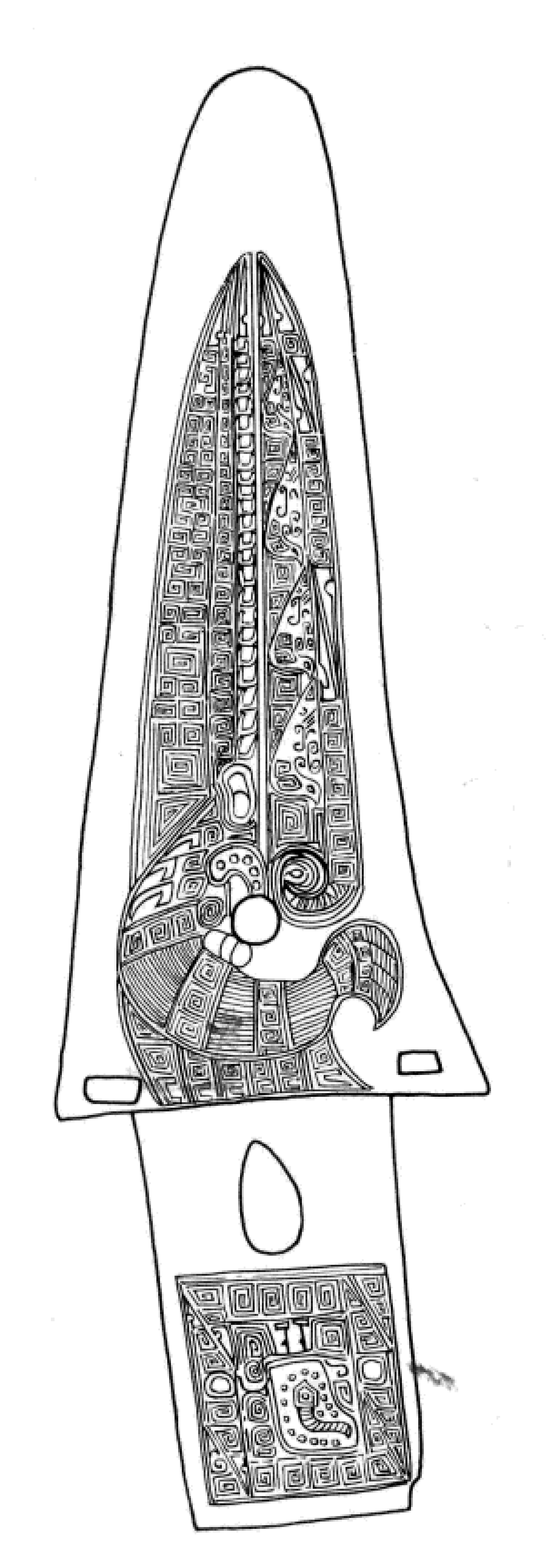
西周時期，以彭縣竹瓦街出土的兩組青銅器爲代表，標志着巴蜀青銅器的發展進入了第三個階段。這一時期的典型器物，是禮器中的罍與尊和兵器中的戈、矛、戟、鉞。罍是這時期巴蜀禮器的核心器物，不僅數量多、分布廣，而且造型宏大、裝飾精美。一九五九年彭縣竹瓦街出土的第一組八件容器中，罍就占有五件。一九八〇年竹瓦街出土的第二組銅器中，四件容器全部是罍，最大的一件人面獸紋罍，高七十九、腹徑四十一厘米，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同組中的象頭飾獸面紋罍、蟠龍蓋獸面紋罍（插圖二）、圓渦紋罍，也都各具風采。

插圖二　蟠龍蓋獸面紋罍



插圖三　鳥紋戟

插圖四　蠶紋戈



竹瓦街的青銅兵器，形成了自己造型精緻、紋樣華麗的藝術風格。銅戈的主要形式是無胡長援，上面飾有精細的鳥紋或獸面紋。銅鉞呈舌形，空銎圓刃，體碩大，飾牛頭等紋飾。銅矛則爲長骹、附耳，葉部寬圓，身飾半浮雕的壁虎紋或蟬紋。此外還有由戈與刺組合成的銅戟，飾鈎喙鳥頭，頗有特色（插圖三）。

在四川各地出土有一些西周前後的青銅禮器，以罍和尊爲主，器物宏大而精美。如巫山縣大昌附近出土的銅尊，與三星堆及湖南、安徽的銅尊很相似，可能爲殷商時期遺物；簡陽出土的銅罍，肩飾圓渦紋，腹飾三角形獸面紋，羊首耳附加圓環，莊重而華麗，時代與竹瓦街銅器相當或稍晚；成都南一環路出土的羊首附耳獸面紋罍，高六十五、腹圍一百六十二厘米，重三十五公斤，肩寬體大，凝重沉穩，肩飾雲雷紋，腹飾垂葉紋，頸部飾斜角勾雲紋，具有西周中晚期的風格。這些大型禮器，基本都是單件獨出。可能是祭祀儀式後埋存的禮器，表明這時巴蜀境內部族方國勢力逐步壯大起來，開始使用自己的青銅重器。成都交通巷出土的一件蠶紋戈，爲無胡長援形，本部略曲，與竹瓦街的銅戈器形相近，爲西周遺物。戈兩面飾繁縟的獸面紋，內上一方形圖案，中部爲一卷曲的『蠶』紋，蠶的發現，對研究當時社會經濟很有價值（插圖四）。

西周時期另一個值得重視的文化現象，是一大批近似于巴蜀風格的青銅器出現在陝西寶

雞地區，集中表現在寶雞茹家莊、竹園溝西周早中期的彊國墓地中出土的兵器和特殊容器上。一些學者將它們定爲『蜀式兵器』，其中僅蜀式戈就有五十餘件，形制紋飾多與漢中及竹瓦街銅戈相似，其中『等腰三角形戈』，是四川晚期巴蜀文化中此類銅戈的祖型之一。特別是竹園溝墓群出土的『柳葉形短劍』，更是晚期巴蜀文化最常見的『柳葉劍』的初期形態。這批銅器已大體包含了典型巴蜀青銅兵器的基本種類和特徵，它對春秋戰國時期廣泛出現在四川盆地及周圍地區的『巴蜀式兵器』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彊國墓地青銅器是巴蜀青銅器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這個彊氏方國，與川西蜀人有着密切的關係，有可能就是古蜀人的一個重要文化分支。

春秋戰國時期，巴蜀青銅器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出現了一些新的典型器物，包括以鍪、釜、甑爲代表的容器和組合完整的各式兵器、工具、巴蜀式印章等。銅尊等大型禮器基本消失，銅罍形制發生較大變化。銅鼎開始出現，但數量不多。埋存形式也從商周時代的祭祀坑、窖藏演變爲以墓葬爲主，包括了船棺葬、木槨墓、土坑墓等形式。從此，巴蜀青銅器的發展進入了『晚期巴蜀文化』階段。時代大約自春秋中晚期起，歷經戰國、秦，直到西漢中期。

從春秋晚期到戰國早中期，巴蜀青銅器進入第四階段，這一時期，也是後期巴蜀青銅器的形成期，典型墓葬主要集中在成都西郊及附近市縣。成都西郊以百花潭十號墓、三洞橋古墓群、白果林船棺葬、羅家碾土坑墓等爲代表。附近市縣則以新都馬家鄉大型木槨墓，大邑五龍四號墓，蒲江、彭縣船棺葬爲代表。晚期巴蜀青銅器的基本組合和典型特徵，到這一時期已比較完備。如百花潭十號墓出土了單耳鍪、釜、連體甑、尖頂尖底奩形盒、柳葉短劍、三角形戈、十字形中胡戈、長方形空銎鉞以及斧、鑿、刀、勺等工具，種類豐富，組合完整。墓中出土的一件『採桑攻戰圖嵌錯銅壺』，刻劃大量建築和人物活動的畫面，還有神奇的動植物圖案。銅壺爲巴蜀本地鑄造，工藝、造型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新都馬家鄉大型木槨墓，有長九點三、寬六點七米的大型木槨和五米多長的墓道。僅在木槨下面一個保存完好的腰坑之中，就存放着一百八十八件精美的青銅器，是晚期巴蜀文化中層次最高、品種最多、

組合最齊的一組青銅器。隨葬的銅器以五件或兩件完全相同器物爲一套。禮器有鼎、壺、罍、釜、鍪、豆、三足盤、匕、編鐘、錇、鑑、甑、豆、敦、甗、盤、匜，兵器有戈、劍、鉞、矛、刀。工具有斧、鋸、鑿、削、斤、雕刀，共有四十三套之多，反映了巴蜀青銅禮器極爲嚴謹的組合規律。它代表了晚期巴蜀青銅文化發展的又一個新的高峰。同墓出土的印章，説明墓主人是最後幾代蜀王之一。

戰國中期，即公元前三一六年前後，秦國兼并了巴蜀。從這時起直到戰國末期，巴蜀青銅器的發展進入了第五階段。這一階段巴蜀雖然納入了秦國的版圖，但由于對這一地區採取的是羈縻式的松散管理方法，巴蜀文化的特色得以繼續保持下來，并有了新的發展，大量出現了以船棺葬爲特徵的墓葬形式。這一時期又由于有不少秦、楚文化因素的傳入，與巴蜀文化互相交融，因而形成了特有的文化風貌。

戰國中晚期典型的巴蜀銅器群，有巴縣冬笋壩、昭化寶輪院船棺葬、綿竹清道的船棺葬、涪陵小田溪巴王陵墓葬群。同一時期的巴蜀墓葬，在全川各地乃至陝南、鄂西、湘西、雲南、貴州等地都有發現。四十年代收集的第一批『巴蜀式銅器』，也基本屬于這一階段的遺物。銅器數量之大、分布之廣、兵器之多、印章之繁，都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從器型特徵看，這一階段基本上延續了戰國早中期巴蜀銅器的風格和組合規律。同時，隨着時代、地域和墓主身份的變化，器型又有一定的發展。冬笋壩和寶輪院的船棺葬中所出兵器，爲寬柳葉形劍，『烟荷包』式空銎圓刃鉞，中長骹或長骹式圓弧刃矛，三角形戈或中胡長胡式戈等。鍪釜多爲雙耳，甑爲上下分體。工具有鑿、斧、削刀、帶鈎等。特別是動物肖形和『巴蜀符號』紋樣的印章大量出現，形狀多樣，印文繁縟，具有典型的時代特徵。新出現的重要文物，有『秦半兩』、『兩甾』銅錢、長胡三穿戈（戟），還有精美的犀牛式帶鈎、琵琶式帶鈎、新型式柳葉劍等。兵器和印章上的『巴蜀符號』特別繁復，也是這時的特徵之一。涪陵小田溪發掘的土坑墓，是秦并巴後巴人王族後裔的墓地，出土的青銅禮器規格高，不少爲精美之作。其中戈、劍、鉞、矛等兵器和釜、鍪、甑等容器與船棺葬出土器物基本相同。新發現的有一組十四件錯銀編鐘和錯銀銅壺、渦紋銅罍，以及虎鈕錞于、鉦、弩機、鏤空雙龍

方鏡，既有戰國晚期的時代特徵，又有川東巴人的地方文化色彩。這一時期在各地出土的巴蜀銅器，基本組合大體相同，也有不少形制、紋飾奇特的精品出現，如滎經、蘆山的數十枚印章，峨嵋符溪的鳳鳥紋戈，廣元的動物紋戈、錯銀銅壺，綿竹清道的嵌錯方壺等，呈現出了繽紛多彩的繁榮景象。

巴蜀青銅器的第六階段，包括從秦統一後到西漢前期，是巴蜀銅器的衰落時期。這時，秦漢政權在巴蜀地區已建立了較穩固的統治，中原文化對當地文化的影響也在增强。秦、蜀、巴、楚文化的相互融合，促使巴蜀青銅器又出現一些高水平的珍品，這一時期船棺葬逐漸減少，長方形、方形等土坑豎穴墓盛行，木槨墓增多，還出現了一種『木板墓』，爲船棺葬向木槨墓過渡的形式。典型的銅器群有羊子山一七二號墓，綿陽木板墓，奉節風箱崖懸棺葬等。以羊子山一七二號墓最爲突出，器物有釜、甑、鼎、罍、匜、盤、鈁、盉、爐，兵器有矛、鏃、弩機，還有鏡、印、帶鈎等。其中約有三分之一保持了巴蜀銅器原有風貌，另有一些是發生演變後的新器型，更多的則爲典型的秦代器物。巴蜀式的柳葉劍、烟荷包鉞已基本消失，僅有長骹矛、三角戈尚有巴蜀兵器特徵。多數兵器如劍、矛、鏃、弩機等，均爲典型的中原形式。禮器中的罍、釜、盤、甑，則是在巴蜀器物基礎上加以變化，吸收了一部分中原風格。大鼎、蓋鼎、三足爐、盉，雖然爲本地製作，但秦漢銅器風格已占主導地位。在用具和雜器中，帶鈎、鋸、鏡上還有巴蜀文化餘韻，加之盤、罍、印章上尚有的『巴蜀符號』，表明羊子山一七二號墓仍屬于巴蜀文化的範疇。這一時期綿陽、綿竹、犍爲、成都等處的銅器群，巴蜀式兵器還占主體，但中原銅器的比重也在不斷增大，『巴蜀符號』紋飾和印章減少或消失，漢字印章占主體，還出土有『八銖』、『四銖』等漢初半兩銅錢。例如奉節風箱崖懸棺葬隨葬品中，既有寬刃柳葉劍、方形斧等巴蜀銅器，又有新型式劍、鵝形帶鈎等中原式銅器，還出土一件典型的西漢文帝『四銖半兩』銅錢，其時代已到了西漢前期。其中一件精美的雙獸紋鎏金銅帶鈎，可以説是巴蜀青銅器消失前的一縷餘輝。到漢武帝前後，政治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全國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各地文化經歷了一次大融合，巴蜀文化最終匯入了漢代文化的大潮之中，巴蜀青銅器也結束了它一

千五六百年的發展歷程。

三

巴蜀青銅器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比較獨特的形制特徵。從總體面貌看，巴蜀青銅器是在中原等地的影響下產生發展起來的，各時期各類型器物的形態，無不受到外界特別是中原的影響。但古代巴蜀先民在模仿鑄造這些器物時，精心注入了自己的審美觀點和使用習慣，留下了清晰的風格印記。無論是莊重神聖的禮器，大量使用的兵器，還是生活中的炊容器，勞作時的工具雜器等，都反映出了特有的風格。與此同時，巴蜀先民也不斷創造出風格獨特的青銅器造型，尤其是在人獸雕像方面，更具有鮮明的個性。根據器物的功能、形制、時代特徵，巴蜀青銅器可以分爲人獸雕像、禮器、炊容器、兵器、工具雜器、印章、樂器等七大類。

（一）人獸雕像類

殷商時期，以三星堆爲中心的古蜀王國，在進行祭祀活動中大量使用了青銅器，由此出現了一大批人和動物、植物的立體塑像和人獸形狀的飾件，成爲早期巴蜀青銅器特有的典型器物。

青銅人獸雕像主要出土于廣漢三星堆遺址一、二號祭祀坑中。在其他一些與蜀文化有關係的青銅器群中，如寶鷄𢐗國墓，漢中城固、洋縣銅器群，以及成都、茂縣等地的古墓葬中也有零散發現。人形、獸形飾件則在商周及以後的青銅禮器上長期採用，常常表現爲罍、尊等禮器和戈、矛等兵器上的圓雕與浮雕的人面、獸面或龍、虎、牛、羊形裝飾，形成了豐富多彩的人、獸、花、果等紋飾，在巴蜀青銅器上展現出來。

巴蜀青銅器雕像，包括人像、動物塑像和植物造型三類。人像是巴蜀青銅器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目前出土的共有一百多件。屬于全身人像的有大型立人像一件，踞坐、長跪、側跪或直立奉物的小型人像等數十件，均呈某種祭祀姿勢。人頭像共五十多件，與真人大小相

仿，以方臉、平冠、獨辮垂于腦後的頭像爲主，占人頭像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另外還有圓頂戴飾件、臉型圓潤的，圓頭長臉挽髮插簪的，將長辮盤繞頭頂的，面部用金箔粘貼，即戴有金面罩的。形式各異，精美絶倫。人頭像頸部均作倒三角形，推測原來可能均組裝在木質的身體上。

人面具是另一類數量較多的塑像作品，共有三十多件，其基本器型是用銅鑄成一個半圓筒狀的面殼，用以表示人的臉部。臉側有四個榫孔，用以將面具組裝在圓柱形的物體上。面具的大小不等，大多數比真人頭部要大得多，最寬的達一百三十八厘米，一般的寬也有四十—八十厘米。從眼、耳、臉型來看，可以分爲突目尖耳方臉型、平目寬臉型、平目方臉型和長臉直耳型等幾種。這些面具與人頭像、立人像的寫實風格有較大的區別，具有特殊的用途與功能。所有人像的眼睛十分醒目，人頭像的眼睛一般均爲菱形，外眼角上翹，眼球起突棱，與又寬又粗的濃眉相配合，威嚴而神聖。突目型人面具的眼睛碩大，眼球瞳孔呈圓柱狀嚮前伸出，格外引人注目。祭祀坑青銅器中還有數十對眼形飾件，包括菱形、三角形、勾雲形等多種。勾雲形眼飾上部，還有彎曲的濃眉飾件與之相連。眼形飾件四角均有小孔，以便組裝在其他物體上。除此之外，還有一批泡狀飾件，包括圓柱形、圓角方柱形等，邊緣均有榫眼。這些泡狀飾件與突目型面具的瞳孔形狀大體相同，是爲突出人眼瞳孔而專門製作的特殊構件。

獸面具呈扁平片狀，四角有小孔，以便捆繫或組裝在其他器物上。獸面爲一種圓眼、翻鼻、寬口、方牙、頭上長角的怪異形象，猙獰而威武。

獨立的青銅動物塑像，包括有龍、虎、蛇、鳥、鷹、鷄等，每種動物又有許多不同的形態式樣。如龍形飾件有爬龍柱形器、方頭形龍飾和攀援于樹上的辮索狀長龍。鳥則有鈎喙大鳥頭、鳳鳥和樹枝上的立鳥等。除三星堆以外，茂縣、成都及陝西等地也有一些獨立的動物雕像發現。

立體的植物造型，以青銅神樹爲主體。三星堆出土的銅樹有的高達四米，有的高兩米，上有一些纖細的銅樹枝條。樹上有鳥、龍、果實、掛飾等立體飾件。

這些以人像和動物、植物造型爲主體的青銅製品，構成巴蜀青銅器區別于其他青銅文化的一個顯著特徵。

晚期巴蜀青銅器中獨立的人像、動物、植物造型不如早期多，但也有一些比較精美的立體動物形銅器，如虎、蛇、鹿、蟬、犀牛形的帶鈎等等。這時，更多的動物形象是以動物形裝飾的方式出現的，形象有羊、牛、龍、虎、象、鳥等等，造型頗具地方特色。

（二）禮器類

巴蜀青銅器中的禮器，數量比較少，種類也不如中原商周青銅器豐富。這些禮器，基本上是仿照中原等地的同類器物鑄造的。從商代早期巴蜀青銅器開始階段，直到戰國秦漢時期都是如此。但這種仿製并不是機械地照搬，而是經過自己的選擇、改造和創新，使器物種類、形態特徵、裝飾花紋，都具有濃郁的巴蜀文化風格。從這種意義上説，這裏的大多數禮器已經構成巴蜀青銅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巴蜀青銅器的特色。

商周時期巴蜀地區的禮器以牌飾、罍、尊爲主體，均是吸收中原禮器而形成的器形。而商代盛行的其他禮器，如鼎、鬲、甗、爵等則没有出現。牌飾爲長方形，正面圖案是一種變形的獸面紋或幾何形紋，這是一種仿二里頭文化的早期形態的青銅禮器。罍是巴蜀青銅器中數量最多、使用時間最長、紋飾也最繁縟的一種禮器，它在巴蜀統治者心目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各時期的罍器形變化也比較大。商代晚期的罍爲直口、折肩、直腹、高圈足，肩部飾羊與鳥，腹部及圈足上飾獸面紋。西周時期罍器形最多，紋飾也最豐富。以彭縣竹瓦街出土的罍爲代表，如人面獸紋罍，通高達七十九厘米，蓋鈕飾四組獸面和一蟠龍紋，蓋頂器身飾跪人和跪牛作祭祀狀，四耳和肩中部飾牛頭紋。象頭飾獸面紋罍，從頂鈕到圈足有四條寬大的勾雲紋狀扉棱，蓋、身飾獸面紋，雙耳爲圓雕象頭，華麗而精巧。蟠龍蓋獸面紋罍，蓋頂盤卧着一條粗大的短角龍，罍肩和雙耳飾四個立體羊首，器身飾精細的獸面紋。羊首耳渦紋罍，通高六十八厘米，蓋身、足上有四條扉棱，蓋頂與肩上各有漩渦紋，雙耳爲立體的盤羊頭。此外還有四渦紋罍、六渦紋罍等。成都、茂縣等地出土有一種寬體銅罍，器形爲侈口、束頸、寬折肩、斜腹、圈足外撇，雙耳作牛首狀，身飾夔龍紋。春秋戰國時期巴蜀禮器中仍

多使用銅罍，但形體有較大變化，紋飾也趨于簡約。如新都大墓及成都、茂縣、汶川等地經常出土的一種渦紋罍，爲方唇、短頸、折肩、斜鼓腹，肩上飾渦紋，腹部飾獸面紋，雙耳爲牛頭，是晚期巴蜀文化中的典型禮器。另一種四環鈕渦紋罍，蓋上及肩上各有四個對稱的豎環耳，器身爲斜肩、鼓腹、小圈足，體形呈圓球狀，身飾渦紋及雲雷紋，流行于戰國中晚期巴蜀墓中。

銅尊是巴蜀地區另一種數量較多的禮器，集中出現于商周時期，到春秋以後便已消失。商代主要流行高領大口的獸面尊，口呈喇叭狀外侈，束頸，寬平肩，深垂腹，高圓足。肩部多飾有龍、虎、牛、羊、鳥等立體飾件，腹部與圈足多飾獸面紋，器身上常有扉棱。除廣漢三星堆出數十餘件銅尊之外，巫山大昌壩等處也有這類銅尊出土。巴蜀地區另外有一種獸面紋尊，出土于廣漢和彭縣竹瓦街等地，器形爲圓筒狀，侈口、長頸，中部突起，飾獸面紋，圈足呈喇叭狀外侈，近似于觚的形狀，爲商周時期的遺物。

巴蜀青銅時代後期的禮器有了很大變化，主要禮器多爲新出現的器形，而且組合規律也有了較大的不同，形成以鼎、壺、敦、甗、鑑、缶爲主的青銅禮器。其中又以新都大墓腰坑中出土的青銅禮器最爲完整，最具有典型意義。這套銅器中以鼎、壺、罍、敦、豆、甗、缶、鑑等最爲重要，此外還包括兵器、工具、炊容器、樂器等巴蜀式銅器，也被作爲禮器使用。巴蜀地區鑄造的銅鼎大約出現于春秋戰國之際，最初的形式是一種提手環鈕、深鼓腹、矮蹄足的有蓋鼎，出土于成都、茂縣等地，上面多飾幾何紋、雲雷紋，類似于春秋楚器。成都百花潭戰國早期墓出土的雷紋鼎，則與洛陽所出銅鼎相似。新都蜀王大墓出土一套列鼎，大小五件，形制相同。最精美的一件爲凸蓋、扁圓腹、門形附耳、長獸蹄足，鼎足殘斷并經修復。蓋上有『邵之飤鼎』四字銘文，爲典型的楚器。其他四件均是仿照此鼎由當地鑄造的，紋飾、質地均遠不及『邵之飤鼎』，而具有明顯的地方特徵。蜀王以這種方式組合而成的列鼎作爲重要禮器，不僅反映了後期蜀王與荆楚地區有密切的歷史關係，而且是巴蜀青銅禮器仿外來禮器傳統作法的集中體現。到戰國晚期之後，巴蜀墓中隨葬的銅鼎更與中原銅鼎相似了，如羊子山一七二號墓出土的蟠螭紋大鼎和素面小鼎，均是典型的中原式樣。

插圖五　雲紋壺



銅壺在晚期巴蜀青銅禮器中數量最多，分布也比較普遍。圓壺多爲直口、長頸、圓鼓腹、矮圈足，有些肩上有鋪首銜環雙耳，壺蓋微凸，上面常有三個或四個鳥形器鈕。這類銅壺中有些爲素面，有些則刻劃或嵌錯出華麗繁縟的花紋。如涪陵小田溪、昭化寶輪院出土的嵌錯雲紋壺，花紋纖細而精美（插圖五）。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嵌錯銅壺，飾有宏大的舞樂攻戰場面。這件銅壺一般認爲是本地鑄造的，但工藝技術則是外地傳入的，很可能是外地工匠到蜀地製作的。從畫面分析，還增加了一些具有地方風格的舞樂內容，從新都大墓出土的圓壺來看，這種圓壺曾有棕繩之類的提梁。綿竹清道船棺葬中，出土有一件銅鏈提梁壺，壺身上有蟠虺紋、垂葉紋、聯珠紋、龍鱗紋等精美的紋飾。除了球形腹的長頸壺之外，巴蜀地區還出現一種平蓋、短頸、斜肩、鼓腹、矮圈足的四耳四鈕銅壺，如新都大墓所出的II式壺，地方風格更爲明顯。方壺也稱爲鈁，常出土于戰國時期巴蜀墓中，而且有些是花紋精美的珍品。如新津出土的嵌錯雲紋方壺、成都羊子山出土的鳳鳥紋方壺等等。

戰國時期巴蜀青銅禮器中的缶、鑑、敦、豆、甗等，數量不多，器形多借鑒于中原同期禮器，但質地和花紋上仍有濃厚的巴蜀風格。如綿竹船棺葬中出土的一件銅豆，從器蓋到器身均嵌錯出虎紋和雲雷紋，華麗而生動。

（三）炊容器類

商周時期巴蜀青銅器主要用于祭祀禮儀之中，生活中使用的炊容器仍以陶器爲主體，没有日常使用的銅炊容器發現。這可能是由于銅材貴重稀少，也可能與青銅器在當時的神聖地位有關。春秋戰國前後的晚期巴蜀文化階段，新出現了一組青銅炊容器，主要是鍪、釜、甑三種，這些銅器均爲素面，出土時底部常有烟熏的痕跡，顯然是日常使用的生活器具，藝術價值不高。但這些器物具有典型的地方特徵，出土的數量多，分布的地域廣，成爲研究巴蜀青銅器及其所反映的歷史文化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它們與巴蜀式兵器、日用陶器一樣，是區分巴蜀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一個重要標志。這組炊容器的器形特點，也與同時期巴蜀地區常見的同類陶器相同。銅鍪的數量最多，基本形狀爲侈口、束頸、斜肩、圓鼓腹、圜底，肩部有一至二個豎環耳。從器耳來分，有素面半環耳、條帶單環耳、繩索紋單耳、繩索

紋雙耳，或一大一小的雙耳等幾種類型。銅鍪大約產生于春秋時期，流行于戰國前後，消失在西漢時期，分布地點以四川盆地爲主，後期傳入秦楚等地，對秦文化的發展有一定影響。各時期鍪的演變過程大體是從素面半環耳到單環耳，再到雙耳。銅釜的形狀特點是平沿、折頸、扁圓鼓腹、圜底，有些上腹部有一對豎環耳。銅釜的數量和分布範圍與銅鍪大體相當，產生和流行時代也相近似，可能是配合使用的一組炊器。巴蜀地區銅甑也比較多，這是一種釜和甑的組合體。下部爲一個圜底釜，上部爲一個有箅孔的銅甑。出現和使用年代與鍪釜相當。早期的銅甑多爲上下連體，晚期的則爲甑釜分體，而且增加了支脚和環耳等附件，使用起來更爲方便。

晚期巴蜀青銅器中還有一些地方特徵明顯的日常用具。如尖底盒（也稱奩形器），由尖頂的小蓋和尖底的小盞相扣合而成，器身常常刻劃有密集的蟠虬紋或雲雷紋。這種器物在其他地區未發現過。從器形分析，它是由早期巴蜀陶器中常見的尖底盞演變而來的。這種小陶盞常常扣合在一起，作盒使用，由此而發展成這種青銅尖底盒。又如涪陵等地曾出土過淺盤尖底喇叭形小圈足豆，與巴蜀地區盛行的矮圈足豆完全一樣，成爲巴蜀特有的青銅器類型。日用銅器中的盆、豆、盤、匜、舟、燈臺等等，也多在吸收中原器形的基礎上，增添了巴蜀的風格特徵。

（四）兵器類

在常見的巴蜀銅器中，以兵器數量最多，特徵最明顯。過去所稱『巴蜀式銅器』，主要是指兵器而言。巴蜀兵器的特殊之處，一是表現在器形上，一是表現在紋飾符號上。器形主要包括有戈、矛、鉞、劍四大類，還有一些戟、鏃、刀、弩機等。紋飾以動物紋爲主體，尤以巴蜀符號最爲獨特。各類兵器器形特點都比較明顯。

戈是巴蜀地區使用時間最長、數量最多、器形變化最大的一種兵器，從商代前期開始出現，一直延續到秦漢初期，貫穿整個巴蜀青銅器發展的始終。分布地點遍及全川及附近數省，幾乎所有出土巴蜀銅器的地方都有銅戈出現。出土數量初步統計達數千件。主要器形分爲直內長援形、三角形、十字形和中胡形四種。這四種戈出現的時間略有不同，前兩種較

早，出現于商代早中期，後兩種出現于春秋戰國時期。但每種戈都一直延續使用到了戰國前後。從新都蜀王大墓出土的成套兵器看，四種戈都被作爲蜀式戈的標准器形，在晚期巴蜀文化中常常是四種戈配合在一起使用的。直內長援戈的變化較大，以商代早期新繁水觀音出土的平片無穿戈開始，到商代晚期廣漢三星堆出土的齒刃戈，再到西周時期彭縣竹瓦街出土的獸面長援戈、戰國早期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斜內長援虎頭紋戈、戰國中期新都大墓出土的直援虎紋戈，形成一個遞次演進的發展序列。三角形戈出現于商代中晚期，這種器形是從漢中的三角形戈發展而來的，到西周時期形成彭縣竹瓦街的方內三角援獸面紋戈，再到戰國時期峨嵋、重慶等地的三角援鳥紋戈，新都大墓的三角援獸面紋戈，也具有大體連續的發展序列。十字形戈出現較晚，約在春秋時期，以簡陽糖廠出土的龍紋十字形戈和新都大墓出土的虎斑紋十字形戈爲代表，主要使用于戰國前後。中胡戈出現于春秋時期，是仿照同時期中原地區的中胡三穿圭援戈製造的。可能是由于這種形式的戈便于捆綁牢固，而中胡圭援戈適宜于在多丘陵山地進行短兵搏擊，所以此類中胡戈進入巴蜀後便很快流傳開來，并且長期使用。在戰國時期，它取代了長援戈和三角形戈，成爲蜀戈的主要形式。與中原中胡戈相比，蜀式中胡戈的援刃呈圓弧狀。胡上有刃，亦呈圓弧狀。中脊突出，闌部多飾浮雕的虎頭，援、胡、內上多有巴蜀符號和文字。

矛是巴蜀地區另一種常見的兵器，使用的時代也是從商代早期一直延續到戰國秦漢時期。巴蜀式矛的主要特點是矛葉寬扁，矛骹細長，直達矛尖，骹兩側有一對弓形或弧形繫耳。在新繁水觀音和城固蘇林出土的商代銅矛之上，已經出現了這種寬葉、長骹、繫耳矛的初期形式。彭縣竹瓦街出土西周時期的寬葉長骹壁虎紋矛，形成了典型的巴蜀風格。彭縣致和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的菱形矛、蛇紋矛、蟬紋矛，是從早期形式向晚期形式的過渡式樣。新都大墓出土的戰國中期長骹矛，可以作爲晚期巴蜀式銅矛的標准器。在銅矛的骹部，也多刻有奇異的巴蜀符號紋飾。

鉞也是巴蜀地區長期使用的一種兵器。除商代早中期有一些直內式方體鉞以外，巴蜀式銅鉞基本上都是有銎圓刃式。從新繁水觀音、漢源背後山出土的商代早中期的半圓形鉞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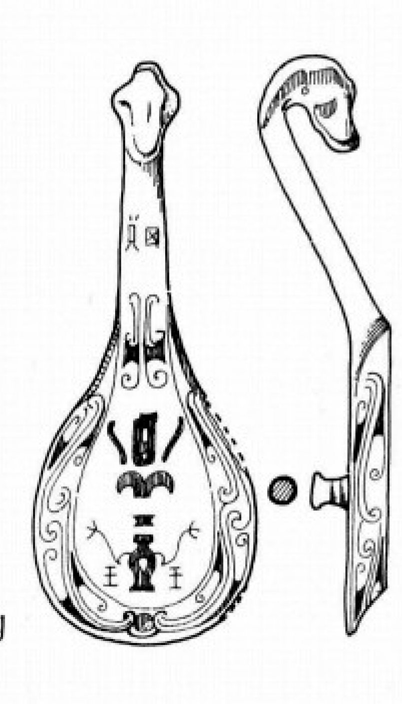
始，發展到西周時期彭縣竹瓦街出土的素面鉞、牛首紋鉞，到春秋戰國時期演變的平肩圓刃鉞（又稱烟荷包式鉞）。特別是戰國時期方體、長體、圓體折腰等各種形式的烟荷包式鉞，是典型巴蜀兵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新都大墓到船棺葬，再到小型土坑墓中，均有發現，數量之多僅次于戈與柳葉形劍。

巴蜀式銅劍的基本器形特徵爲扁平無格，器身呈柳葉形，柄端有穿。這種劍最早產生于商周之際，如在成都十二橋商周遺址和寶鷄西周初期𢐗國墓地發現過這種柳葉形短劍。到了戰國前後，柳葉劍大量使用，基本形狀又可分短劍和長劍兩類，數量衆多，成爲巴蜀最主要的短刃兵器，劍上多鑄有巴蜀符號和虎斑紋。從新都大墓出土的完整柳葉劍可以看出，劍柄先用木板夾緊，再用銅套包裹，套外用細繩纏繞，最後再髹黑漆。這種組裝加工的方法與形式，與寶鷄竹園溝出土柳葉形短劍的裝柄情況如出一轍，反映了兩者之間的淵源關係。巴蜀式短劍還常有花紋精美的劍鞘，特別是一種卷雲紋雙鞘劍，具有濃厚的地方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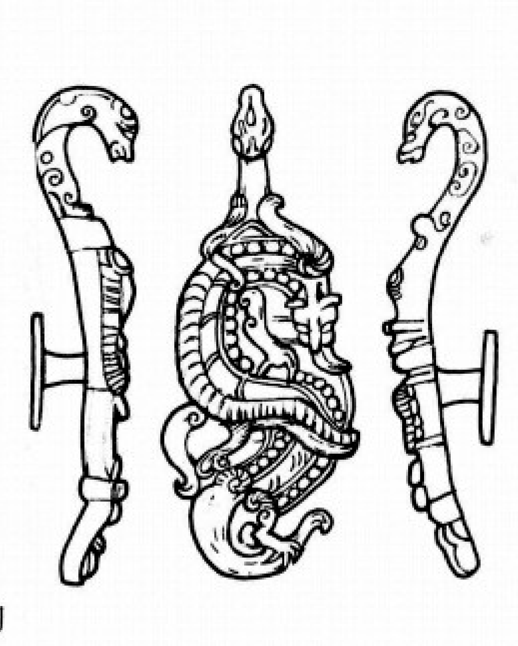
（五）工具雜器類

青銅工具發達也是巴蜀銅器的特徵之一。從新都大墓出土的成套青銅工具看，種類齊全，數量較多，製作技術臻于成熟，包括有斧、斤、曲頭斤、鑿、削、鋸、雕刀等，每種均爲五件一套，共有十二種六十件，均被作爲蜀王的禮儀用品，而被鄭重地隨葬在墓中，可見銅工具在巴蜀文化中影響之大。這種注重銅工具的傳統，從商代早中期即已開始形成，如漢源背後山、新繁水觀音等處均有商代銅鑿、銅削出土。西周時期也常有斧、錛等工具出現。這些工具都具有當地的特有風格，除了常常刻有巴蜀符號之外，斧、斤、鑿等多爲空銎、細身、窄刃、長條形，尤以曲頭斤較爲特殊。削刀多爲寬體曲刃式，數量也不少，可能與當地需常用它來削剥竹器有關。雕刀是巴蜀地區較爲獨特的工具，常常裝上木柄或纏繞細繩使用。鋸在巴蜀地區使用較早，分布也較廣。包括有單面鋸和雙面鋸兩種，從新都大墓出土銅鋸看，鋸條是裝在曲柄木架上使用的。

巴蜀青銅器中還有勺、匕、鏡、帶鈎等日用雜器，多出現于戰國前後巴蜀墓中。勺與匕首的形制可分爲長柄淺勺式或曲柄圓斗式、銎柄深鏟式等。勺身上常有幾何紋、花鳥紋和巴



插圖六　帶鈎



插圖七　帶鈎

蜀圖語式的圖案符號。銅鏡不太發達，主要是仿中原的重輪弦紋鏡、連弧紋鏡，以圓形鏤空、方形鏤空龍紋鏡較爲特殊。帶鈎出土數量衆多，器形有鵝首形、琵琶形、蛇形、龍形、虎形、鹿形、犀牛形、雙蜥形等，紋飾也十分精細，包括大量使用的金銀錯等技術，工藝水平相當高（插圖六、七）。

（六）印章類

戰國前後的巴蜀墓葬之中，多有印章出土。初步統計，各地已發現有數百枚之多。形狀以圓形爲主，也有不少方形、長方形、八角形、半月形等異形章。背鈕則分爲橋鈕、鼻鈕、獸鈕等。印背有平臺狀、覆斗狀、博山狀、連弧紋鏡狀等。其中新都蜀王大墓中出土的饕餮紋方印最爲精緻。這些印文多爲巴蜀符號和圖案，明顯區別于其他地區的銅印。新都蜀王大墓出土的大方印章，印文下方爲男女兩個裸體人像，一手叉腰，一手交臂，共同抬着一個侈口雙耳大罍，人頭上方各有一口部朝上的鐸。上方正中，有一個十字形的圖案，與兵器、工具上的標記圖案相似，可能是開明氏族的族徽。這枚大印不僅紋樣生動豐富，而且具有深刻的社會內容，大約是代表蜀王王權的印璽。其他印章之上，也常常出現心、手、星、月、雲氣等圖案和一些不明其意的奇特符號，還有一些虎、鹿之類的動物圖形，晚期巴蜀印章中又有一些漢字夾雜其間，各自表達了一定的含義。這些形制、印文都十分奇特的印章，構成了巴蜀青銅器又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七）樂器類

巴蜀青銅器中的樂器數量不太多，器形多仿製于中原等地的同類器物，但造型與紋飾有自身的特點。主要種類有虎鈕錞于、長柄銅鉦、銅鈴、鎛鐘、甬鐘和編鐘等。

錞于是戰國前後巴蜀地區十分流行的樂器。頂上多鑄有一圓雕虎形懸鈕，虎昂首翹尾，矯健威武。虎鈕四周常刻有巴蜀符號圖案。這種虎鈕錞于多發現于川東、鄂西、湘西地區，這裏是古代巴人活動的中心，很有可能是巴人特有的一種樂器，同時成爲巴族的一種重要禮器，長柄銅鉦的時代與分布地區和錞于大體相同，器身正中也多鑄有巴蜀符號圖案。如涪陵小田溪巴王族墓中，就出土有一套虎鈕錞于和雲紋銅鉦，可作爲巴人的典型樂器。銅鈴出現

的時間比較早，在三星堆商代祭祀坑中即有各種形狀的銅鈴發現，包括扁桶形、圓柱形、花蒂形、鷹鳥形、獸面形等。晚期巴蜀青銅器中也常有一些素面的小銅鈴出現。鎛鐘、甬鐘、編鐘均是仿中原等地樂器製作出來的，有些經過改造已具有相當濃郁的巴蜀文化氣韻，如扁體甬鐘，枚的位置收縮到上方，甬上還常鑄有巴蜀符號。這種鐘在四川各地多有發現，成爲具有巴蜀風格的典型樂器。涪陵小田溪出土的一組嵌錯銅編鐘，共計十四件，形制爲標准的楚器。同出有四件獸頭，爲懸掛編鐘的簴、虡上的飾件，上面有錯銀雲紋，其中三件刻有巴蜀符號。這組精美的樂器是巴蜀與荆楚文化相互交流的產物。

四

巴蜀青銅器在相對獨立的發展歷程中，孕育了自己奇特新穎的藝術風格，創造了巴蜀文化的美學傳統，成爲古代東方藝術中的一朵奇葩。

注重人像和動植物形態的塑造，是巴蜀青銅藝術首要的，也是最顯著的特點。這種藝術傳統在巴蜀青銅器各時期的器形、紋飾中都有充分的體現，殷商時期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銅人像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一九八六年七月至九月，在三星堆遺址的兩個祭祀坑中，出土了各種人像藝術品一百多件，體現了三千年前巴蜀文明古國的光輝藝術成就。這一龐大的青銅雕塑群，採用了高度的寫實手法，同時又根據不同的功能與需要，運用了適度的誇張技巧，達到了形似與神似的有機結合。它是中國古代三千年前造型藝術的杰作，被認爲是『比有名的中國兵馬俑更加非同凡響』。

大型青銅立人像通高二點六二米，爲中國銅器時代最大的青銅人像之一。銅像身高一點七二米，下部爲高零點九米的基座，分三層：下層是正方梯形的臺基，可能表示爲壘砌起來的祭壇；中層是四個變形獸頭連接而成的鏤空支座，從側面看像是四個長鼻卷翹的象頭；上層爲正方扁平臺，四面飾雲雷虬龍紋。高大的基座不僅象徵着主祭者的神壇，而且還大大抬高了立人像的視角，增强了它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和高尚威嚴的氣度。銅人赤足立于臺上，

脚踝佩戴環鐲，身穿三層華衣。外層爲方披，斜肩右袵，袒露左臂，用粗繩繫結于背部。方披上飾有四組龍紋，龍爲方首，身體卷曲，龍爪碩大。中層華衣的襟角尖長，恰似燕尾。內層長裙過膝，衣上飾六組側置獸面紋。內衣從袖口處層層顯露，衣袖翻卷，肩腕部刻飾人眼形勾雲紋。銅人雙手碩大，左手齊胸，右手平肩，雙手均呈圓環形作執物狀，原插有粗大的柱狀物或旌旗之類的神器，似在指揮盛大的祭祀活動。銅人頭戴雙層高冠，下層爲扁圓硬冠，飾雙環回紋，上層爲羽狀花冠，冠側面亦有人眼形紋樣。人的五官位置准確，比例誇大。濃眉寬粗，眉角上揚。眼爲菱形，目光前視。顴骨突出，鼻梁挺直。嘴大唇厚，嘴角咧至耳根。兩耳尖長，耳輪飾勾雲紋。耳垂有孔，應掛有耳墜之類的飾物。銅人臉型瘦削，下頜方正，絡腮短鬚。面容肅穆威嚴，虔誠執著，兩眼直視手中所握的神器，把人們的視點也集中到了雙手之上。這尊青銅立人像無論是造型裝飾，還是神態氣勢，都達到很高的藝術水平。

銅人頭像是一組形狀各異的圓雕人像，共計五十四件。其中絕大部分頭像與青銅立人像的臉型、面容、神態相同，方臉清瘦，絡腮短鬚，尖耳大眼，鼻直口闊。大小與真人相似，是以真人爲原型創造的。多數頭像腦後留一粗大的長辮，頗具特色。人頭像大多爲平頂方冠，也有一些爲雙翼冠或挽髮簪。這些頭像頸部前後都鑄有三角形尖刺，推測可能原來都安裝在泥質或木質的軀體上。立人像的頸部與領口相接處亦爲三角形，便是一個有力的佐證。這數十件與真人大小的雕像，組成了一個龐大的群體，具有中國造像藝術中注重恢宏氣勢的傳統風格。銅頭像中還有一批不同臉型與裝束的作品，如一號坑出土的無冠頭像，圓臉型，無胡鬚，眉清目秀，豐滿圓潤，親切平和，富有青春的朝氣。二號坑出土的盤辮頭像，長長的髮辮盤置頭頂。圓頭插簪人像，則將頭髮束于腦後，斜插一寬簪。這些具有多樣特徵的頭像，各具強烈的藝術魅力，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三星堆祭祀坑中還有二十多件小型的人像作品，個體高五—二十厘米，種類繁多，形象生動。有的踞坐地上，雙手撫膝；有的呈單跪或雙跪狀；有的并腿站立，雙手奉物；有的雙腿跪地，手扶頭頂上的祭器。這些小銅像服裝、髮式、臉型、佩飾各異，反映了它們的不同族屬和等級。但它們的共同特點是都呈祭奉姿勢，可能是參加祭祀的具體形象。在藝術表現

上，採用寫實手法，因此更加生動而自然。

巴蜀青銅器中另一類神奇的雕塑藝術品是那些碩大的青銅人面具。它們用青銅鑄造成巨大的半圓形的人臉面殼，採用大膽的誇張手法，將各器官加以放大和變形，怪異而奇特，和以寫實手法塑造的人頭像形成鮮明的對照。面具分爲突目和平目兩類。突目面具三件，形體碩大，變異突出。最大的銅面具高六十五厘米，寬達一百三十八厘米，兩眼巨大呈菱形，眼角上翹，瞳孔呈柱狀嚮外突出，長達十六點五厘米，直徑十三點五厘米。雙眉濃重粗長，亦嚮外翹起，鼻梁鈎曲，鼻翼寬大，作卷雲紋狀，嘴角外咧，接近耳根。兩耳尖長，斜嚮支伸，長達七十厘米。耳內飾勾雲紋。下頜有一匝短齊的絡腮胡鬚。耳際上下各有一長方形榫孔，便于與其他物體組裝。另兩件突目面像基本造型與大面具相同，個體略小，但寬度仍有七十七點五厘米。其眉額正中裝有一個高聳的勾雲紋銅飾件，高達六十六厘米，更增加了面具的神秘氣氛。平目面具二十多件，個體大小不等，最大的寬六十厘米，中型的寬五十厘米左右，小型的一般寬約二十厘米。這些面具瞳孔不嚮外作柱狀突出，但眼眶很大，亦呈菱形，眼球中部起棱。其他器官和結構均與突目面具相同，只是變形的程度略小。這些面具神秘怪誕，與立人像、人頭像相互輝映，不僅反映了廣泛的社會涵義，而且豐富了巴蜀青銅藝術的風格與內容。

巴蜀青銅器注重形體塑造的傳統特徵，還表現在對動、植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圓雕的飛禽怪獸。有龍、鳳、虎、蛇、鳥、鷹、魚、鷄等等，塑造形象生動。如銅鷄爲高冠錦羽，昂首卷尾，比例適度，體態雄健。也有不少動物造型則加以變異誇張，如羊首蜥身爬龍、人首鳥身精靈等怪獸。特別是許多鈎喙長頸的鳥頭，常出現于造像或裝飾圖案之中，具有特殊的含義。如銅鳥頭，長四十三點三厘米，鈎喙尖銳，雙目犀利，造型逼真，氣勢非凡。其頸部有插口和榫眼，可以安裝在柱狀物體的頂端，是古代蜀人重要的崇拜物之一。這些動物造型，是形式與內容高度統一的藝術珍品。

以銅樹爲代表的植物造型，是巴蜀青銅器中又一個風格獨特的藝術品種。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數株銅樹，形態奇異，大小懸殊，在巴蜀銅器群中具有特殊地位，故又稱之爲『神

樹』。二號坑出土的一株高達四米以上，是三星堆出土的最大銅器，也是商周時期最大的銅器之一。它的主干粗直挺拔，分段鑄成，端部有節箍，頂端飾一碩大的桃形果實，上面似還立一鳳鳥。樹干周圍有三層枝杈，每層三枝，彎曲下垂，枝端結一二顆桃形果實。九個樹枝中段還各結一果，果上各立一隻振翅欲飛的鈎喙神鳥。樹干和樹枝上套有幾個圓盤，內飾雲紋。枝、果上都有小孔，可以懸掛鈴、牌、樹葉之類的飾件。銅樹基座是三叉支架和圓盤底座，座上滿飾雲氣紋。樹座上立一方首巨龍，長尾上翹，接近于樹端。龍身上佩以短劍、果葉及手形等飾件，更顯得神氣而莊嚴。二號坑另一株銅樹，個體略小，高兩米餘，枝干的裝置、數量以及果實、立鳥的形狀，與大銅樹基本相同。枝上還套有銅瑗等祭器。特別是叉形基座上鑄有三個長跪人像，衣冠規整，神情虔恭，雙手平舉奉物，大約是專司祭祀神樹的巫覡，從而突出了銅樹的神聖地位。祭祀坑中還出土有幾株小型銅樹，破碎嚴重，但枝干飾件均與大銅樹相似，其中包括一件造型奇特、製作精良的人首鳥身的精靈，更增添了銅樹的神秘感。

殷商時期形成的巴蜀青銅器注重造型藝術的優良傳統，在西周以後的青銅器上仍保持了下來。位于寶鷄的西周早中期彊國墓地中，出有兩件環手執物立人像，一件爲男像，高十七點九厘米，光頭圓臉，顴骨突出，大眼高鼻，雙耳尖長，着窄袖長袍，雙手巨大，握作環形，高舉于肩部，作執器祭祀狀。像下有方孔，可插于座臺之上。雖然此像較小，裝飾簡單，但它的基本造型和環形巨手執物的姿式特徵，均與三星堆大銅人相似，也是與祭祀或巫術活動有關的神職人員雕像。另一件銅像爲女像，高十一點六厘米，爲半身立像，圓臉尖頜，頭頂有三叉形髮飾，身着對襟袍服，雙手握作巨大的環形，左手上揚，右手下垂，各有所執，作舞蹈祭奉狀。寶鷄戰國墓地中還出土有青銅三足鳥、鴨首長喙銅旄杖頭、鈎喙鳥形尊等，與三星堆的銅鷄、大鳥頭等均有類似的藝術風格。茹家莊出土四件青銅轅飾上的人面像，與三星堆青銅人面具很相近。器物背面的小人像，束帶、文身、披卷髮、穿犢鼻褲等特點，與三星堆踞坐小人像相似。這幾件人像作品，正是三星堆巴蜀青銅雕像藝術在西周時期延續與發展的實物資料。

巴蜀青銅文化形體藝術發達的傳統，還表現在西周以後青銅禮器上立體和半立體的鳥獸飾件和浮雕紋飾上。彭縣竹瓦街的牛紋罍，蓋鈕上的獸面戴冠神像，似是三星堆人面具的變形。在商周到戰國巴蜀式銅罍、銅尊上，多有羊首、牛首、跪牛、蟠龍、象鼻、龍頭、立鳥、飛禽等圓雕和浮雕的飾件或紋飾，組成表現完整祭祀場面的復合體。這些重器把祭奠活動表現得更加集中、更加明確了。所以，人像、鳥獸與禮器造型的有機結合，是巴蜀青銅藝術的重要特徵。

巴蜀青銅器紋飾，同樣具有自身的藝術風格。內容包括以『人獸變形圖案』和『巴蜀圖語符號』爲代表的兩大系列。人像和動物形象，除了作爲器物附件之外，巴蜀青銅器還將它們與中原的獸面紋相互融合，形成一種新奇神聖的青銅器紋樣。如商代銅尊肩上的雙身虎紋，虎口下含一無頭怪人，腹部突目饕餮形的紋飾與突目人面具相近似。西周時期則有雙角蟠龍紋、方首大眼夔龍紋等紋飾，并出現了三分或四分的火焰狀渦紋。戰國時期的銅罍上，這種渦紋成爲主要紋飾。成都百花潭十號墓出土嵌錯銅壺，是晚期巴蜀青銅器上人獸圖案裝飾藝術的杰作，具有高超的技術水平和豐富的社會內容。銅壺有三鴨鈕壺蓋，獸面環耳，壺身圓鼓，飾三層條帶紋，劃分出四層畫面。第一層爲習射和採桑，第二層爲舞樂和弋射，第三層爲水戰、陸戰圖，第四層爲狩獵和裝飾。整組畫面共有二百多個人像和七十多隻禽獸，還有篷帳、城牆、船隻、山川、樹木等，均採用細線淺刻、鑲嵌拋光等技法。畫面布局嚴謹，造型優美，繁而不亂，在雕刻、裝飾、鑲嵌諸方面達到了戰國時期的藝術高峰。

在巴蜀式的兵器上，以禽獸爲主的紋飾也具有典型的地方文化特徵。從商代中期巴蜀兵器器形紋飾的形成期，直到秦漢初期，這一基本特徵延續了一千多年。據初步統計，巴蜀兵器戈、矛、劍、鉞四種主要器類上，約有動物圖案十二類、九十多種。其中以虎紋爲最多，約三十多種。夔龍紋、獸面紋次之，約十餘種。此外還有鳥紋、蟬紋、蛇紋等。這些紋飾大多施于戈的援部、矛的骹部和劍的基部，多爲側面圖形，或威武凶猛，或溫馴可愛，或奇異怪誕，或形象逼真，具有很高的藝術性。

巴蜀青銅器注重人獸復合造型的傳統，到春秋戰國時期，進一步發展形成了獨有的巴蜀

符號式的圖案和紋樣，被廣泛使用于銅兵器和各種形狀的巴蜀式印章上。『巴蜀符號』又稱『巴蜀圖語』，是將人、獸、植物肖形和器物圖案、幾何紋樣、族徽標志及一些近乎于方塊文字的表意符號，加以巧妙的排列組合而成的，主要刻鑄在劍、矛、戈、鉞和工具、樂器及巴蜀印章的印文圖案上。『巴蜀符號』是否古代巴蜀的文字？如何釋讀？尚需進一步的研究與探索。但這些符號常常依其內容進行有規律的組合，用以表達特定的意義，則是得到公認的。據初步確認統計，構成『巴蜀符號』的各種形狀的單個符號紋樣大約有一百八十多個，可分爲十七類四十多種（參見劉瑛《巴蜀銅器紋飾圖錄》，刊于《文物資料叢刊》一九八四年第七期）。如屬于人物類的立人、人頭、人手等；屬于動物類的蠶、蛇、虎、鳥等；屬于器物類的罍、鐸、矛、鏃等；屬于植物及自然景象類的草、樹、果、花、水紋、半月、多角星等；屬于幾何形的曲尺、卷雲、菱形、彎鈎等。屬于族徽類的多爲單刻的標志。另外還有成行排列的巴蜀符號，每段四至十個單體，刻劃清晰，已與圖形狀態有很大區別，基本形成了獨立的表意文字。戰國中期到西漢早期，印章或圖語中開始夾雜有漢字出現，顯然是受中原文化的影響。這些圖形與文字符號的布局與刻劃，具有鮮明而協調的美感，是巴蜀青銅藝術中的另一朵奇葩。

巴蜀青銅器的鑲嵌藝術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很大，戰國時期在當地廣泛運用，技術達到高峰。嵌錯的圖形內容豐富，線條流暢，花紋繁縟，鑲嵌精細，打磨平整。如涪陵小田溪出土的雲水紋銅壺，用銀線嵌錯成卷雲紋細絲，交錯盤旋，華麗而秀美。又如綿竹船棺出土的嵌錯蓋豆，通體刻有三層九組十九隻矯健的虎紋，之間用勾雲、菱形等幾何圖案分隔，疏密有致，平穩的體型和躍動的虎紋相互輝映，是一件個性突出、造詣很高的藝術珍品（插圖八）。嵌錯技藝在巴蜀銅帶鈎上運用得更爲成熟。昭化寶輪院出土的犀牛帶鈎，形體雄健，全身用金銀細絲嵌錯出勾雲和幾何紋圖案，絢麗活潑，藝術造詣高超。同時出土的勺形帶鈎，勺沿嵌卷雲紋圖案，勺底部則嵌繪出一組精美完整的巴蜀圖語，十分罕見。奉節縣懸棺出的雙獸大帶鈎，身體爲兩隻盤繞的巨蜥。嵌錯技術的廣泛運用，使巴蜀青銅器中出現了一批燦爛奪目的精美杰作。

插圖八　嵌錯虎紋豆

五

巴蜀青銅器那豐富而奇麗的器形與紋樣，蘊藏着豐富的文化內涵，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巴蜀先民的思想意識、社會習俗和宗教信仰，也反映了一些重要的歷史問題。

對巴蜀古史的瞭解，由于缺乏文獻記載，『巴蜀文字』又難以釋讀，由此，自漢代以來的兩千年間，古代巴蜀的歷史一直撲朔迷離、神秘莫測。本世紀以來，以巴蜀青銅器爲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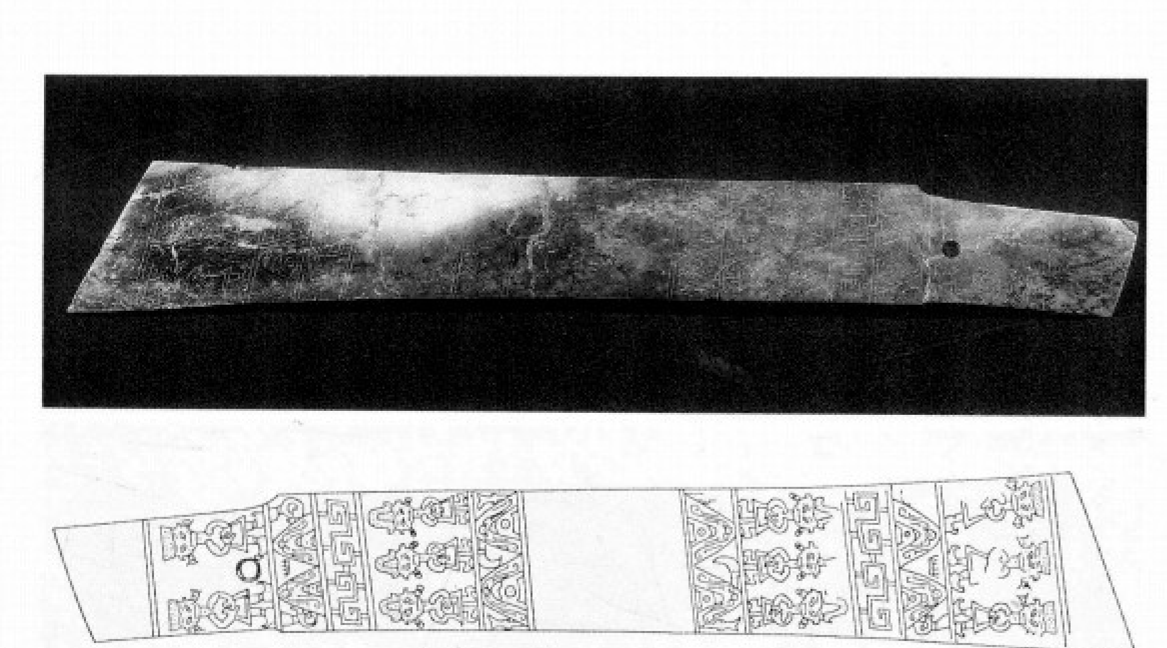
考古新發現，特別是三星堆遺址的發掘與研究，終于初步將一個沉睡的古文化喚醒，使一個消失的古國再現，爲深入探索巴蜀文化的歷史淵源提供了可貴的資料。

創造巴蜀青銅文化的思想基礎與社會根源，應是古人以原始宗教爲主體的信仰習俗。人們認爲世間萬物都由神主宰着，把一切自然現象理解爲人神之間的情感交流，對神的信仰崇拜是人類征服自然、戰勝自然的精神支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宗教祭祀的作用在早期國家中可能比軍事力量顯得更爲重要，人們的一切社會活動，都希望通過『神』的力量加以體現。所以，青銅器出現之後，巴蜀先民就把這最先進的技術，使用到宗教祭祀活動中，創作出了大批神奇的藝術珍品。

高大威嚴、雄踞神壇之上的青銅立人像，似爲大型祭祀活動的總指揮，是統帥全局的『群巫之長』。當時的宗教領袖，常常也是最高的政治統治者——國王。大銅人像所表現的可能正是當時的一代『蜀王』。其他數十件人頭像，塑造的應是祭祀活動中不同等級、不同民族部落的巫師、酋長形象，其中可能也包括了前代的蜀王或大祭司。這些頭像安裝在泥質或木質身軀上，佇立于廟堂之中，具有强大的群體氣勢和威懾力量。那些跪拜、踞坐、奉物肅立在神壇、神樹周圍的小型人像，則是擔當一般職責的氏族成員。它們都是祭祀者，而不是被祭祀者。

三星堆大型青銅面具，是古蜀人心目中『神』的化身。面具有榫孔，可能被安裝在粗大的柱狀神器上。青銅面具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徵，是眼睛特别突出。這種對人眼的崇拜，必有其特殊的社會歷史原因。《華陽國誌》云：『蜀王蠶叢，其目縱，始稱王。』三星堆出土的神像，證實所謂『縱目』，就是人眼巨大而突出。突目面具正是『縱目人』蜀王蠶叢的神像。在蜀人心目中，先祖蠶叢不僅是創造萬物的神，而且是子孫昌盛的保護者，因此人們把先祖蠶叢的形象作爲祭祀的主神。

三星堆出土的銅樹，是祭祀活動中進行人神交往的『神樹』，是溝通天地的階梯。《淮南子》云：『建木在都廣（都廣，今成都），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影，呼之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建木又可稱鍵木，據説是天地正中的樞鈕。何新先生以爲：『以東方的扶桑木，中央



插圖九　祭山圖玉璋

的建木，西方的若木爲三點，古人構造了一個神話形象出現的宇宙觀念。』（《諸神的起源》）古蜀人認爲自己所在的地方正是天地中央，這些高大的神樹，是祭祀活動中人與神相互交往的主要途徑。三叉圓盤基座，象徵雲氣繚繞的高山，挺拔粗壯的樹干，代表頂天立地的建木，樹枝上的各種飾件，作爲祭神的禮器，樹上的立鳥，則是蜀人的精靈化身，樹上繁茂的枝葉，表示生命和繁衍的興旺。攀援于樹上的巨龍正是上帝的化身，它往來于天地之間，傳達上天的意志，轉達人間的企求。神樹可能被放置于祭祀場地的中心，各種祭祀活動則環繞在它的周圍進行。這種情形可以從西南苗、瑤等民族村落廣場中心樹立的神樹和圍繞神樹開展祭祀活動的習俗中得到啟示。此外，在三星堆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劃有一幅『祭山圖』（插圖九），由四組祭天祭山圖像組成，共有二十二個立祭、跪祭的巫師，十六座神山上空懸有八個『牙璋』、八隻『巨手』、四顆『象牙』、四條『渡船』，完整生動地表現了宏大的祭祀場面，有助于我們認識銅人像、銅禮器在祭祀中的地位與功能。巴蜀文化後期，人們的祭祀方式，由群衆性祭神儀式轉變爲家族墓葬祭祖爲主的形式。青銅禮器多以隨葬品的形式出現。那種崇尚鬼神、人神相通、天意神助的宗教信仰觀念，在各類器物裝飾上繼續清晰地反映出來。例如巴蜀式兵器上之所以長期保持了獨有的紋飾，原因之一就是巴蜀先民在它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意志觀念，使其具有神奇的功力。最典型的例子是柳葉形短劍，傳說它是巴族祖先在確定首領權力地位時使用的神器。很早以前，巴人『未有君長，俱事鬼神』，當時是五姓共存，各不相讓，于是就用『擲劍』的方法來決斷君王。巴氏子相『擲劍中穴』，『奉以爲君』（《後漢書》）。這種可以投擲的柳葉短劍，有如此神聖的作用和傳奇的經歷，它的造型就被作爲具有始祖靈氣的神物一直鄭重地保持了下來。特別是兵器上常刻上本民族的圖騰標志和巴蜀符號，更賦予了神秘的威懾力量。

巴蜀銅器中有一些常用的圖案符號，可能是各代蜀王的族徽。新都大墓上腰坑出土的成套器物上，基本上都有一個特殊標記，應是墓主人的徽號。這一標記很象金文中的『𨳲』（開）『日』（明）二字，可能因此而被史家解讀爲『開明』，而在《蜀王本記》、《華陽國誌》等書中記述下來，由此而有了『開明氏』的稱呼。一九六〇年湖北荆門出

土的一件戰國時期巴蜀式銅戈的援部，鑄有一對執獸巨人像。按張勛煉先生的意見，這組圖像包括『文身以像蛟龍的人』，『人手所執的龍（鰐魚）和雙頭怪獸或雙魚』，『人胯下的龍和足下的日月』。『整個畫面所要表現的主題思想，就是突出畫中人具有特別熟悉水性，善長捉魚，能够戰勝水中一切凶惡動物的能力。』『圖中的人像，很可能是古代巴人的化身，也可能是古代巴人想象中的祖先形象』（《巴蜀歷史、民族、考古、文化》）。這一發現表明，古代的巴人也有與蜀人相同的習俗，即以神化的人像來表現自己的祖先，具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識，同時又形成以圖形表達思想意圖、以青銅禮器體現權力的傳統作風。

關于巴蜀古史的年代和序列，漢晉時期的古籍中有一些零散的記載。如《蜀王本紀》云：『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濩、魚鳧、開明……從開明以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蜀王之先曰蠶叢。後代名曰柏濩。後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年，皆神化不死……』『後一男子名曰杜宇，從無墮……自立爲蜀王，號曰望帝』。『望帝積百餘歲……鱉靈即位，號曰開明帝』。《華陽國誌》等書也基本認爲蜀國有一個蠶叢、柏濩、魚鳧、杜宇、開明、秦滅巴蜀等階段相互銜接的歷史序列。

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十多年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已經用考古材料大體展示出了距今五千至兩千年前的巴蜀古史年代序列。目前一般將這段歷史劃分爲五個階段：距今五千到四千年左右爲第一階段，相當于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四千到三千二百年爲第二階段，相當于夏商時期；距今三千到二千五百年爲第三階段，相當于西周到春秋前後；距今二千六百到二千三百年爲第四階段，相當春秋晚期到戰國中期，直至公元前三一六年秦并巴蜀之前；公元前三百年至公元前一百年左右爲第五階段，包括戰國晚期到西漢前期。學術界認爲這五個階段大體上反映了古蜀歷史傳説中的蠶叢時期、魚鳧時期、杜宇時期、開明時期和秦并巴蜀秦漢統一這五個時期的歷史面貌，印證了史籍傳説中巴蜀史的幾個主要階段大體可信。這一學術進展使巴蜀歷史和巴蜀文化研究大大嚮前邁進了一步。因此，巴蜀青銅器的發現與研究，在蜀史探索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巴蜀青銅器在鑄造技術上也有自身的特色。考古工作者與文物保護專家、科學技術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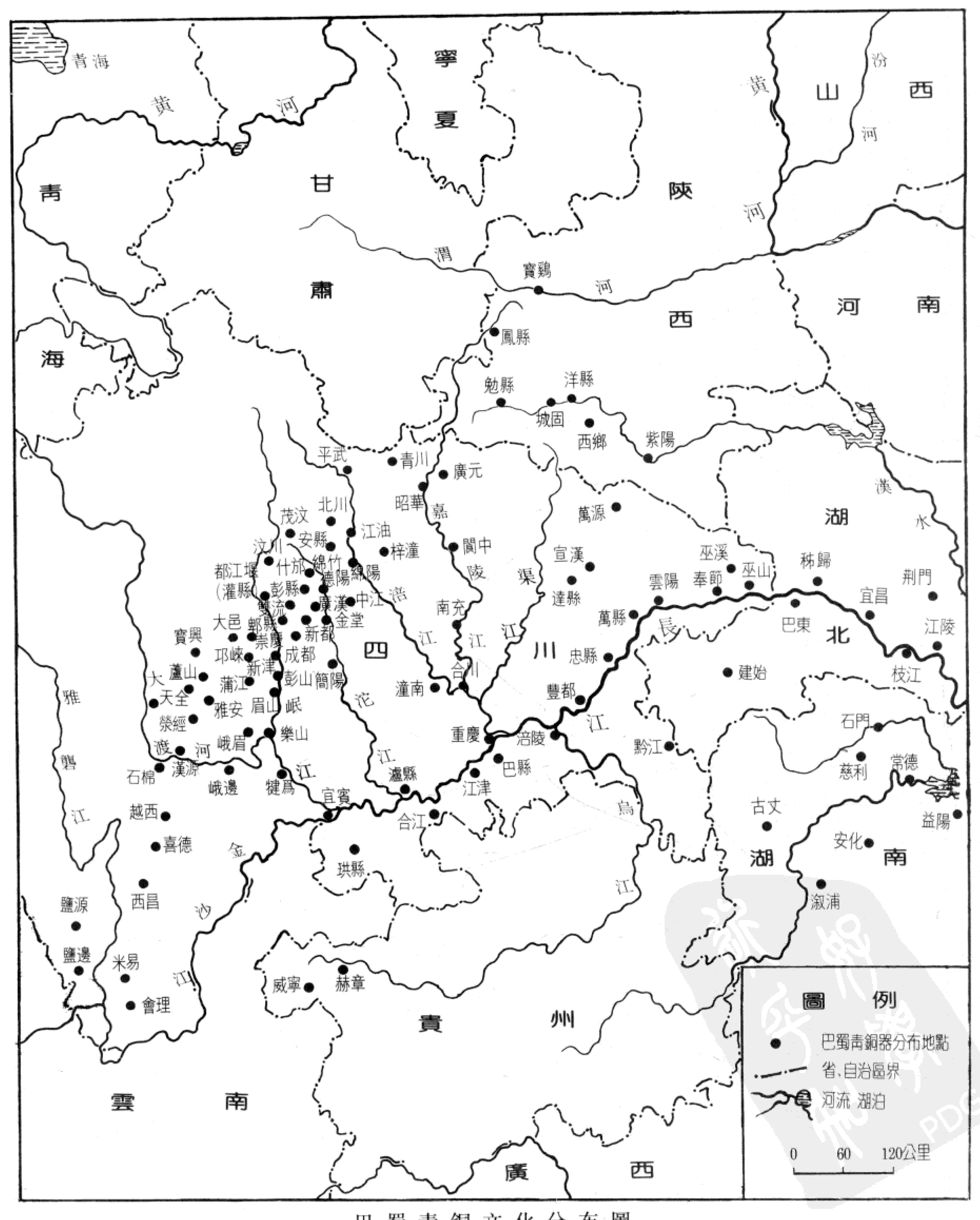
人員密切合作，已在巴蜀青銅器製造技術研究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從青銅成份分析，巴蜀地區的銅料中不含鋅，與中原地區常用的鉛鋅礦有明顯的不同，具有本地礦產的特性。三星堆遺址中經常出現燒紅了的泥芯與銅人像等器物內保留的相同泥芯，三星堆青銅器是在古城遺址內製作鑄造的。經過金相組織、泥芯成份和電子顯微鏡能譜成份分析，三星堆銅器以銅鉛錫類青銅器爲主，根據具體的成份比例觀察，各件器物的變化程度差別很明顯，說明三星堆的銅器冶煉鑄造時，在原料配方上的隨意性很大。與同時期殷墟青銅器相比，這裏的青銅器製作技術還比較落後。據泥芯的定性分析，表明燒鑄時的溫度并不太高。這些銅合金的澆鑄件大多數存在着氣孔和鑄造缺陷，也反映了當地技術不够成熟的一面。到了戰國時期，巴蜀青銅器的成份已經穩定，冶煉技術也相當成熟。巴蜀銅器中普遍含磷，這是一個特有的合金成份，使巴蜀式青銅兵器具有一定的硬度，又有一定的可塑性和韌性，成爲巴蜀青銅器的一個重要特徵。巴蜀銅器的表面處理技術也相當高，特別是廣泛使用了鍍錫處理的方法，形成層次清晰的『虎斑紋』，既達到了裝飾的目的，也起到了保護金屬內層的作用。到了戰國晚期，蜀地已有專門主管青銅器製作的機構，能够製作出技術水平很高的青銅器。如四川青川出土的一件狹援內刃長胡戈，戈表面經過『黑漆古』技術處理，至今黝黑光亮。戈內上鑄有篆文『蜀東工』三字，證明當時蜀地已可以自己製造這種當時最先進的銅戈。戈內的另一面，刻有『九年相邦呂不韋造蜀守□東工守□□戈三成都』二十字銘文，進一步表明這種戈的鑄造時間爲秦始皇九年（公元二三八年），主持製作者爲蜀郡東工守，製作地點就在成都（插圖一〇）。陝西歷史博物館收藏有一件銘文爲『蜀西工』的銅戈，反映出蜀地青銅作坊已分有東工、西工兩大部份，管理機構和工藝水平都已比較成熟了。

綜觀從商代三星堆到戰國木槨墓中出土的青銅器，巴蜀地區的青銅製造業逐步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工藝技術流程。一些大型的青銅器使用了一些特定的方法鑄造。包括分鑄法，如銅人像的耳部先鑄好，放入頭像範內，再與人頭像澆鑄在一起；後鑄法，如在銅樹干上加鑄枝條；嵌鑄法，如在尊、罍上加鑄獸頭飾件；以及多範合鑄法，如立人像的鑄造等等。三星堆銅器上還採用了熱補技術，一些缺口、接縫、裂痕上常常有補澆銅水的痕跡。大型的銅器在

插圖一〇　蜀東工銘文戈

分塊鑄造之後，多使用鉚焊技術進行裝接，如大銅面具的耳、眼等部分，就是用鉚焊與熱補相結合的方法，把器官附件焊接到臉殼之上的。

巴蜀青銅器中有許多是可以組裝的飾件，大型銅器之上也常常留有組裝飾件的榫口和孔眼。有的使用子母口扣合連接，如幾件青銅人頭像的人頭頂部，均有圓圈形子口，爲組裝冠帽飾件留下了母口的位置。巴蜀先民以自己特有的聰明才智，熟練地應用各種技術手段，創造出大批造型優美、裝飾華麗、組裝精巧、形象生動的青銅藝術佳作，爲我國青銅藝術寶庫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



青海
黃
河
寧
夏
山
西
汾
河
青
甘
陝
渭
寶鷄
肅
河
南
西
海
鳳縣
勉縣
洋縣
城固
西鄉
紫陽
平武
青川
廣元
昭華
嘉
漢
水
湖
北
萬源
北川
茂汶
江油
安縣
梓潼
閬中
宣漢
巫溪
巫山
秭歸
荊門
汶川
綿竹
什邡
德陽
綿陽
都江堰
(灌縣)
彭縣
陵
渠
達縣
雲陽
奉節
宜昌
郫縣
廣漢
中江
涪
南充
萬縣
巴東
長
江陵
大邑
新都
金堂
寶興
崇慶
江
忠縣
邛崍
成都
四
川
枝江
新津
建始
大
蘆山
蒲江
彭山
簡陽
合川
天全
眉山
潼南
豐都
雅
雅安
岷
沱
石門
滎經
樂山
重慶
涪陵
黔江
渡
峨眉
慈利
常德
礱
石棉
漢源
峨邊
犍爲
瀘縣
巴縣
江津
越西
宜賓
合江
烏
古丈
益陽
安化
喜德
金
珙縣
西昌
沙
漵浦
鹽源
鹽邊
米易
威寧
赫章
會理
貴
州
雲
南
廣
西
圖例
巴蜀青銅器分布地點
省、自治區界
河流 湖泊
0 60 120公里

巴蜀青銅文化分布圖

本書編輯拍攝工作，承蒙以下各單位
予以協助和支持，謹此致謝。

四川省文化廳文物處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省博物館
四川省成都市博物館
四川省重慶市博物館
四川省茂縣羌族博物館
四川省彭縣博物館
所有給予支持的單位和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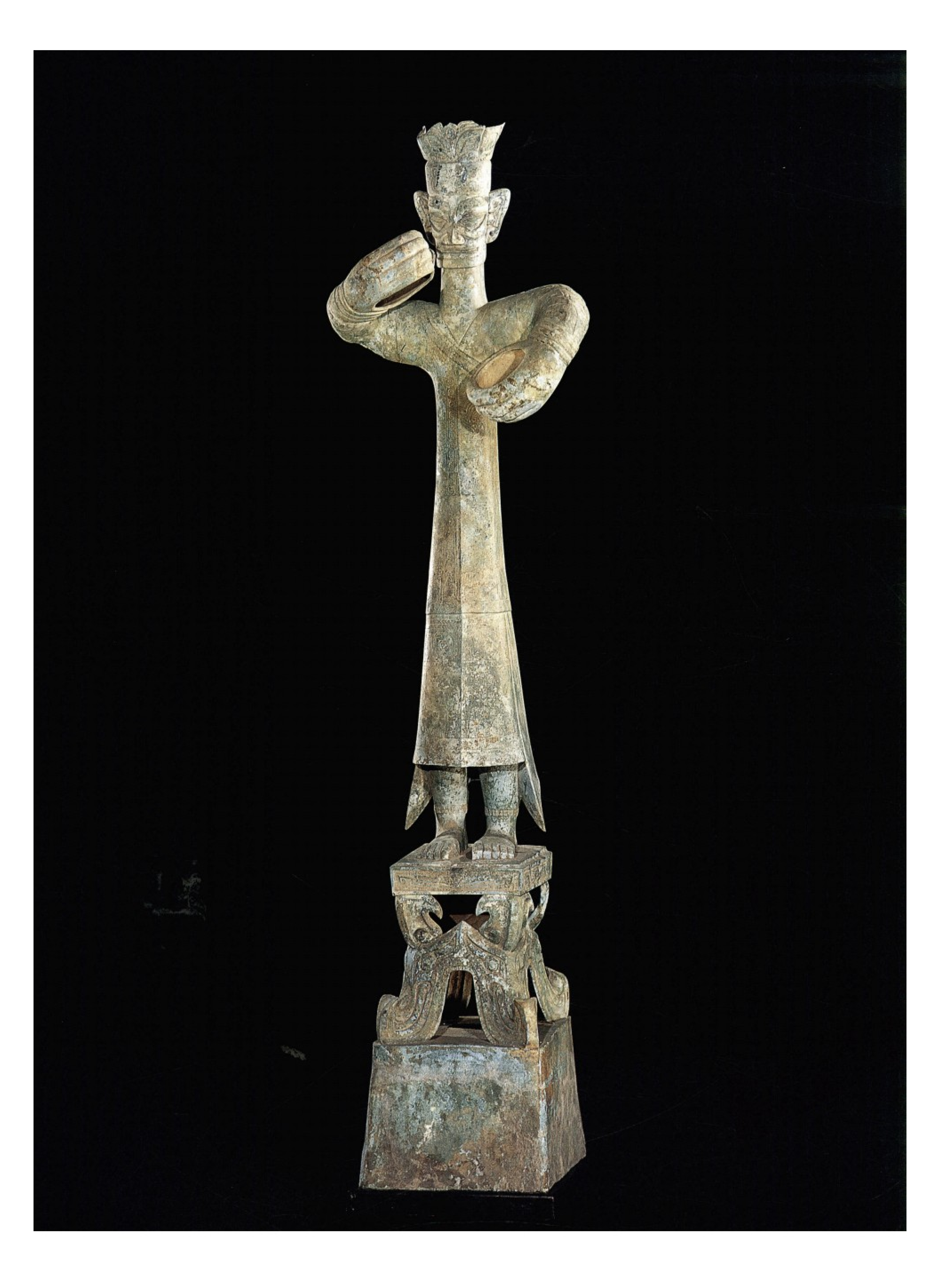
責任編輯　段書安
封面設計　仇德虎
版面設計　段書安
攝　　影　陳志安
　　　　　江　聰
圖版説明　陳志學
　　　　　陳德安
繪　　圖　劉　瑛
　　　　　邱富科
責任印製　劉京生
　　　　　陳　傑
責任校對　華　新
　　　　　周蘭英



目錄

圖版說明

巴蜀青銅文化分布圖











五　人頭像　商代中期



六　人頭像　商代中期

七　人頭像　商代中期





八　人頭像　商代中期

九　人頭像　商代中期



一〇　人頭像　商代晚期

一一、一二 人頭像 商代晚期







一三 — 一五　人頭像　商代晚期





一六 — 一八 人頭像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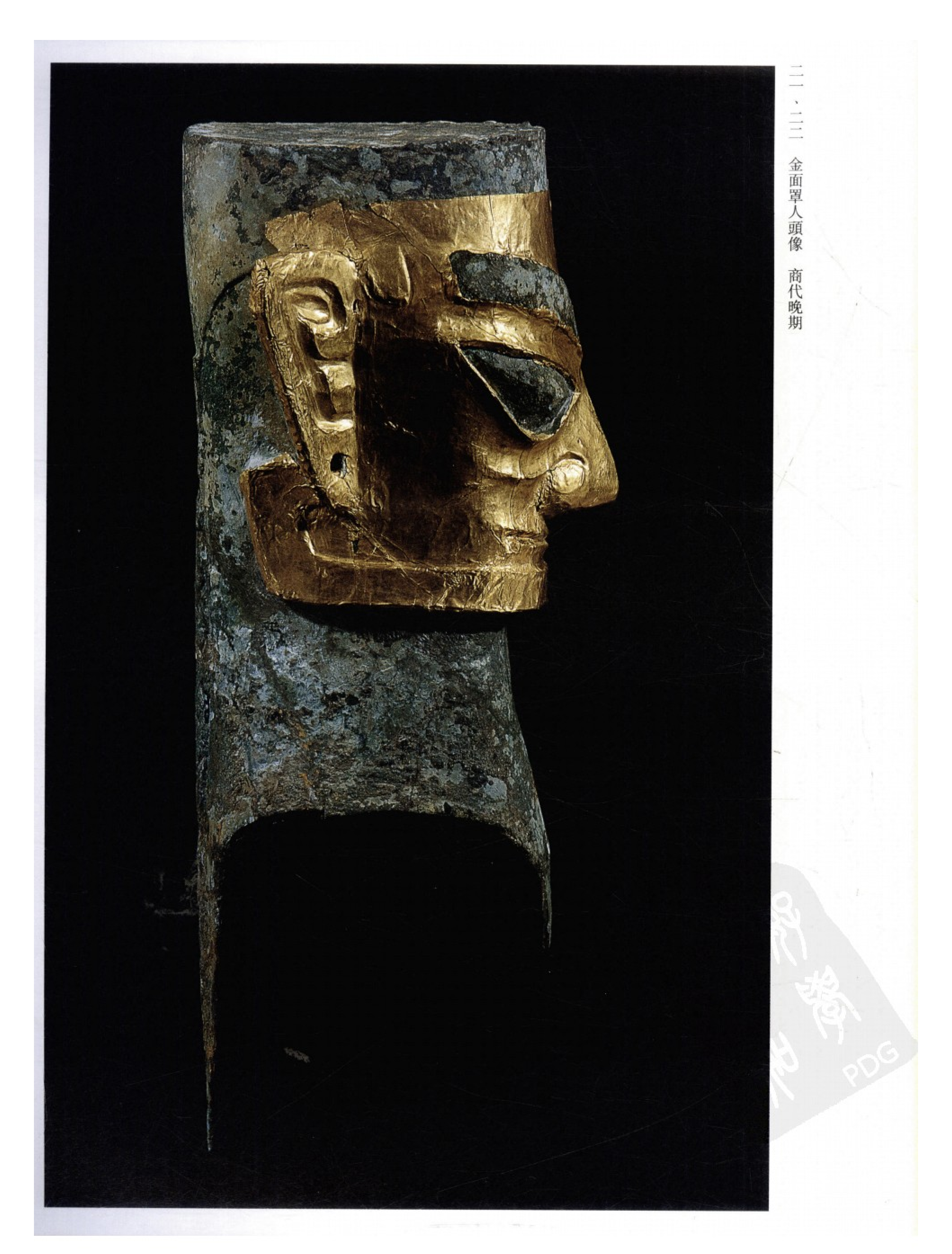




一九　人頭像　商代晚期

二〇 人頭像 商代晚期





二一、二二 金面罩人頭像 商代晚期

二三、二四　金面罩人頭像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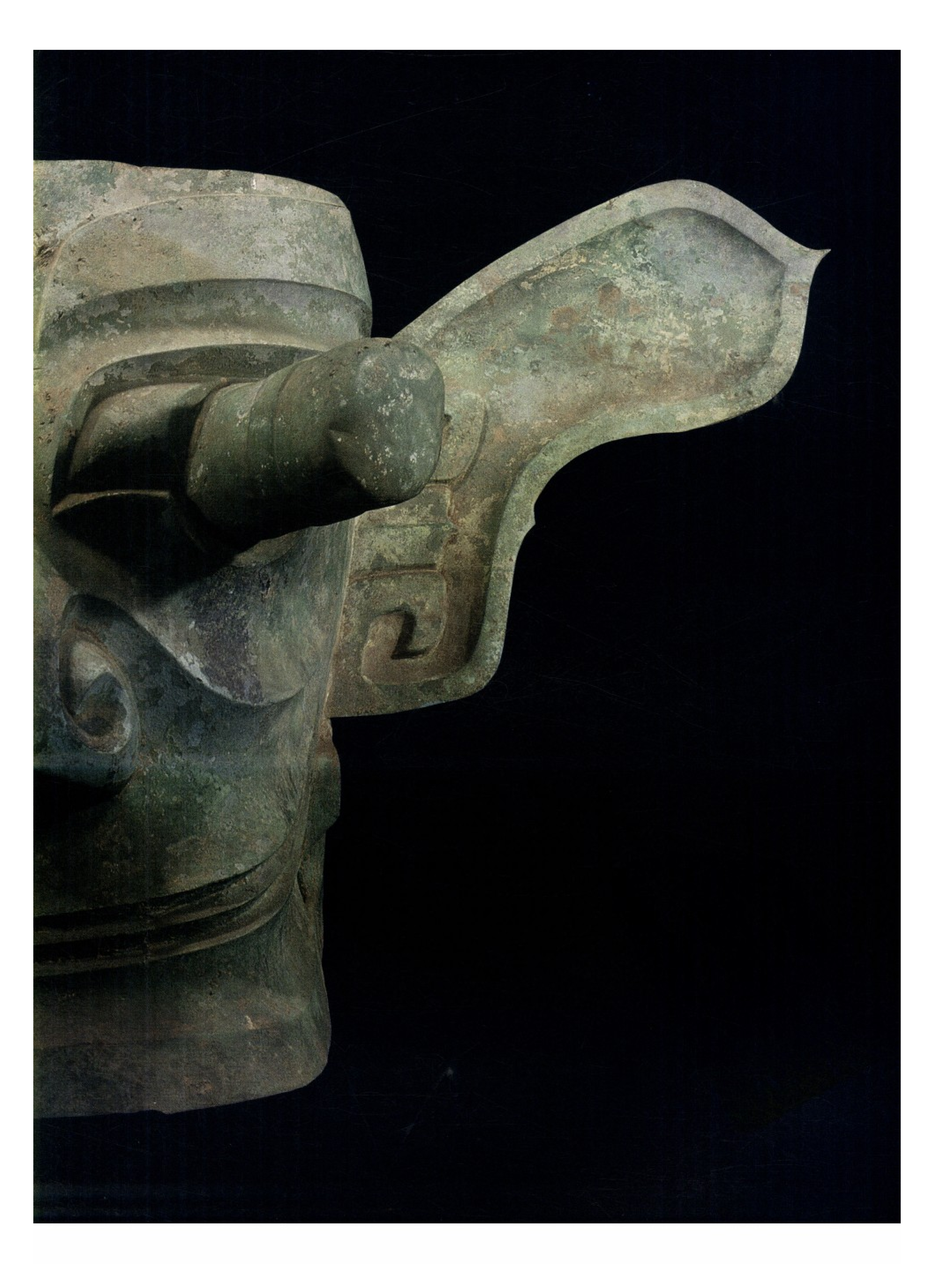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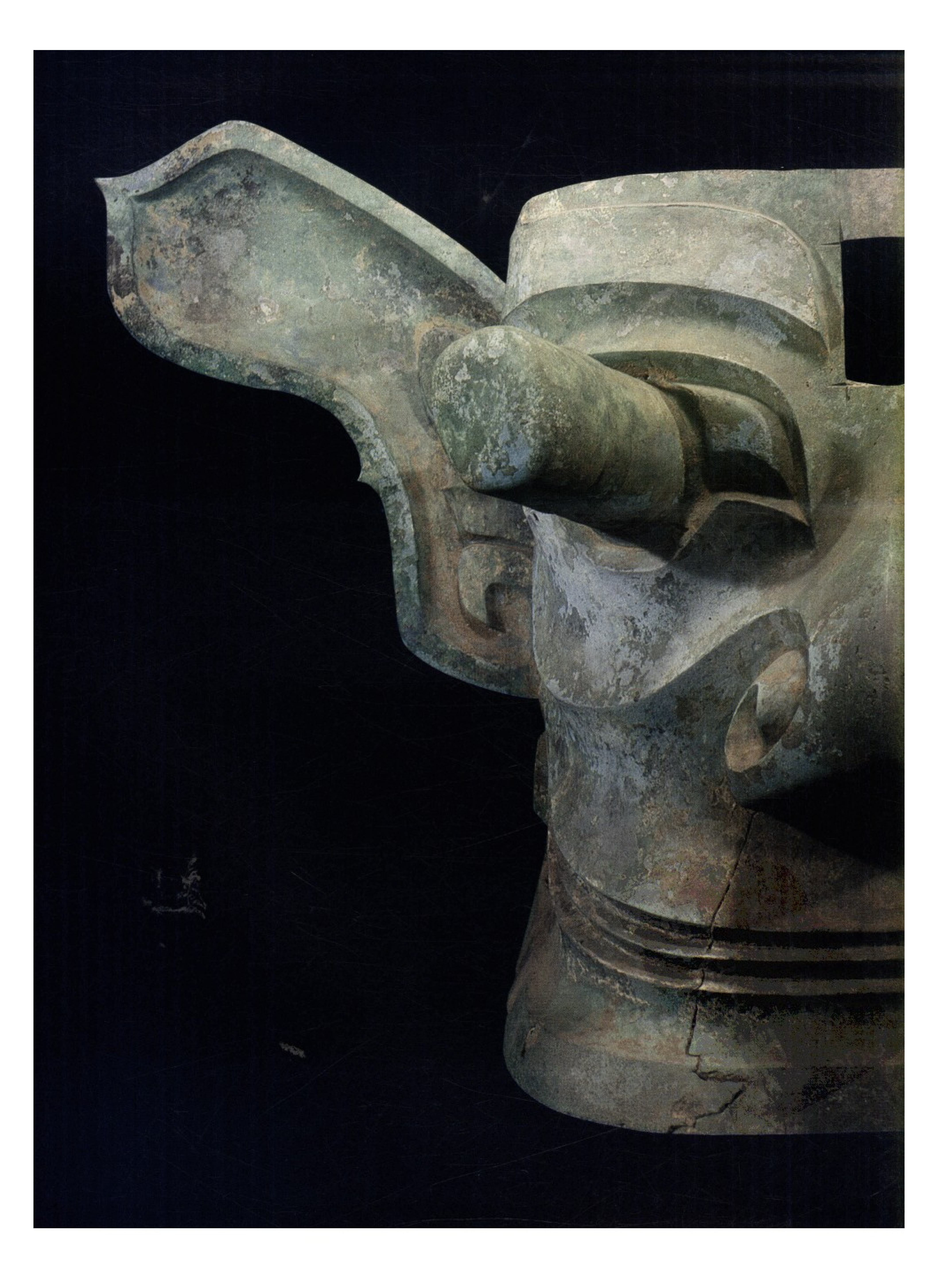


二五　踞坐人像　商代中期

二六　跪坐人像　商代晚期









二七・二八　突目面具　商代晚期



二九　人面具　商代中期





三一　人面具　商代晚期

三〇　突目面具　商代晚期



三二　人面具　商代晚期



三三　人面具　商代晚期





三五　人面具　商代晚期



三八　獸面具　商代晚期

三六　獸面具　商代晚期

三七　獸面具　商代晚期



三九　獸面具　商代晚期



四〇、四一　神樹　商代晚期



四二 — 四四　神樹　商代晚期



四五　人首鳥身像　商代晚期

四六　立鳥　商代晚期



四七　鳥頭　商代晚期



四八　鷄　商代晚期

四九　鷄　戰國





五〇　立鳥　戰國

五一　立鳥　商代晚期







五三　虎形飾件　商代中期

五六　太陽形器　商代晚期



五四　龍形飾件　商代中期

五五　蛇形飾件　商代晚期





五七　菱形眼飾　商代晚期

五八　勾雲形眼飾　商代晚期



五九　獸面紋鈴　商代晚期



六〇　獸面紋鈴　商代晚期



六一　鷹形鈴　商代晚期





六三　牌飾　商代早期



六四　牌飾　商代早期

六五　動物紋牌飾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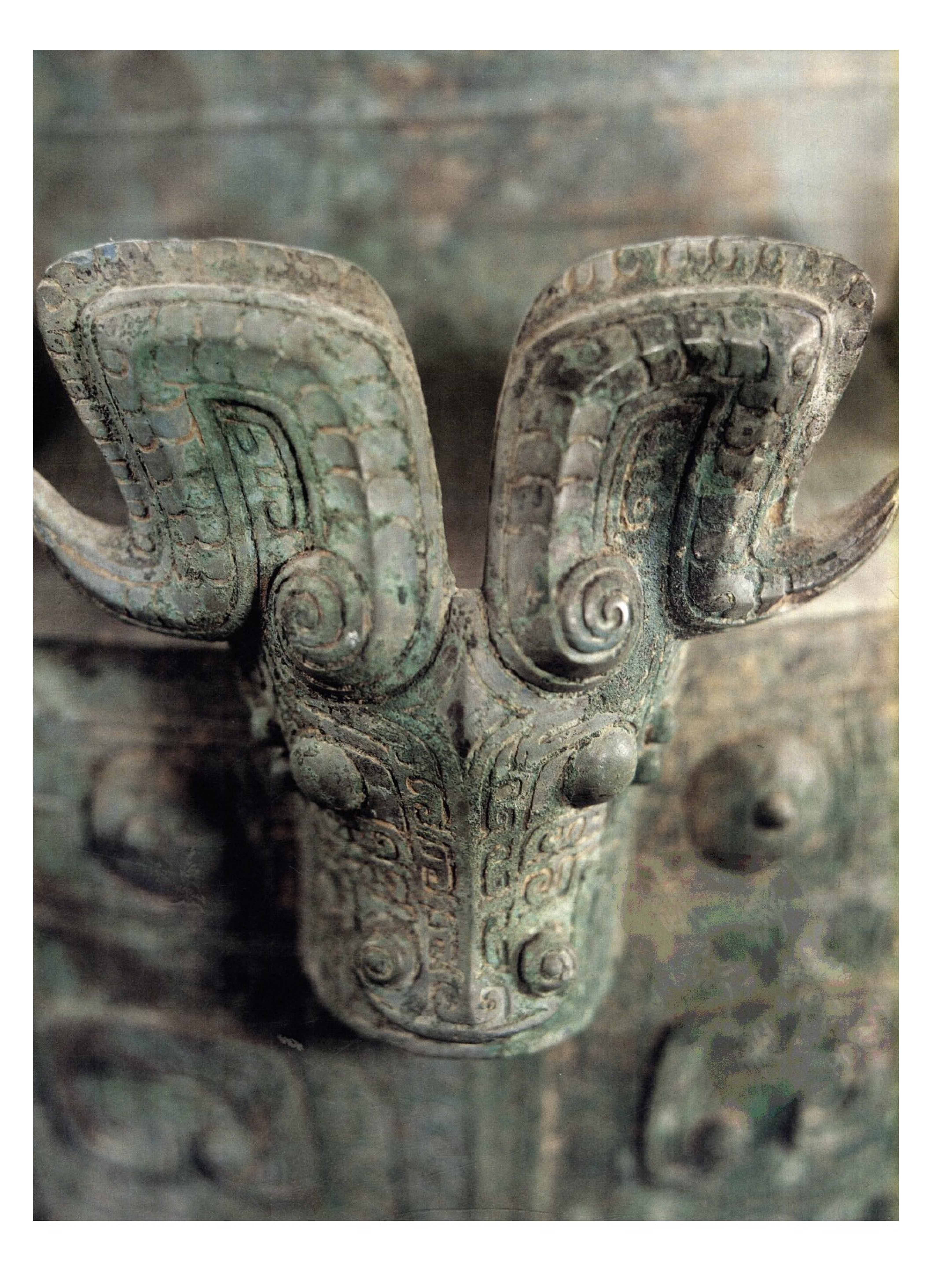
六六　虎形飾　商代晚期

六七　四羊首獸面紋罍　商代晚期





六八、六九　四羊首獸面紋罍　商代晚期







七〇 — 七二　牛紋罍　西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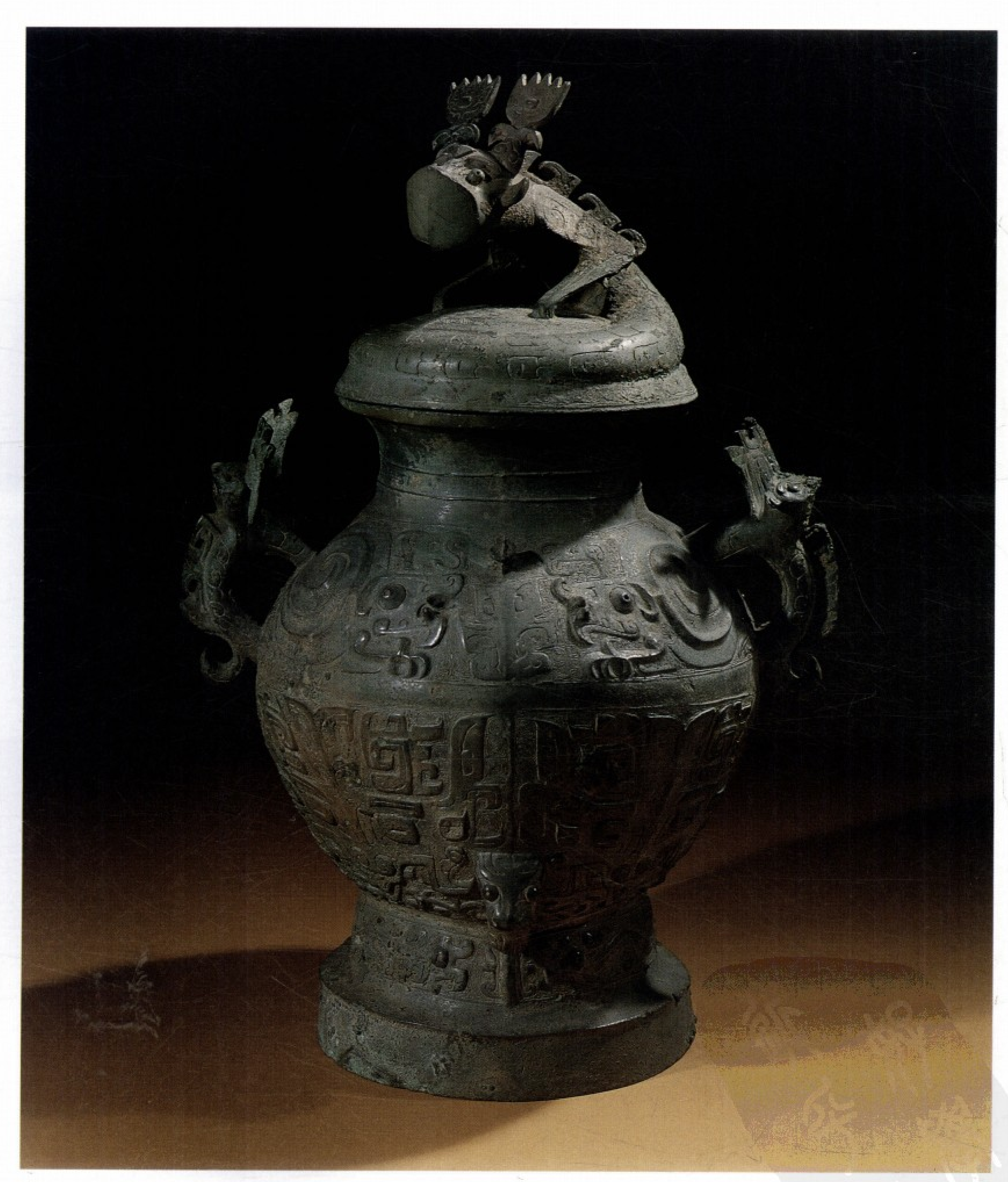




七三、七四　象首耳獸面紋罍　西周



七五　象首耳獸面紋罍　西周



七六　蟠龍蓋獸面紋罍　西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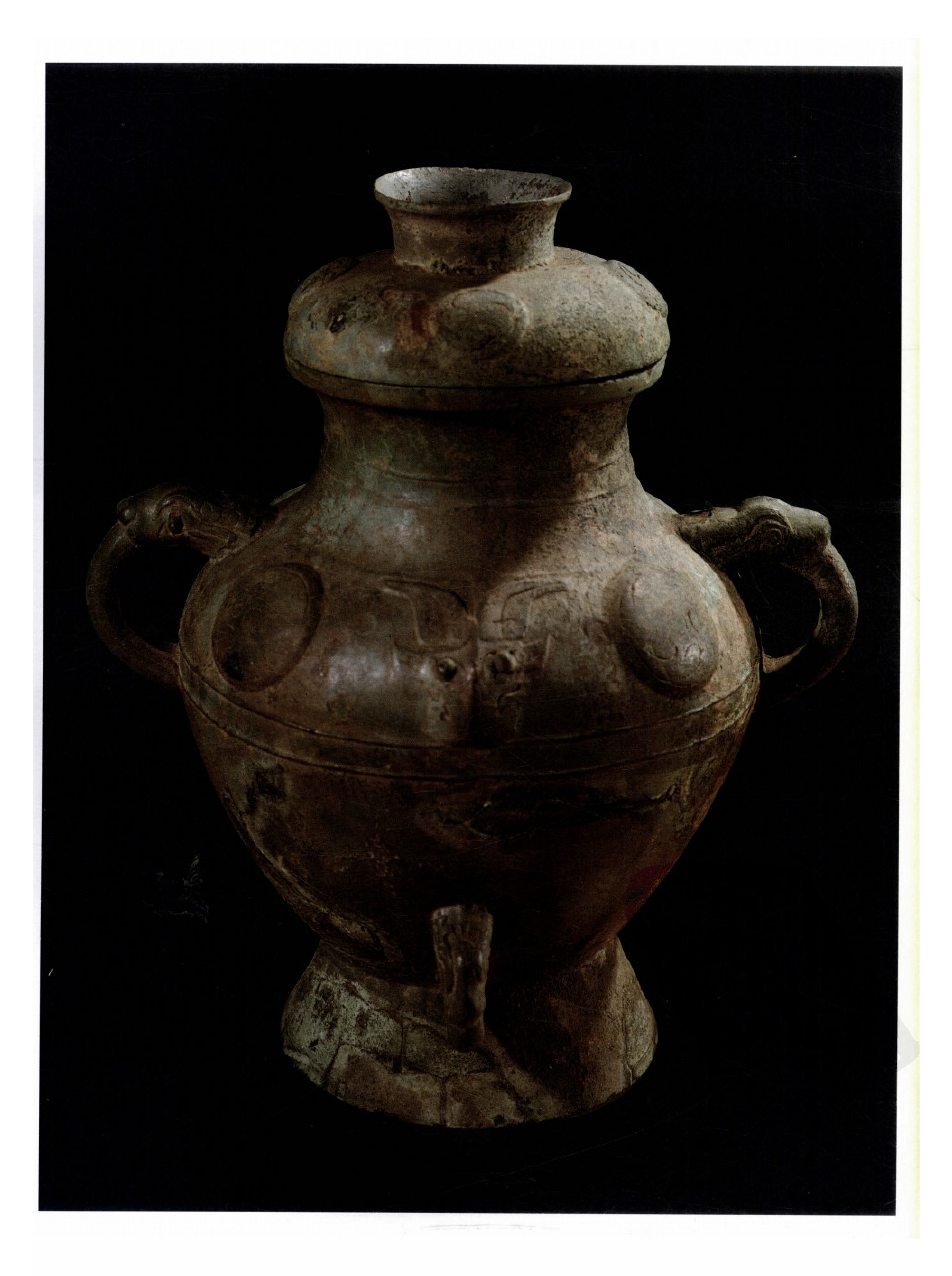
七七、七八　蟠龍蓋獸面紋罍　西周





七九　羊首耳渦紋罍　西周

八〇　四渦紋罍　西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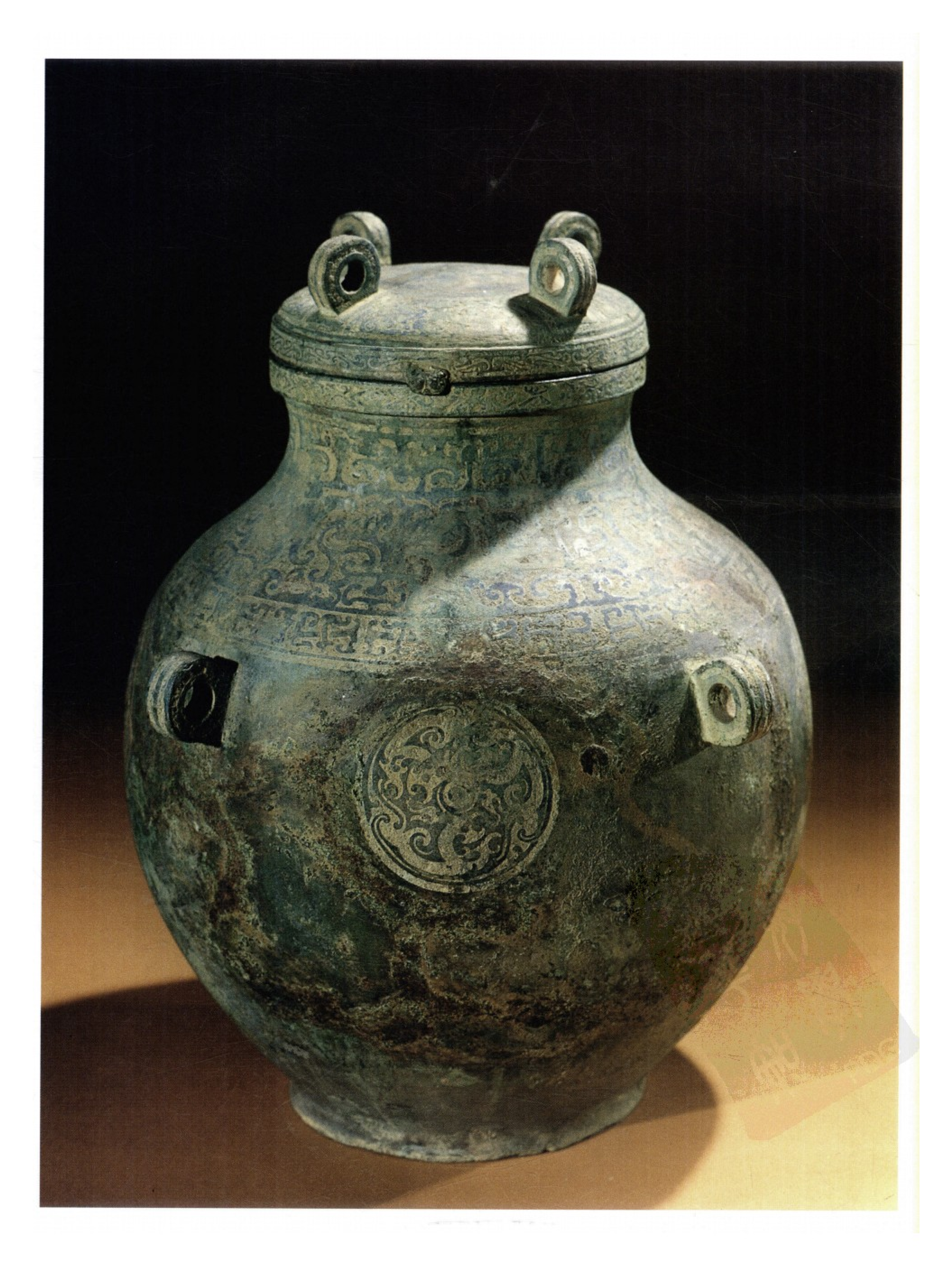


八二　牛首耳夔龍紋罍　戰國

八一　六渦紋罍　西周



八三、八四　四環鈕渦紋罍　戰國





八五　獸面紋罍　戰國



八六　三羊三鳥尊　商代晚期



八七、八八　龍虎尊　商代中期





八九　三牛尊　商代晚期



九〇　三牛三鳥尊　商代晚期





九二　獸面紋尊　西周

九一　獸面紋尊　商代晚期



九三　矮足鼎　戰國



九四　矮足鼎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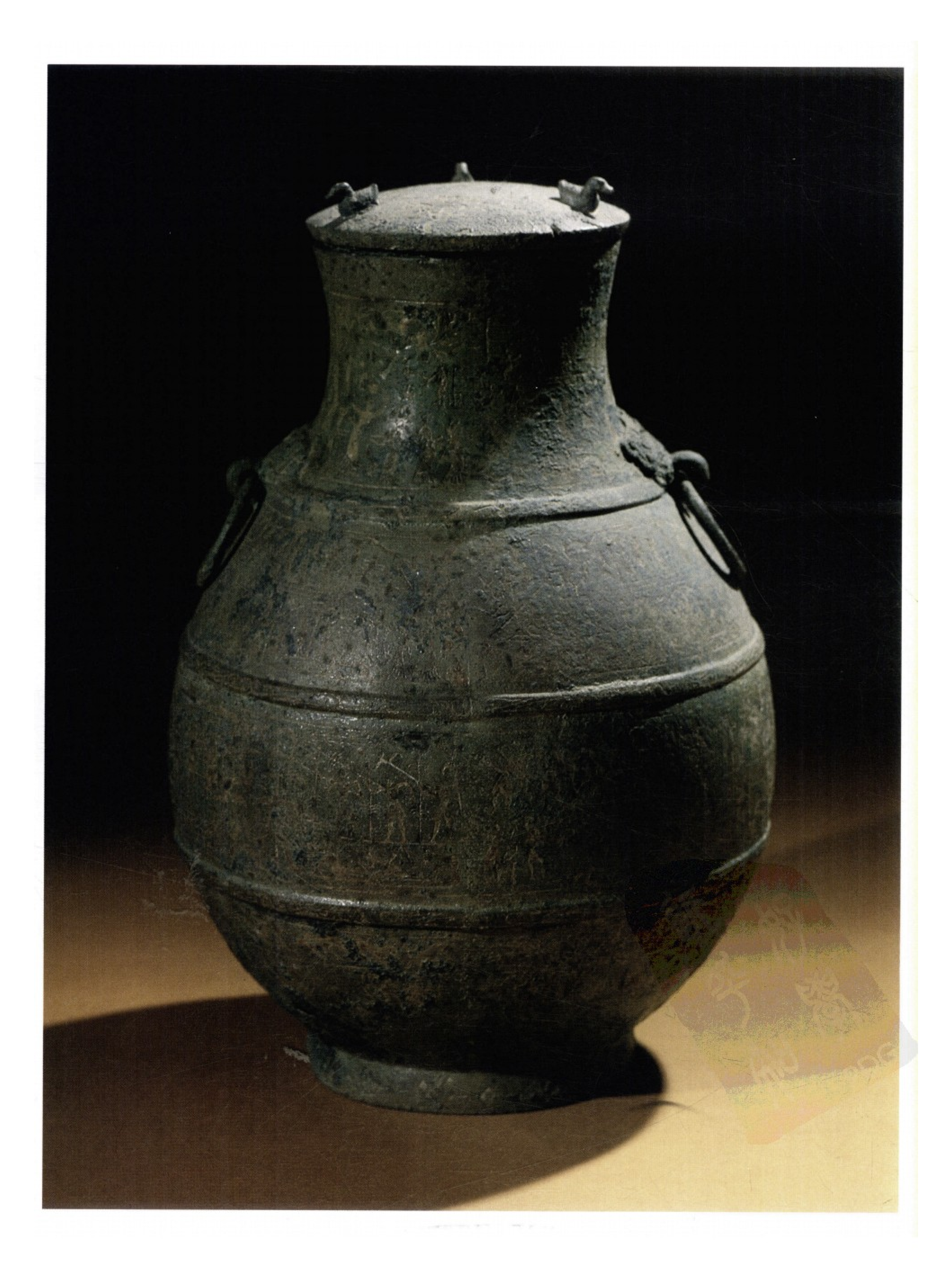
九五　雷紋鼎　戰國

九六　邵之飤鼎　戰國

九七　仿邵之飤鼎　戰國

九八 — 一〇〇　嵌錯宴樂採桑攻戰紋壺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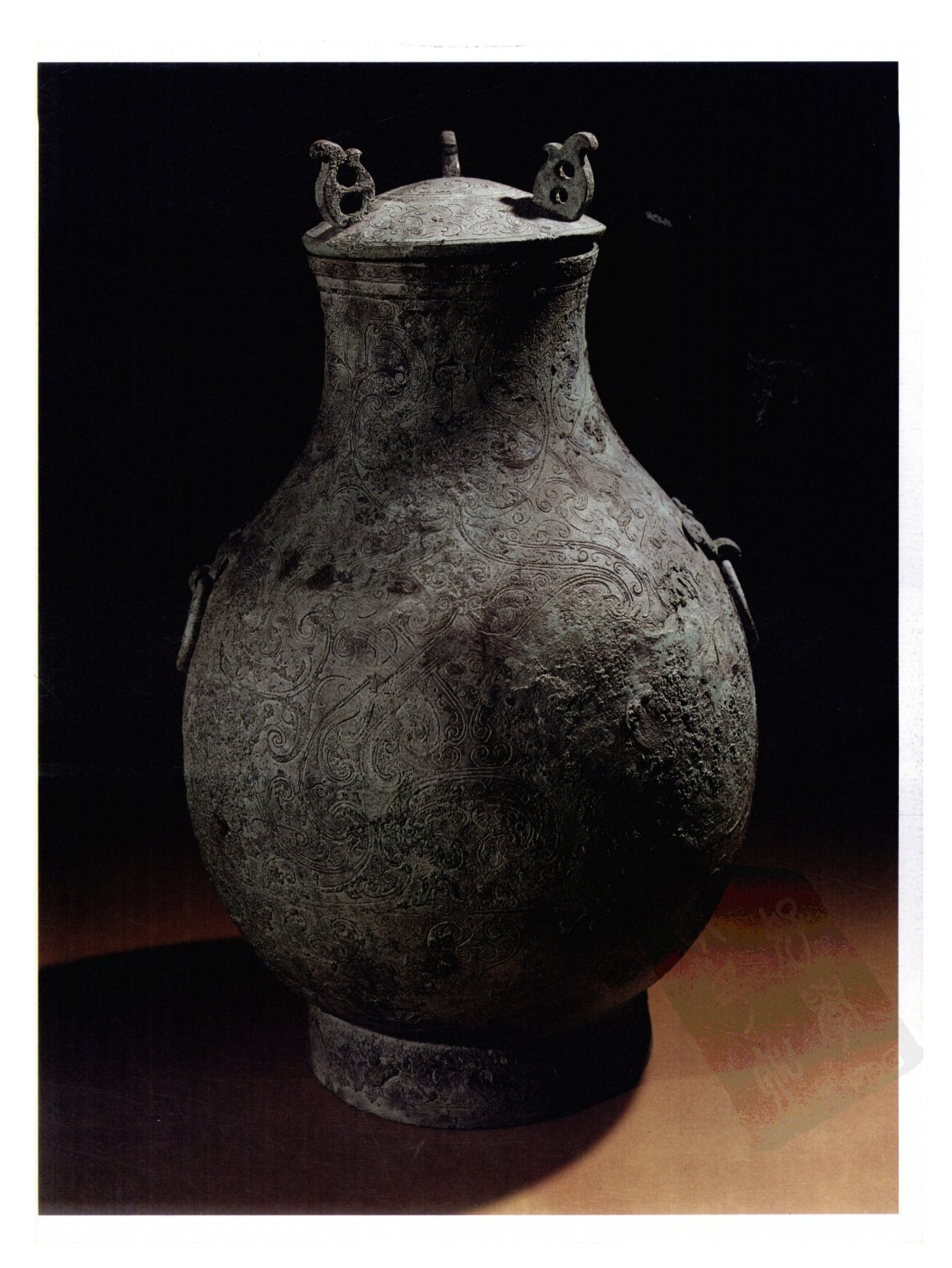




一〇一　棕提梁壺　戰國



一〇二　四耳壺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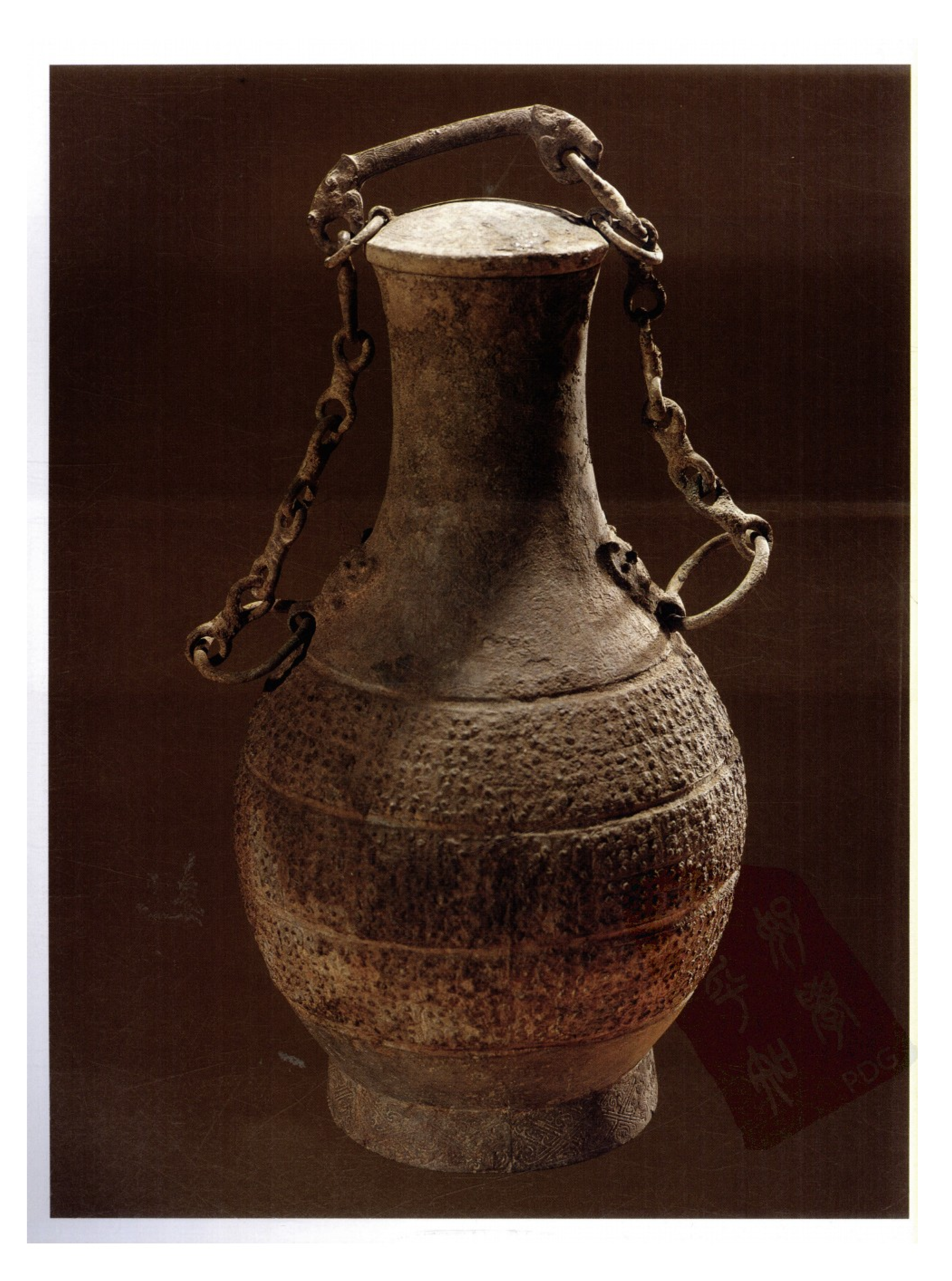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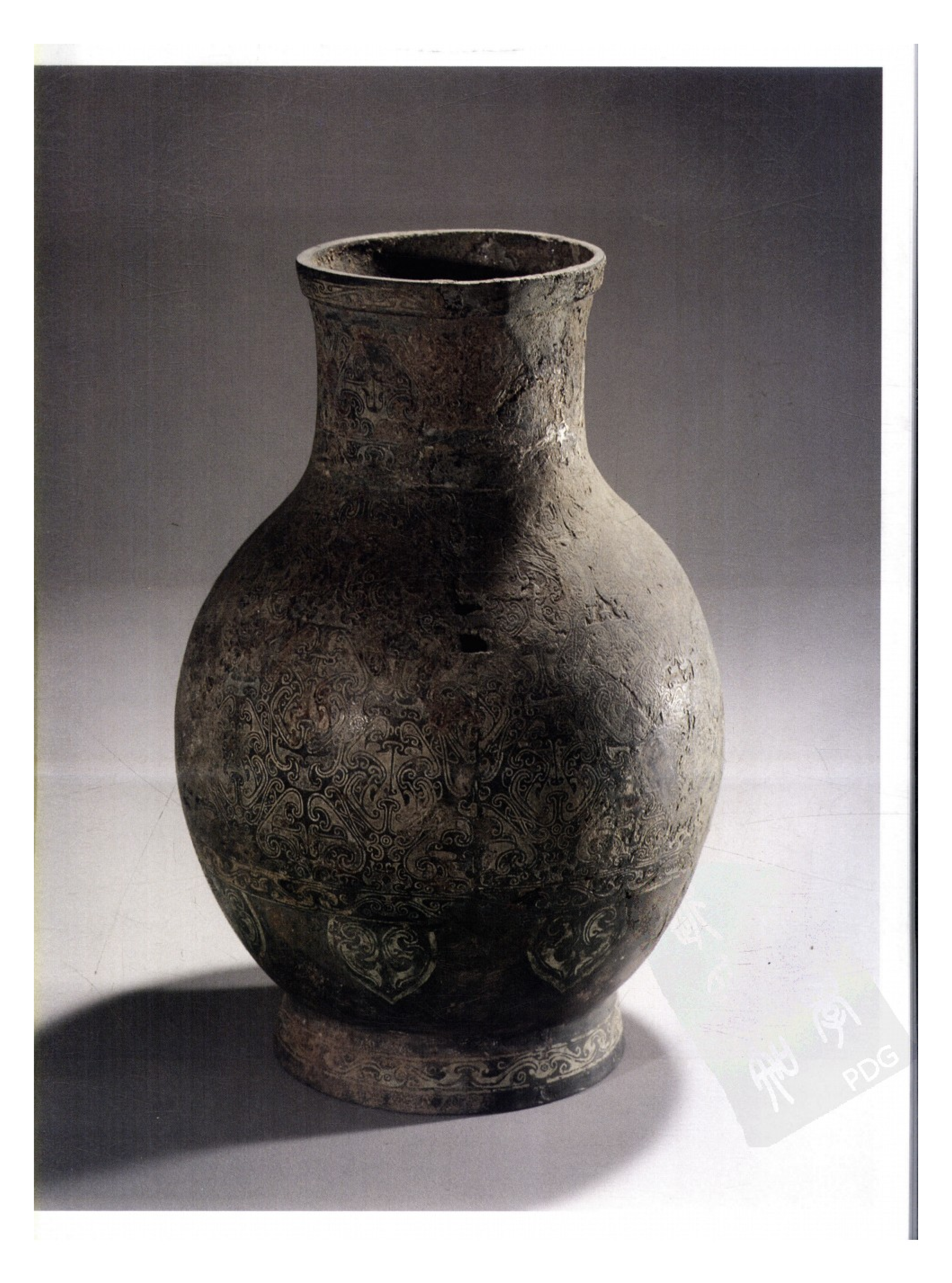




一〇三 — 一〇五　嵌錯雲紋壺　戰國

一〇六　提梁壺　戰國







一〇八　嵌錯雲紋方壺　戰國

一〇七　嵌錯雲紋壺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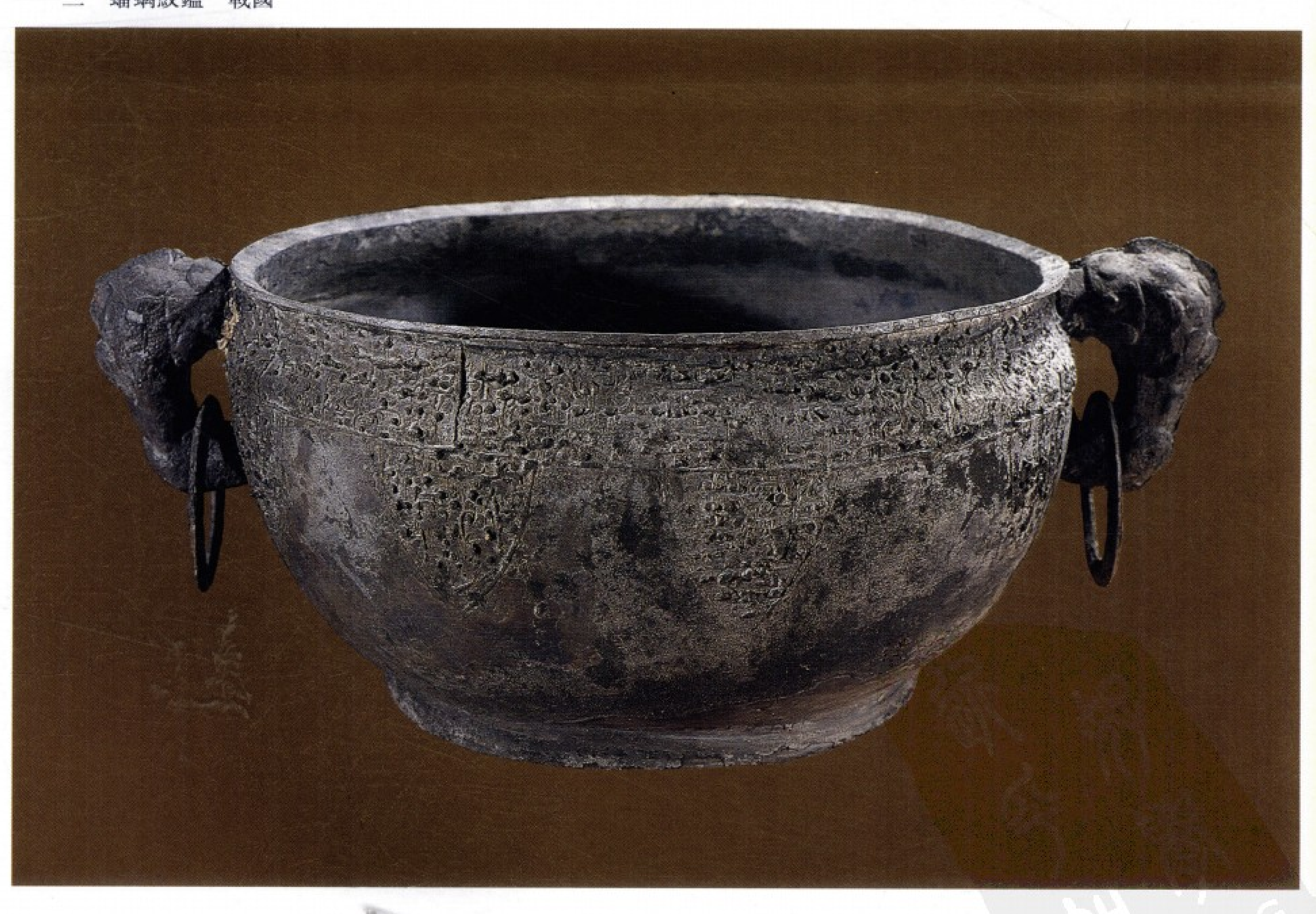


一〇九、一一〇　鳳鳥紋方壺　戰國



一一一　蟠螭紋缶　戰國

一一二　蟠螭紋鑑　戰國





一一三　敦　戰國

一一四　雲雷紋甗　戰國





一一五　帶蓋單耳鍪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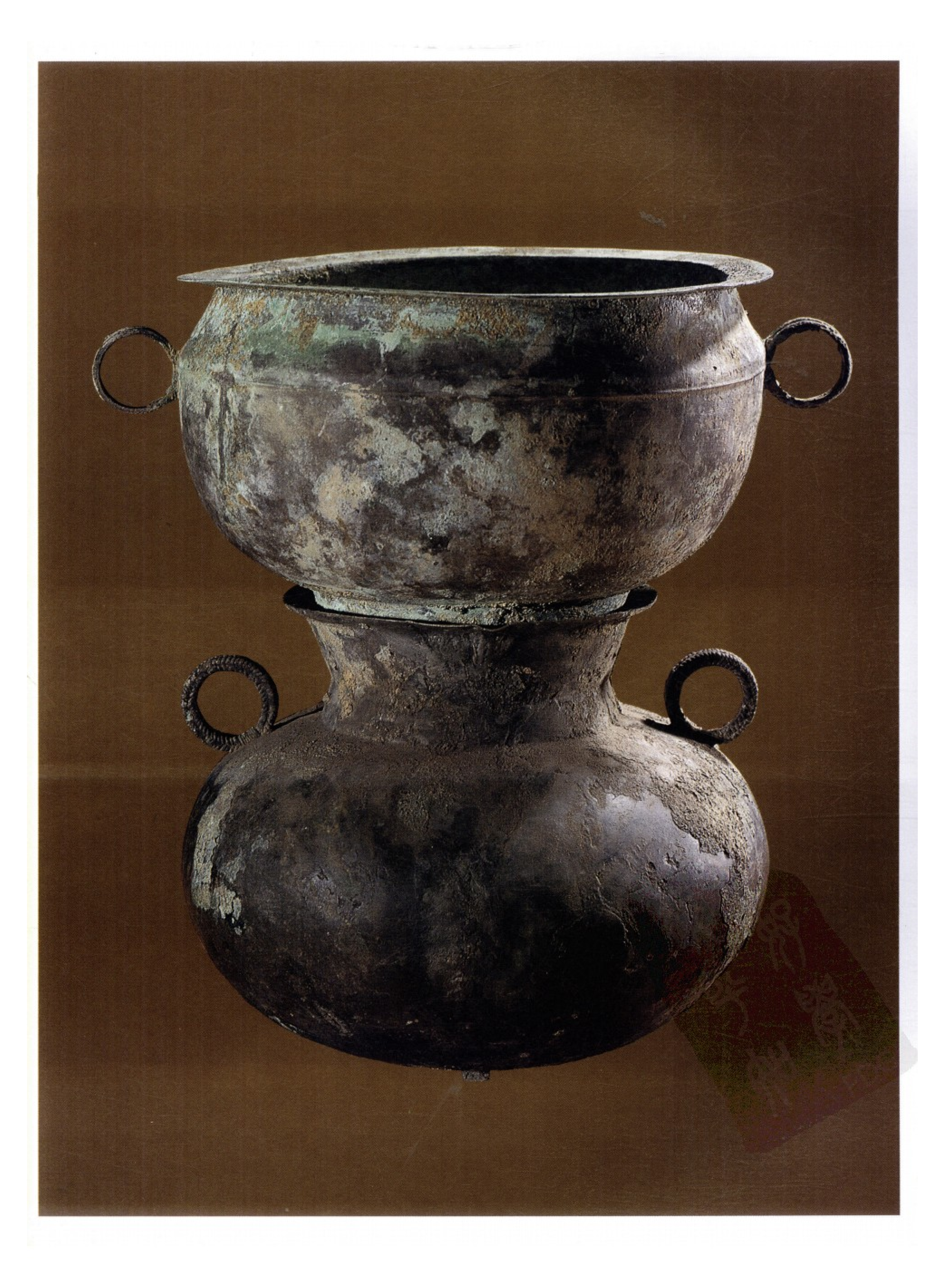
一一六　雙耳鍪　戰國



一一七　雙耳釜　戰國

一一八　連體甑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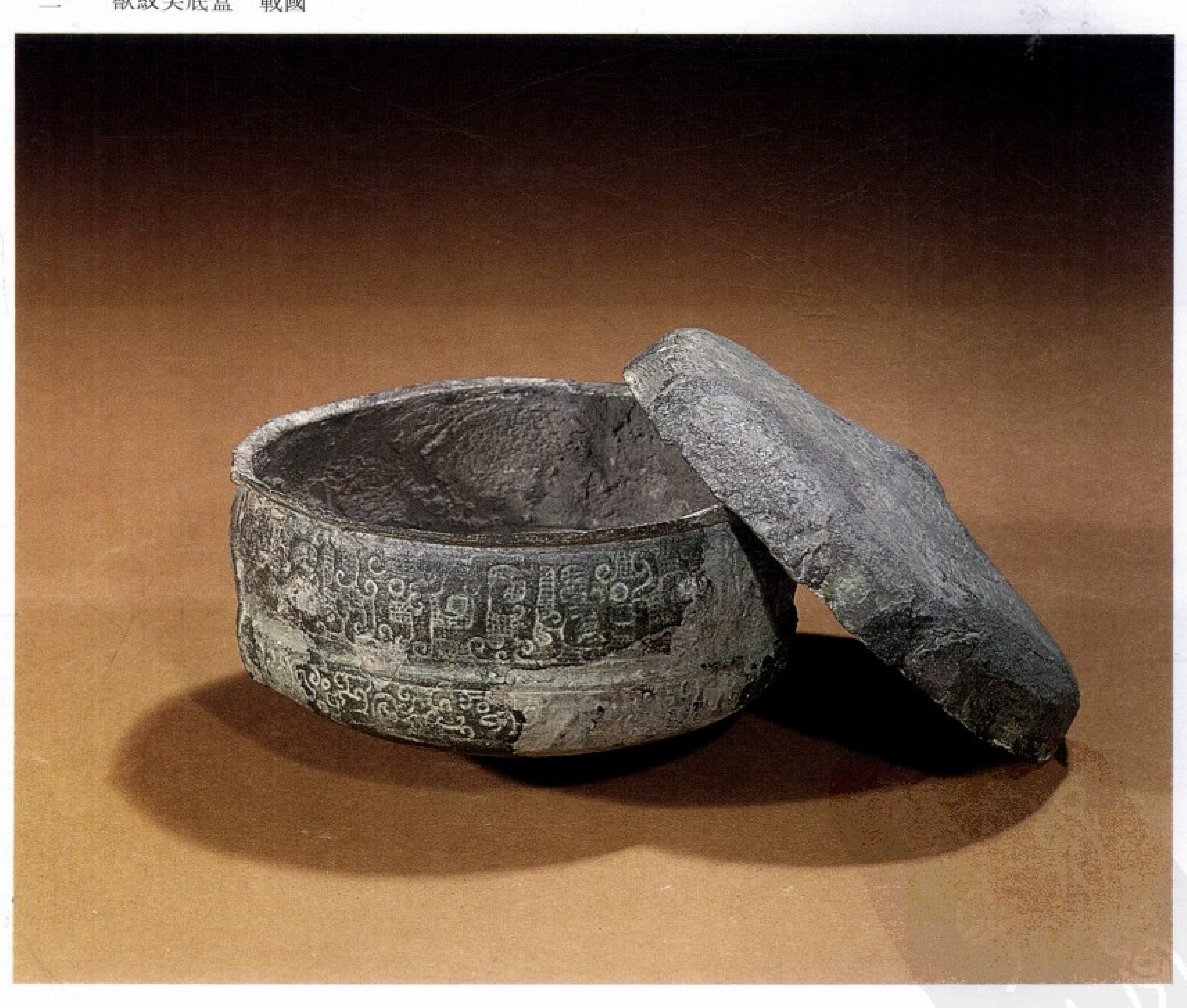






一二〇　尖底盒　戰國

一二一　獸紋尖底盒　戰國





一二二　折腹盤　戰國



一二三　豆形器　戰國

一二四　三足盤形器　戰國



一二五　燈臺　戰國



一二六　齒刃長援戈　商代中期

一二七　齒刃長援戈　商代晚期



一二八　獸面紋長援戈　西周

一二九　蠶紋長援戈　西周



一三〇、一三一　獸面紋長援戈　戰國





一三二　人形紋長援戈　戰國



一三三　獸面紋長援戈　戰國



一三四　獸面紋三角形戈　西周



一三五　圓斑紋三角形戈　戰國



一三六　獸面紋三角形戈　戰國



一三七　獸面紋三角形戈　戰國



一三八　鳥紋三角形戈　戰國

一三九　龍紋十字戈　戰國







一四一　虎紋中胡戈　戰國

一四〇　虎斑紋十字戈　戰國



一四二、一四三　虎紋中胡戈　戰國





一四四　虎紋中胡戈　戰國



一四六 蛇紋戟 戰國

一四七　嵌錯獸面紋鏃　戰國

一四八　壁虎紋寬葉矛　西周



一四九　蟬紋菱形矛　戰國

一五一　長骹矛　戰國

一五〇　蛇紋寬葉矛　戰國



一五二　牛鼠紋長骹矛　戰國



一五三、一五四　牛首紋鉞　西周







一五六　平肩圓刃鉞　戰國

一五五　素面鉞　西周

一五七、一五八　獸面紋短劍　戰國



一五九　鳥紋劍　戰國

一六〇 虎斑紋劍 戰國

一六一 虎紋劍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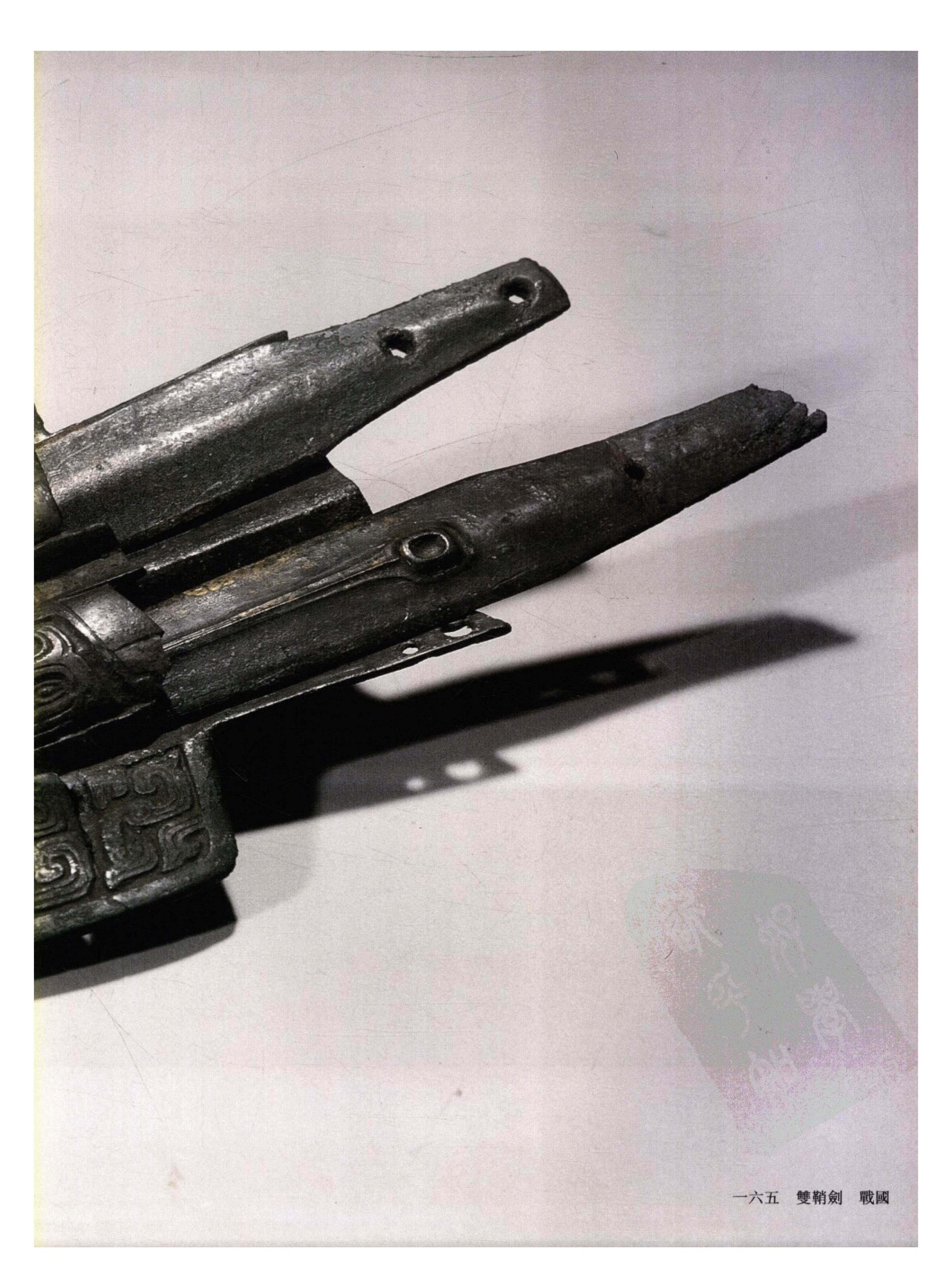
一六二　虎斑紋木柄劍　戰國



一六三　單鞘劍　戰國

一六四　雙鞘劍　戰國





一六五　雙鞘劍　戰國







一六七　環首刀　戰國

一六六　寬首劍　戰國

一六八 錛 西周



一六九　斧　戰國

一七〇　鑿　戰國

一七一　曲頭斤　戰國

一七二　削　戰國

一七三　雕刀　戰國

一七四　手鋸　戰國

一七五　雙齒鋸　戰國





一七六　鳳紋匕　戰國

一七七　雲紋匕　戰國





一七八　鹿形帶鈎　戰國



一七九　嵌錯犀牛帶鈎　戰國

一八〇、一八一　方印　戰國





一八二、一八三　印　戰國


58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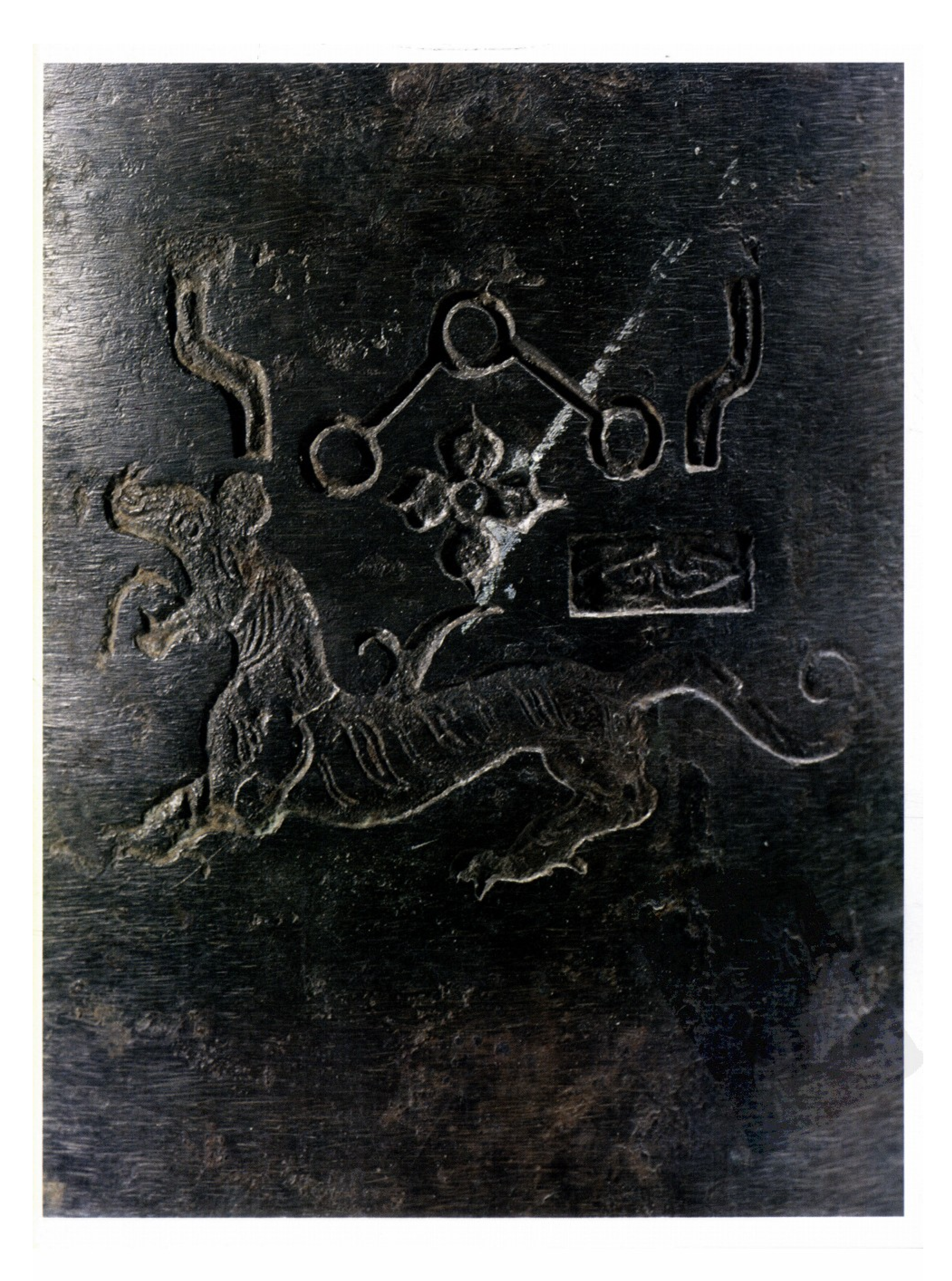




一八四、一八五　虎鈕錞于　戰國

一八六　虎鈕錞于　戰國

一八七　王紋鉦　戰國



一八八、一八九　虎紋鉦　西周



一九〇、一九一　龍紋錞鐘　戰國





一九二　太陽紋錞鐘　戰國

一九三　蟬紋鐘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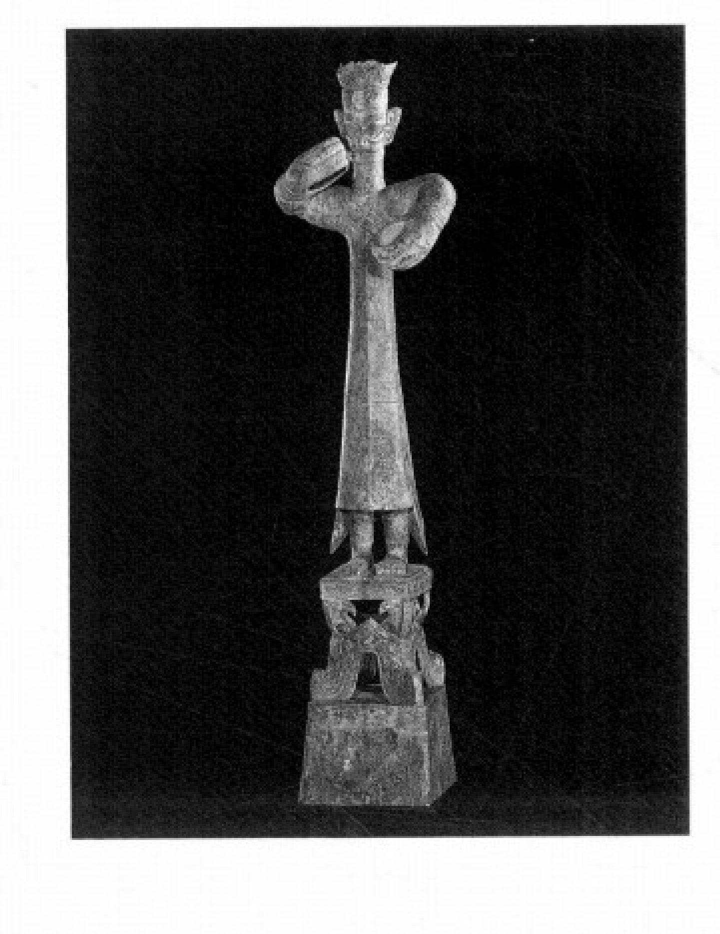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一九五　編鐘　戰國









一—四 立人像

商代晚期
人像高一七二、底座高九〇、通高二六二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立人像由人像和底座兩部分構成，採用分段嵌鑄法鑄造。底座下部呈覆斗狀，素面；中部爲四大象頭狀的卷鼻獸面連體；上部架置一正方形平臺，平臺四周飾目紋、聯珠紋及雲雷紋。人像粗眉、大眼、方頤、闊口，頭戴回紋高冠，表情肅穆。左手平抬齊胸，右手上舉及頭，兩手呈握物狀，手腕戴鐲，赤脚站立于底座上。

人像着三層華衣。外衣爲方披，斜披繫帶，上飾四組龍紋。中層爲尖擺長衣，內着過膝長裾，均飾獸面紋。周邊飾雲雷紋。

五 人頭像

商代中期
橫徑一五、縱徑一四、殘高一七·五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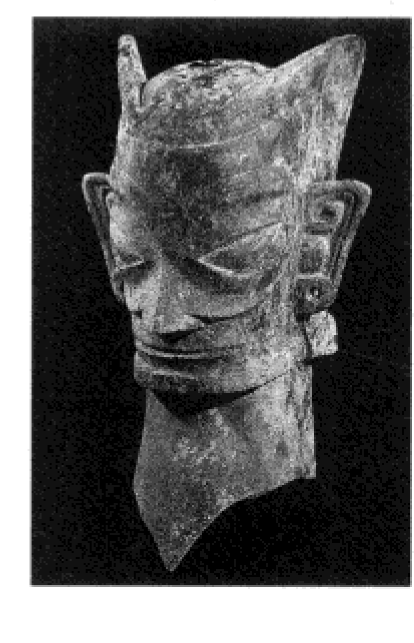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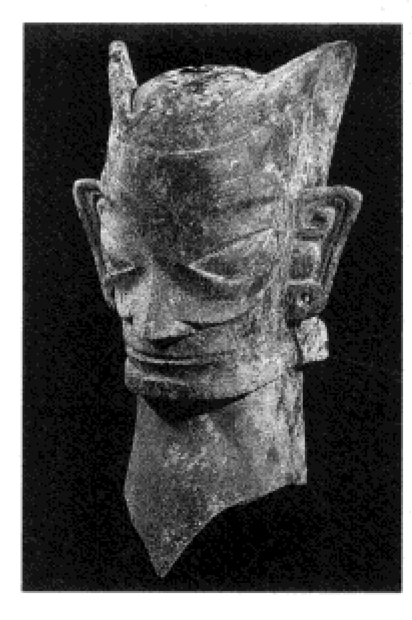
頭頂成子母口狀，子母口內斂，前方有兩小圓穿孔，可能原來頭頂上安裝有頭飾或冠。倒梯形臉，上寬下窄，杏形圓眼，長方耳，耳根部較厚，耳垂上有穿孔，鷹鈎鼻，彎刀眉，闊口，閉唇，嘴角下鈎，下頜寬圓，粗頸。頸前後鑄成的倒三角已殘。



六 人頭像

商代中期
橫徑一五、縱徑一八、殘高二九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頭頂爲子母口形，原來應套接有冠飾。杏狀立眼外凸，蒜頭鼻，高鼻梁，闊口，雙唇緊閉，下頜寬圓，雲雷紋豎耳，耳垂有穿孔。粗頸，頸以下被火燒殘嚮上卷起。該頭像線條圓潤，頗具寫實風格。

七　人頭像

商代中期
橫徑一四、縱徑一六、通高四六・七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頭似戴雙角形頭盔，面部戴方形面罩，頭盔下有頭套將頸部套住，僅露後腦勺。後腦勺上有一插髮笄的凹痕。長方形臉，斜直眉，橄欖狀立眼，高鼻尖，闊口，閉唇，嘴角下鈎，表情威嚴。頭頂有鑄造時銅液滯留而形成的孔洞。



八　人頭像

商代中期
橫徑一六・五、縱徑一八、通高三七・五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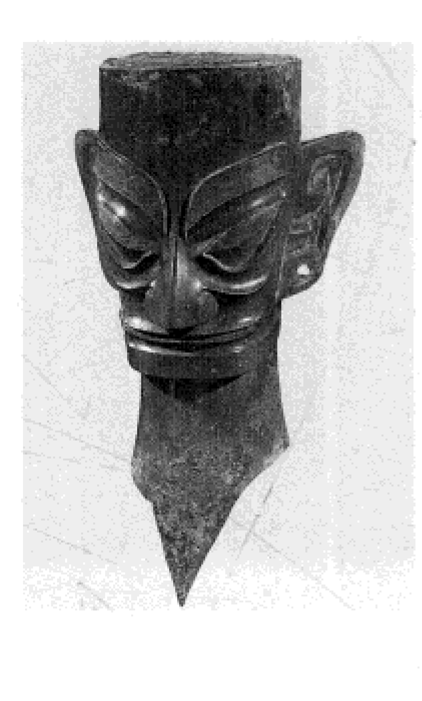
體型較大。三角形立眼，彎刀眉，圓鼻，鼻梁不明顯，闊直口。窄長方形豎耳，耳垂穿孔。下頜寬圓。頭戴平頂冠弁，髮辮垂于腦後。頸部被火燒熔，嚮上翻卷。



九　人頭像

商代中期
橫徑一六・五、縱徑一八、殘高三七・五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頭頂平，似戴平頂帽。刀狀寬眉，尖圓鼻頭，闊口，雙唇緊閉，雲雷紋豎直方耳，耳垂穿孔，粗頸，頸以下鑄成倒三角形，髮辮上端紮束，下端殘。







一〇　人頭像

商代晚期

橫徑一一・二、縱徑一三、通高三六・七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平頭頂，刀狀長眉，杏形立眼，眼瞼線下垂。三角形鼻，鼻梁挺直，長直耳，耳垂穿孔。闊口，閉嘴，寬下頜。粗頸，頸前後鑄成倒三角形，前短後長。頭髮嚮後梳理，髮辮垂于腦後，髮辮上端紮束。

一一、一二　人頭像

商代晚期

橫徑一七、縱徑一五・六、通高三九・三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頭型瘦長，平冠，頂殘。彎眉杏眼，眼瞼線下垂，三角形尖鼻，豎長直耳，耳上端較寬，耳垂穿孔。闊口，閉唇。粗頸，頸以下前後鑄成倒三角形。頭髮嚮後梳理，髮辮垂于腦後。髮辮上端紮束。

一三—一五　人頭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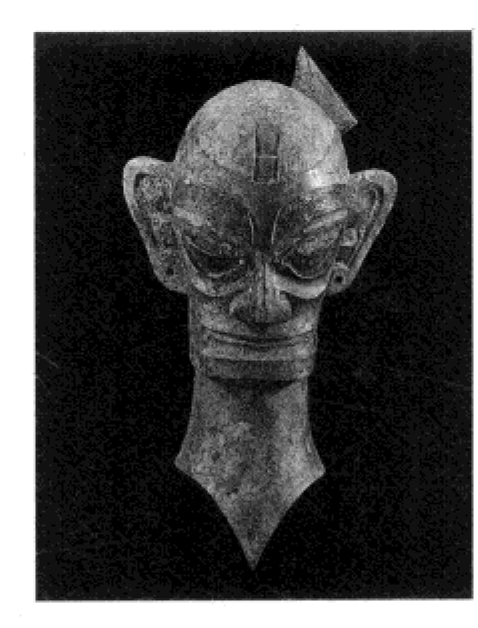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橫徑六・六、縱徑七・四、通高一七・七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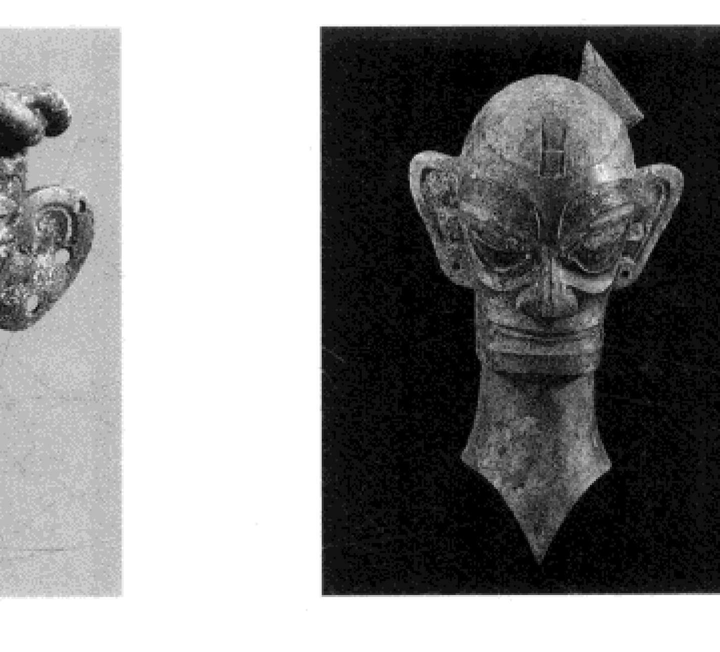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平頭頂，長眉杏眼。雲雷紋長方耳，耳垂穿孔。三角形鼻，鼻梁挺直。闊口，閉唇。髮辮垂于腦後，髮辮上端紮束。頸部以下鑄成倒三角形。







一六—一八　人頭像

商代晚期

橫徑一一厘米、縱徑一二·八、通高三七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圓頭頂，面罩從臉部蒙至頭頂。面部又蒙上一層和金面罩形制相同的面罩。頭髮從後往前梳，并斂于冠內，後腦上斜插一扁圓形髮飾。倒八字眉，丹鳳眼。三角形鼻頭，鼻梁較直。闊口，閉唇。寬方頤。長條形耳廓，耳垂上有穿孔。頸較粗，頸以下前後鑄成倒三角形。

一九　人頭像

商代晚期

高一三·五、寬一〇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圓頭頂，頭上戴辮索狀圓箍，應是『頍』。粗長眉，杏形眼，蒜頭鼻，鼻尖微上翹。圓耳廓，外緣上有三圓孔，短頸，前面鑄成倒三角形。

二〇　人頭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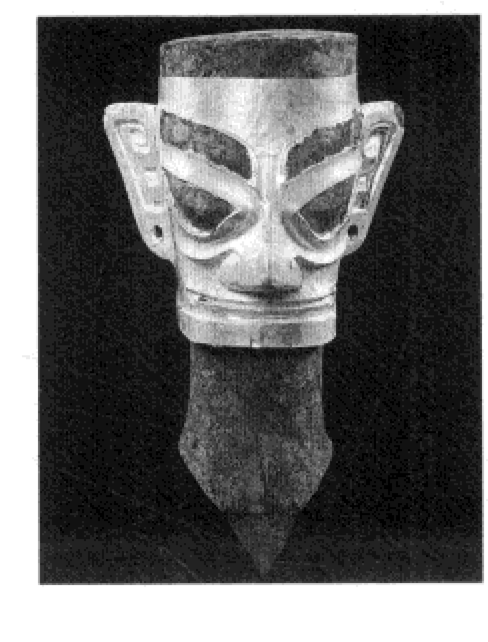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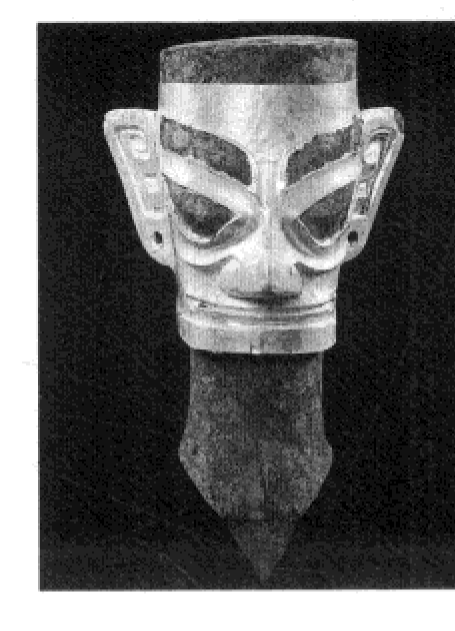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橫徑一〇·七、縱徑一三·七、通高三四·七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頭戴回字紋平頂冠，面部戴有面罩。頭後有髮際線，可知頭髮是韜斂于冠內的。倒八字眉，栗狀立眼，蒜頭鼻，長方耳，耳垂穿孔。闊口，閉唇，方頤。頸以下前後鑄成倒三角形，頸下右側有一穿孔。



二一、二二　金面罩人頭像

商代晚期
橫徑一二·七、縱徑一四·三、通高四一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由銅頭像和金面罩兩部分組成。銅頭像爲平頂，頭髮嚮後梳理，髮辮垂于腦後，髮辮上端紮束。面部戴面罩，立刀眉，杏眼，直長耳，耳垂穿孔。蒜頭鼻，直鼻梁。闊口，閉唇。粗頸，頸以下鑄成倒三角形。金面罩用金箔製成，大小、造型和頭像面部特徵相同，雙眼雙眉鏤空，用土漆調和石灰作粘合劑，將金面罩粘貼于銅頭像上。

二三、二四　金面罩人頭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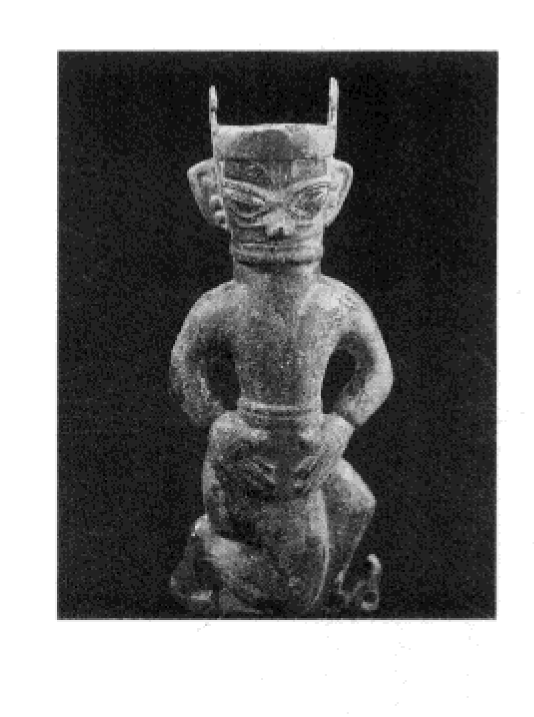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橫徑一六·七、縱徑二一·四、通高四八·五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由銅頭像和金面罩組成，頭像上又鑄出與金面罩大小相同的輪廓線。頭髮從後往前梳理，腦後有插戴飾件的穿孔。倒八字眉，丹鳳眼，蒜頭鼻，鼻梁較直。闊口，閉唇。寬方頤，長條形耳廓，耳垂穿孔。粗頸，頸以下前端圓，後鑄成倒三角形。金面罩用金箔製成，大小、造型和銅頭像面部特徵相同，雙眼雙眉鏤空，用土漆調和石灰作粘合劑粘貼于銅頭像面部。

二五　踞坐人像

商代中期
高一五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寬臉，方頤，雲雷紋豎直方耳，耳垂穿孔。圓眼，正視前方，張口露齒，神態嚴肅。頭髮從前嚮後梳，再嚮前卷，上有髮套，似扁高髻。上身穿右衽交領長袖短





衣，腰間繫帶兩周，下身着犢鼻褌，一端繫于腰前，另一端繫于背後腰帶下，脚上套襪，兩腕上各戴二鐲，雙手扶膝踞坐。

二六　跪坐人像

商代晚期
高一三·三、寬五·六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頭上戴『頍』，面部戴有面罩。粗眉，橄欖形立眼，耳厚大，高鼻，闊口，閉唇，眼、眉及顳顬描黛。身着對襟長袖服，腰間繫帶兩周。兩手捧腹。左腿弓立，右膝着地跪坐。

二七、二八　突目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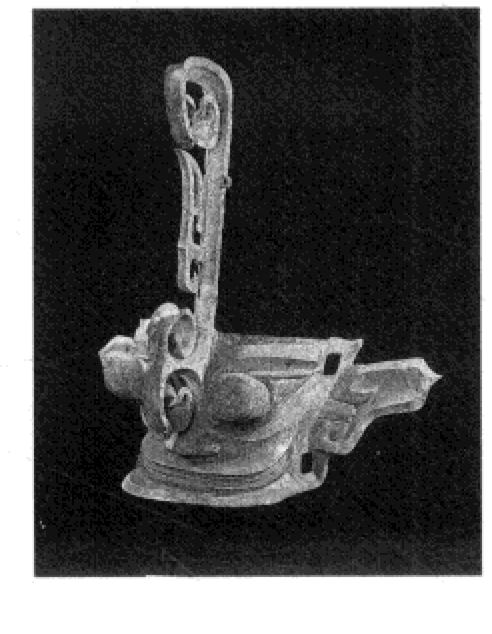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高六五、寬一三八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面部爲長方形，斷面成『U』形。額中一方孔，原應安有額飾。長眼眶，眼球瞳孔突出，呈圓角菱柱狀，直徑一六·五、長一三·五厘米。鷹鈎鼻，闊口，口縫深長，方頤。耳前上下各有一長方形穿，可能是供安裝使用的榫孔。

二九　人面具

商代中期
高六·五、寬九·二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寬臉，圓下頜，粗彎眉，大眼，尖鼻，闊口，口唇緊閉，雲雷紋小圓耳廓。







三〇　突目面具

商代晚期
高三一、寬七七・八、通高八三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面部呈長方形。角尺狀大耳嚮兩側展開，倒八字形長刀眉，臣字形眼，眼球呈圓角菱柱狀嚮外突出。鷹鈎鼻，闊口，口縫深長，口微張，露舌。方頤，下緣嚮前伸。在額正中用補鑄法安裝有額飾，成勾雲狀，外卷角，中部飾刀狀羽翅。眉眼描黛，口唇塗朱。

三一　人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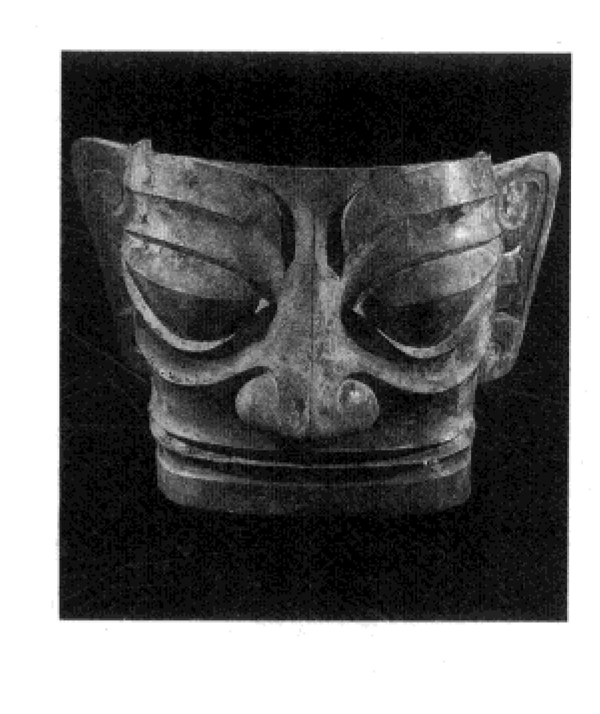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高二五、寬二七・三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臉方正，面部瘦削。寬濃眉，杏仁眼，三角鼻，鼻梁高直。闊嘴緊閉，嘴角下鈎，下頜扁方，長耳略尖，耳輪作勾雲狀，耳垂穿孔。耳際上下各有一穿，爲組裝使用面具時的榫孔。

三二　人面具

商代晚期
高二六、寬四一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臉寬短，上寬下窄，寬額。三角形鼻，鼻梁短直，鼻頭肥大，長方耳廓，耳垂有圓窩。長刀眉，栗狀眼，寬方頤，闊口，閉唇。下頜嚮前斜伸。眉、眼描黛，口唇塗朱，額正中及耳側上下各有一方孔。





三三　人面具

商代晚期
高六〇、寬四〇・五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臉方正。長刀眉，三角形立眼。長方耳，耳垂穿孔。蒜頭鼻，高鼻梁，直達額中兩眉間。闊口，閉唇，唇塗朱。頤方圓，緣陡直。眉梢末端各有一方孔，面具後緣上、下轉角處亦有方孔。

三四　人面具

商代晚期
高一五、寬一九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長臉型，個體較小。濃眉，杏眼，三角形鼻，鼻梁高直。顎骨突起，嘴唇緊閉，嘴角下鈎，下頜方正，雙耳平直，耳輪作勾雲紋狀，耳垂穿孔。耳際上下各有一個方孔，作組裝榫眼用。

三五　人面具

商代晚期
高二六・六、寬四二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方臉形，下頜寬扁，顎骨突出，濃眉立目，高鼻，闊口，勾雲紋長方形直耳，耳垂穿孔。耳際上下各有一方形穿，爲組裝使用面具時的榫孔。







三六　獸面具

商代晚期

高一二・四、寬二七・九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身尾嚮兩面展開上卷。長眼瞼，成S形，由鼻部直達身尾，眼球近圓角四方形，闊口。面具上下兩側外緣有小圓孔。



三七　獸面具

商代晚期

高二一、寬三八・四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面具爲片狀，獸目圓睁。鼻長且直，鼻孔外翻，大口露齒，雙耳作立狀外翹。雙眉又粗又長，嚮兩側伸展鈎曲，與雙角相連，額頭有劍鋒狀飾物。面具四角有小孔，作懸掛組裝使用。

三八　獸面具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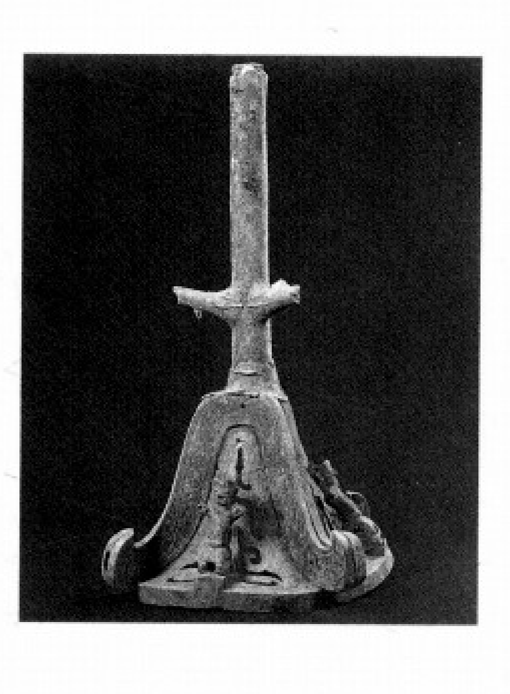
高一九・六、寬二三・四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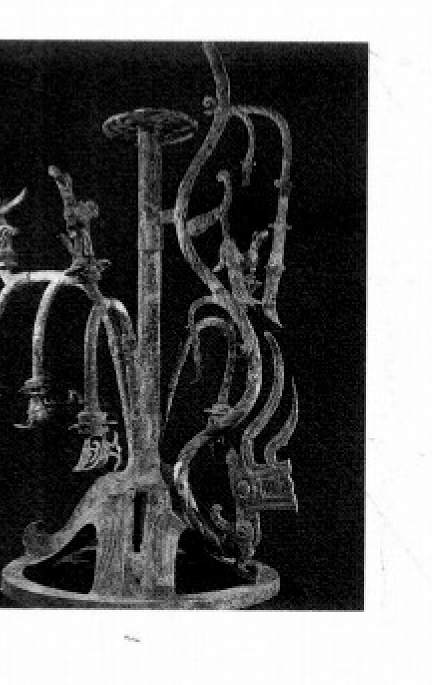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面具爲方形扁片。獸眼圓睁，鼻長而直。嘴大而寬，嘴角下鈎，現出兩排整齊的牙齒。雙耳作勾雲狀。眉粗而長，嚮外側伸展，與內鈎的雙角相連。頭頂有劍鋒和勾雲狀飾件。獸面具四角有小孔，作懸掛組裝使用。







三九　獸面具

商代晚期
高二〇、寬二六．六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面具爲方形扁片，雙眼圓睁，鼻高且直，張口呲牙，雙耳作勾雲狀。眉粗且長，嚮外側伸展鈎曲。頭頂有劍鋒與勾雲狀飾件。獸面下方有一對勾雲狀眼飾。四角有小孔，作懸掛組裝用。

四〇、四一　神樹

商代晚期
殘高一〇八、底座直徑五五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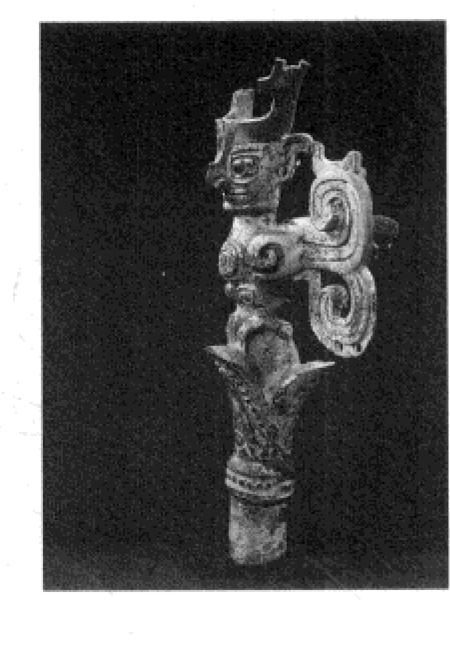
由樹和樹座兩部分組成。樹座呈喇叭狀，一面殘缺，另兩面鏤空成雲紋狀，鑄有兩尊跪坐的人像，高二〇厘米，作抬手奉物祭祀狀。銅樹鑄于樹座正中，露樹莌，樹上有目紋（代表日）及雲紋。樹干上殘存三枝杈。



四二－四四　神樹

商代晚期
通高三八四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由樹座和樹身兩部分組成。樹座略呈圓錐狀。底座呈圓環形，飾有重圓紋（代表日）和雲紋，其上爲三山相連狀，亦有重圓紋和雲紋。樹鑄于山頂正中，直干，露根莌。樹干上有三樹枝，每枝三杈，杈上長有桃狀果實，長一七至二九厘米，有的嚮上，有的下垂，有的果上站立一鳥。在樹枝、樹干接口上，均有套環。樹側有一龍緣樹而下。




四五　人首鳥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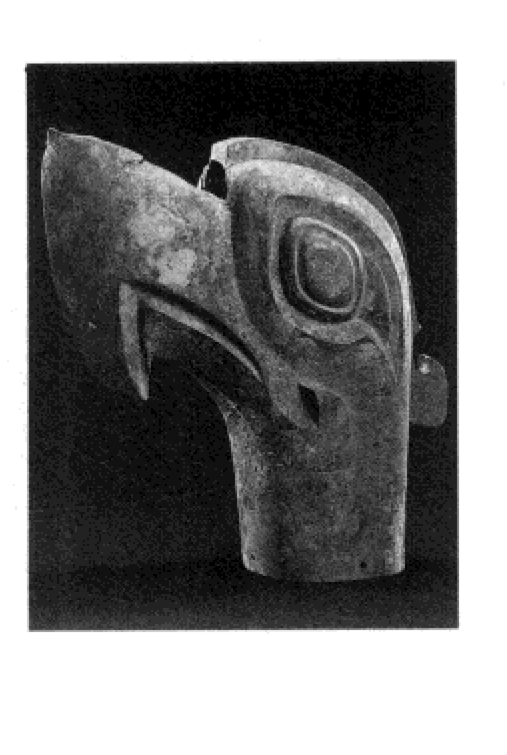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通高一二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此爲銅樹枝頭的飾件。立鳥利爪，寬身，尾羽上翹，雙翅作寬大的勾雲紋狀，鳥身飾勾雲紋，鳥爲人頭，立眼，高鼻，闊嘴，方頤，戴雙翼高冠。與青銅人面具造型相仿，是一件罕見的藝術珍品。

四六　立鳥

商代晚期
高二一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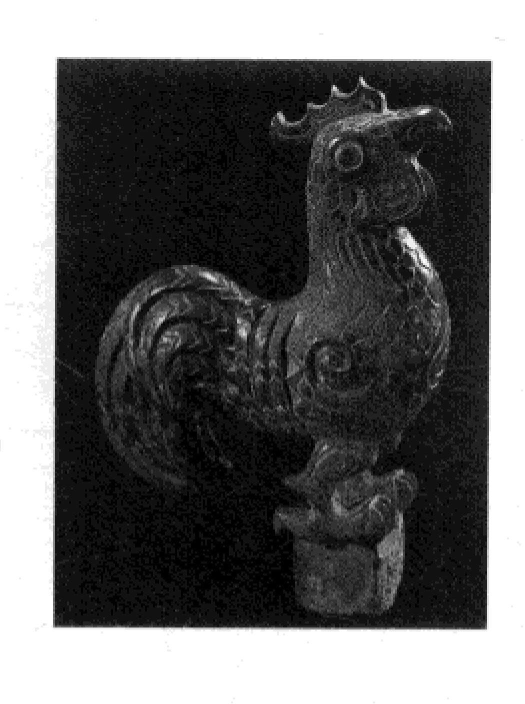
鳥爲銅樹枝頭的飾件，兩眼圓睁，尾羽上翹，雙翅作勾雲紋，巨大的鳥喙呈鈎狀，十分醒目。尖利的鳥爪緊抓枝頭的果實，鳥昂首挺立，造型生動而優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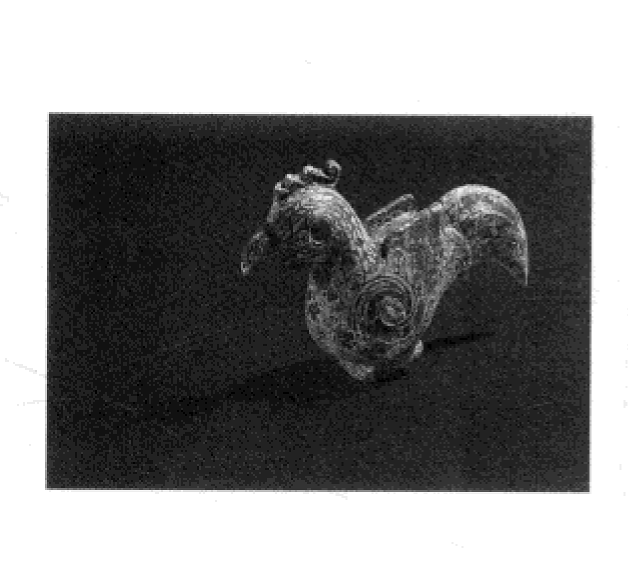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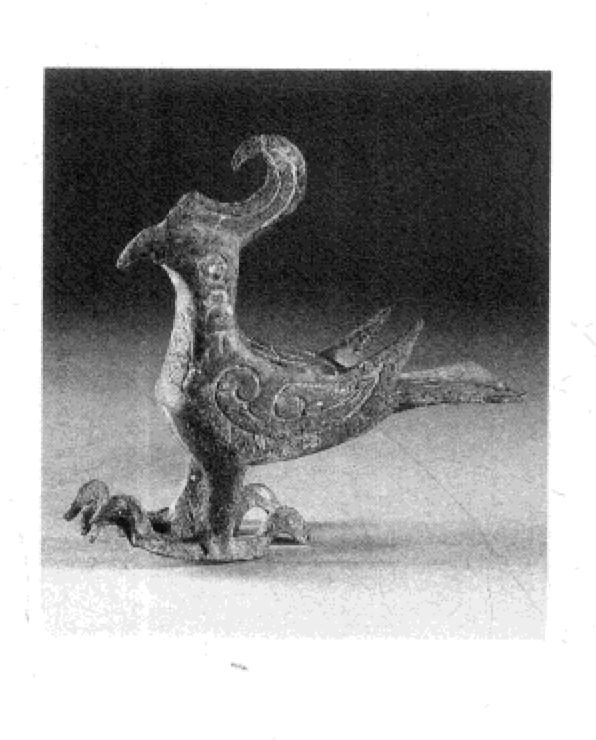
四七　鳥頭

商代晚期
横徑一九·七、縱徑三八·五、通高四〇·三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該器似鷹頭狀，斷面爲橢圓形。矮冠，冠末端上卷。短鈎喙，喙尖嚮下鈎折。弧邊菱形眼珠，三角形耳。鈎喙口縫及眼珠周圍繪朱。器下端近口處有三圓孔，可能是某種器物上的飾件。







四八　鷄

商代晚期

長一〇·二、通高一四·二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高冠尖喙，身體肥碩，尾羽豐滿，挺胸昂首立于方座上，造型生動。

四九　鷄

戰國

長八、寬二·六、高二·五厘米

一九八九年四川成都青羊小區出土

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藏

縮頸蹲立，狀若小憩。尖嘴略鈎，齒形冠，尾羽呈弧形。頭頸飾稻穗紋，腹部及雙翅根部飾渦形紋，尾部飾羽狀紋。

（翁善良）

五〇　立鳥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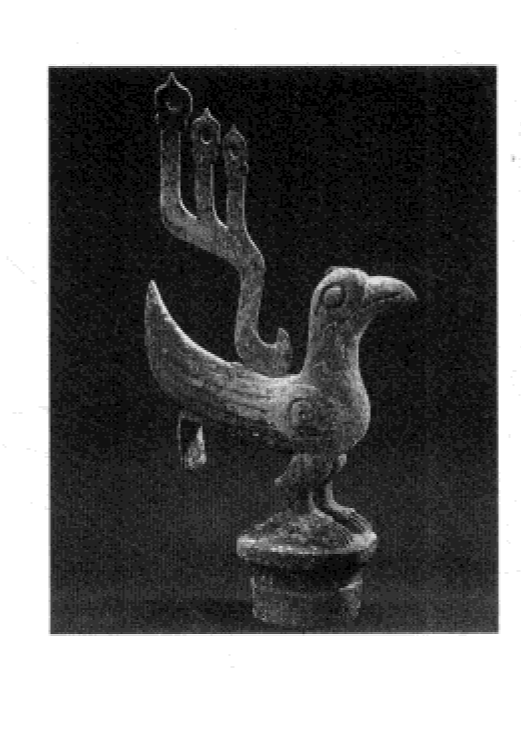
高一一·六、長一二·五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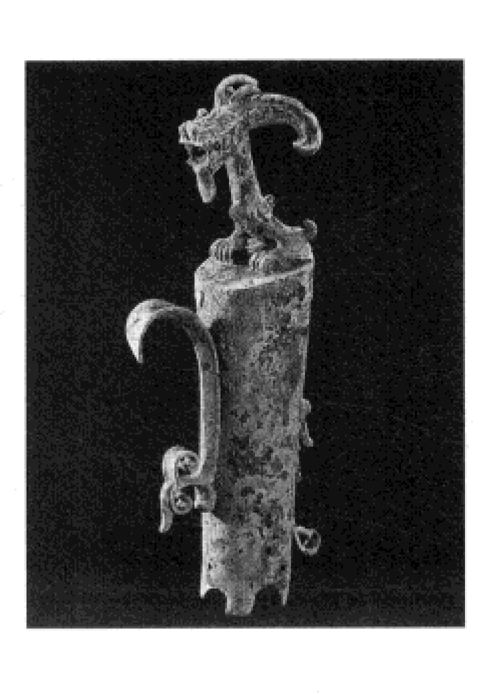
一九九二年四川茂縣牟托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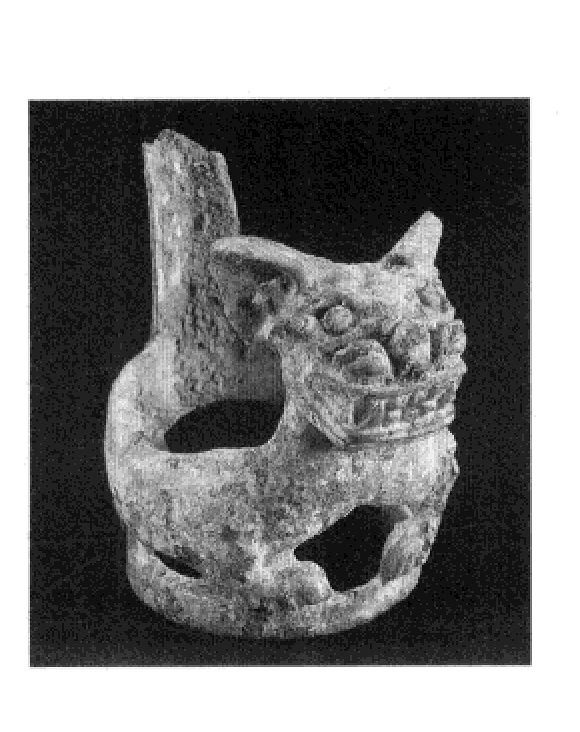
四川省茂縣羌族博物館藏

尖嘴嚮下彎曲，昂首，頭頂高冠聳立，冠尖嚮前彎曲作鈎狀。雙翅微張，翅尖上翹。長尾，巨爪，爪尖彎曲。鳥身羽飾皆爲陰線。

（蔡　清）攝影　孫之常









五一　立鳥

商代晚期
高二八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巨眼尖喙，長翅分尾，背羽聳起成流蘇狀，引頸站于圓座上，座側有四圓孔。此物可能爲某器的附件。

五二　爬龍柱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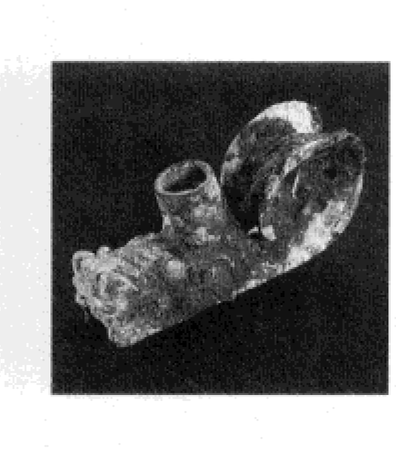
商代中期
高四〇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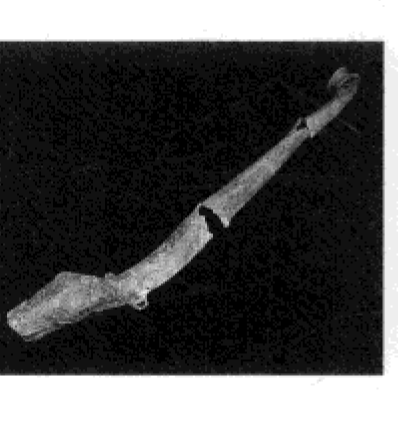
器身爲圓柱形，上大下小。器頂平，下端四周有半圓形小缺口。在缺口相對應的上方各有一圓形小孔。器上有一龍昂首站于器頂上，下半身垂于器壁，兩後爪緊抱器壁兩側，尾上卷。龍張口露齒，有胡鬚，巨耳，兩耳之間有一對犄角。在器壁另一側有一勾雲紋飾件。此器可能是套在木柱頂端的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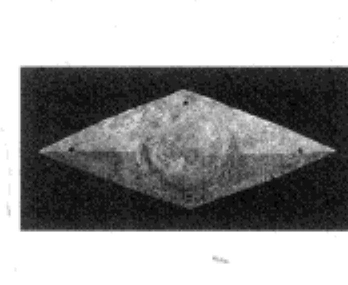
五三　虎形飾件

商代中期
圓座徑八、虎身長一二、殘高一一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方頭昂首，圓眼，尖圓形大耳，張口露齒，豎尾，尾尖殘。身肥碩，作圓圈狀，四足立于圓座上。







五四　龍形飾件

商代中期
長八・二、高四・四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方頭，張口露齒，管狀獨角，身尾彎內卷曲，造型奇特。

五五　蛇形飾件

商代晚期
殘長五四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軀體細長。方頭昂起，口微張，露齒，長眼瞼，眼瞼上鈎。背部飾菱形回紋，腹部飾瓦狀鱗紋，兩側有半圓形掛耳。尾卷曲。

五六　太陽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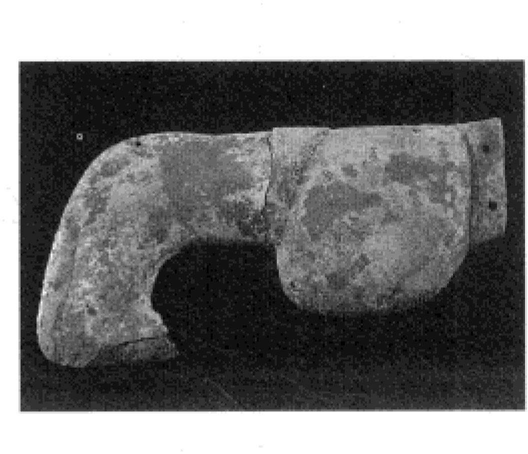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徑八五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器中間爲圓凸形，周圍有五芒，呈放射狀，芒外有一周暈圈。在圓凸中心及暈圈上，各有一小孔，作固定使用。

五七　菱形眼飾

商代晚期
長五七・四、寬二五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菱形，周緣斜平，中部眼球呈圓形凸起，眼球周圍下凹，兩側有棱脊。四角上各有一安裝固定使用的圓穿孔。



五八　勾雲形眼飾

商代晚期
長二九、高一四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扁片狀飾件。爲一隻變形的人眼，中部是瞳孔，爲一圓角方形的圓泡，漲出下眼眶之外。眼角內側呈方形，外側眼角作勾雲狀，嚮下彎曲。飾件四角有小孔作組裝固定的榫眼用。此種勾雲形眼飾，均很粗大，上面還有單獨的粗眉，反映了古蜀人對眼的崇拜。

五九　獸面紋鈴

商代晚期
橫徑七、縱徑三・六、高七・三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扁桶狀，斷面爲長橢圓形。兩側有寬而薄的長條形扉棱，兩面飾獸面紋，獸面爲立眼，內卷角。在獸面紋兩側填以雲雷紋。獸面紋上塗朱。



六〇　獸面紋鈴

商代晚期
橫徑四・一、縱徑八・六、高七・六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桶部斷面爲橢圓形，口部呈喇叭狀。桶頂部有一半圓鈕。桶兩面飾獸面紋，獸爲圓眼，眼角鋭長，張口露齒，口銜辮索狀圓環。



六一　鷹形鈴

商代晚期

高一四、寬八．八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鈴作鷹蹲棲狀，兩側有翼狀扉，兩面有羽翅。鷹爲鈎鼻，喙尖鋭，大眼，矮冠，冠上有一拱形鈕，鈕上套一環。鈴舌作獠牙狀。

六二　花蒂形鈴

商代晚期

口徑七．八、通高一二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鈴爲喇叭花狀，頂部爲花托，上有拱形提鈕，鈴上段爲圓果狀，飾水波紋一周，波峰間飾圓圈紋。鈴下段爲四個花瓣，花瓣上刻兩周凹線紋，中間填以聯珠紋。鈴舌爲四瓣花柱狀，上端有一小環和鈴頂內小環相套。



六三　牌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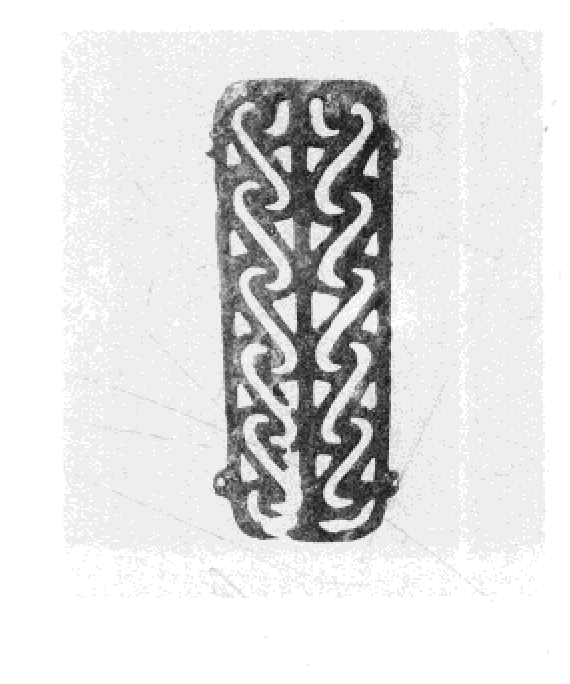
商代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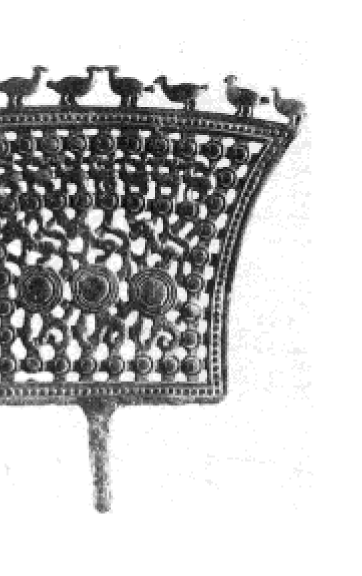
長一三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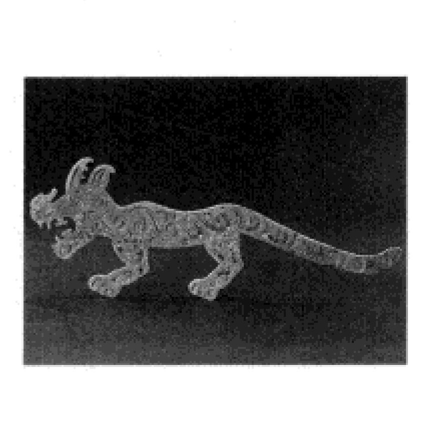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

四川省廣漢市文物保管所藏

器身平面似長方形，上端平直，下端圓弧，體薄，微拱如瓦狀。牌飾鏤空呈變形樹枝紋，主枝兩旁葉芽間三對果枝對稱嚮外斜出，樹枝間有圓形物。兩側邊緣上下各有半圓穿鈕，便于固定在編織物上，銅牌凸面緑銹上有細線織物印痕，凹面銅銹上有竹編紋印痕。此牌飾與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的嵌緑松石饕餮紋牌飾相似。







六四　牌飾

商代早期
長一四厘米
一九八七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略呈長方形，一面微拱呈瓦狀。轉角較圓，兩側近轉角處有半圓形繫耳。全器表面鏤空呈勾雲幾何紋。出土時表面粘有朱色顔料。



六五　動物紋牌飾

戰國
高一三·五、寬一二·七厘米
一九九二年四川茂縣牟托村出土
四川省茂縣羌族博物館藏

牌若有柄扇形，頂部飾八隻鳥，左右相嚮而立。牌內飾三層動物紋，第一層爲七隻長角鹿，頭嚮一致整齊排列；第二層爲三隻昂首張口面嚮一致的虎；底層爲三條曲身卷尾嚮上爬動的蛇。每層動物之間及四周皆以圓泡作界欄，其中虎與蛇之間爲一行三個大圓泡。牌飾四周飾乳釘紋，通體鏤空。

（蔡　清）攝影　孫之常

六六　虎形飾

商代晚期
長三八厘米
一九八四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鴨子河出土
四川廣漢市文物保管所藏

器扁平，滿飾虎斑紋，并嵌綠松石。虎巨頭長尾，張口露齒，昂首怒目，雙耳豎立，四脚呈行進狀，造型生動。腿部上下有鈕孔四個，可作懸繫用。





六七　四羊首獸面紋罍

商代晚期

口徑二〇・七、足徑一八・八、通高三五・五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方唇，直口，頸微束，斜折肩。下腹成弧形內收至底，底平。高圈足，圈足外撇。頸部有三周凸弦紋，肩、腹、圈足上有四扉棱。肩部飾象鼻龍紋，鼻甚長，鼻尖嚮下鈎卷，尾上翹，亦嚮下鈎卷。肩外鑄四外卷角獸頭。腹部飾象鼻龍紋、夔龍紋和乳釘紋。圈足上端有四個方形鏤孔，下緣有八個圓形小鏤孔，中部飾目紋與雲雷紋。

六八、六九　四羊首獸面紋罍

商代晚期

口徑二六・五、足徑二六、通高五四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方唇，侈口，斜沿，直頸，凹弧肩，直腹微斜，下腹成弧形內收，喇叭形高圈足。頸部有三周凸弦紋，肩部有四立鳥將花紋隔成四組，每組爲雲雷紋組成的頭相嚮的象鼻龍紋。肩外緣鑄四個外卷角羊頭。腹部及圈足上有四扉棱，腹部飾乳釘紋和獸面紋，獸面紋爲長直鼻、外卷角。圈足上端有四個方形鏤孔和一周凸弦紋，其下爲獸面紋，下端有六個小圓孔。



七〇－七二　牛紋罍

西周

高七九、腹徑四一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覆豆形蓋，頂飾一蟠龍，四周飾饕餮紋，以一濃眉大眼的人頭爲把手，蓋身飾四牛相嚮而跪。器肩飾相嚮而跪的立體牛頭雙耳，牛尾間飾立體羊頭，腹下飾立體牛犢頭。頸、肩、圈足上各飾弦紋二周。通體素地，嵌綠松石。該器紋飾簡練、造形生動。





七三、七四　象首耳獸面紋罍

西周
高七〇、腹徑三一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盔形蓋，飾四鳥形突棱，中飾夔龍，突棱恰成夔鼻。肩腹間飾長鼻形立體象頭雙耳，雙耳間亦飾立體象頭，腹下飾一獸形小耳。器身、圈足以突棱分爲四組相同紋飾，每組可分上、中、下三層，肩上居中飾一夔龍，兩邊飾夔紋。腹下飾卷身大眼的夔龍，圈足飾跪牛。通體以雲雷紋爲地。該罍以淺浮雕與圓雕的技法突出主體，布局對稱，造型十分生動。

七五　象首耳獸面紋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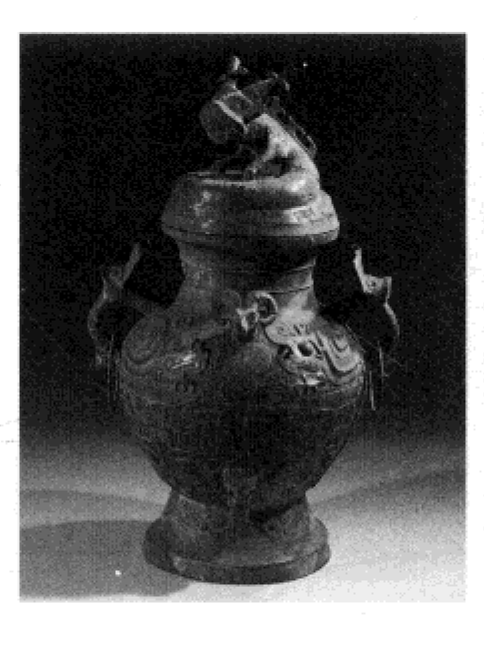
西周
高七〇・二、口徑二二・八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盔形蓋，飾四鳥形突棱，突棱之間飾卷身夔紋，以乳釘爲眼，四趾分明。肩腹間飾立體象頭雙耳，雙耳間一面飾立體象頭，一面爲突棱。腹下飾一獸形小耳，肩上飾夔龍，下腹飾卷身鼓眼夔紋。圈足與下腹之間亦有突棱，突棱間飾一跪牛。通體以雷紋爲地。

七六　蟠龍蓋獸面紋罍

西周
高四八、腹徑二四厘米
一九五九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蓋飾立體昂首蟠龍，扇形角有齒。前足踞于蓋頂，盤尾爲蓋。背上有立棱，身飾雙回紋和常見的巴蜀符號。龍首下飾蟬紋，外飾雲雷紋。罍直口，頸肩之間飾弦紋二周，肩部飾卷身夔紋，四趾分明。對稱獸形雙耳，似爲變形蟠龍。二相嚮夔紋





間爲變形牛首紋，其上飾二相嚮犀紋，二犀之首同合于矮釘柱下。腹部兩面各飾饕餮紋，大口、巨目濃眉。下腹一面有獸頭形小耳，圈足上飾夔紋。通體以雷紋爲地。其形制與中原殷周時期的圓罍略異，而紋飾多與殷周時期銅容器上常見的蟠龍紋、夔紋、雲雷紋相似，反映出中原文化對巴蜀文化的影響。

七七、七八　蟠龍蓋獸面紋罍

西周
高五〇、腹徑二五厘米
一九五九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蓋飾立體昂首蟠龍，角上出枝杈，形似十字，前足踞于蓋頂，盤尾而爲蓋。蟠龍背有立棱，身飾雙回紋和常見的巴蜀符號。龍首下正中飾一蟬紋，外飾雲雷紋，器爲直口，斂頸，頸間飾二周弦紋。肩飾怪獸形帶環雙耳，雙耳間飾立體盤角羊首，羊首下飾牛紋，牛紋兩側爲相嚮的卷身夔龍紋，爪趾分明。空白處填以雷紋。下腹部兩面各飾饕餮紋，其間飾羊頭小耳。圈足上飾一牛紋，兩側爲相嚮的夔紋，空白處填以雷紋。其造型和紋飾與一九七九年遼寧喀左出土的銅罍酷似，反映出南北文化的緊密聯繫。

七九　羊首耳渦紋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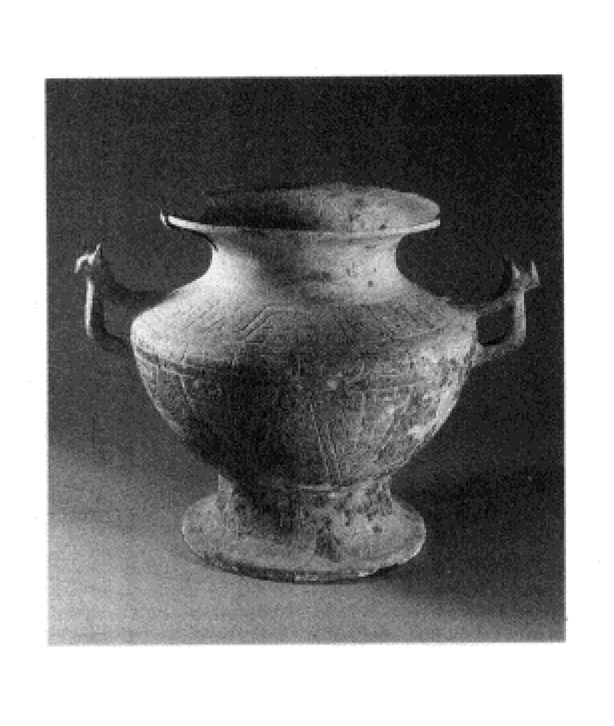
西周
高六八、口徑二四、腹徑三六厘米
一九五九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覆豆形蓋，四面有立棱，立棱間凸鑄四個四合漩渦紋。圈足形把手，子口與器身相吻合。器身直口、斜肩、鼓腹，下收接于圈足。肩飾立體盤角羊首雙耳，環列六個四合漩渦紋，頸間及腹部至圈足四面有立棱，腹下一面有羊犢頭耳。通身素地，造型簡潔明快，鑄造精緻。

攝影　王露







八〇　四渦紋罍

西周

高三六、腹徑二三厘米

一九五九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器形與圖八一的六渦紋罍相同，唯器蓋及身所飾四合漩渦紋爲四個。蓋上圈足形把手稍粗而短，腹部飾弦紋二周，器身正中浮鑄一個羊頭。

八一　六渦紋罍

西周

高三八、腹徑二三厘米

一九五九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覆豆形蓋，圈足把手，飾六個環列的凸圓形四合漩渦紋。器身爲直口、斂頸、斜肩、鼓腹。肩上環列六個凸圓形四合漩渦紋，對稱獸頭形雙耳，腹下另飾一獸形小耳。頸間飾弦紋二周，肩腹間飾一周凸弦紋，弦紋間飾以橫聯的常見巴蜀符號。

八二　牛首耳夔龍紋罍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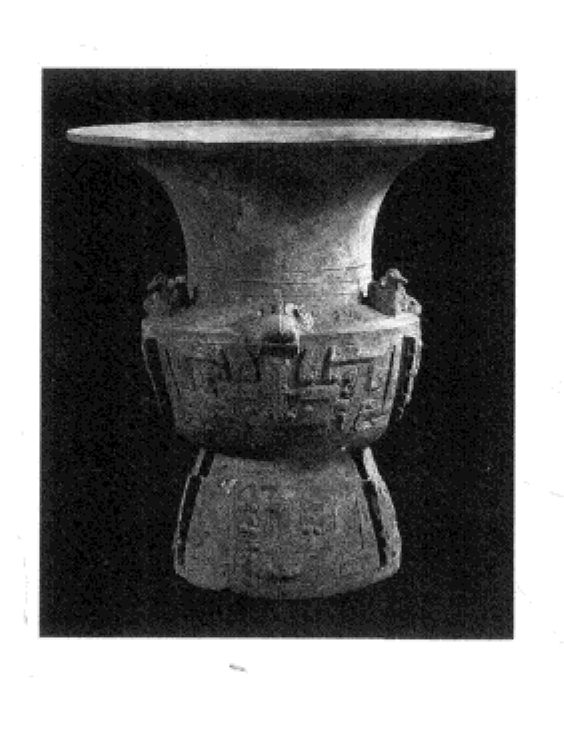
高三二、口徑二六．三厘米

一九九二年四川茂縣牟托村出土

四川省茂縣羌族博物館藏

敞口，翻沿，束頸廣肩。肩飾對稱牛頭雙耳、四組夔龍紋和一周長方形規矩紋。腹部一周飾八個夔龍紋。圈足外撇，飾一圈水波紋。

（蔡　清）　攝影　孫之常



八三、八四　四環鈕渦紋罍

戰國
高四九、口徑二〇厘米
一九七二年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四環鈕蓋，蓋沿上有三個凸起的獸形小鋪首。直唇，鼓腹，斜肩，圈足。腹部亦有四環形耳，周飾四個以虎紋組成的渦泡。通體飾雲紋、勾連雷紋。

八五　獸面紋罍

戰國
高四三、腹徑三七厘米
一九九二年四川茂縣牟托村出土
四川省茂縣羌族博物館藏

方唇，平沿，鼓腹，圈足外撇。肩有對稱牛頭雙耳，飾六個圓渦紋。腹飾六組獸面紋。

（蔡　清）　攝影　孫之常

八六　三羊三鳥尊

商代晚期
口徑四〇、通高四二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方唇，平沿，喇叭口外翻，束頸，斜肩，深腹，高圈足。頸部有三周凸弦紋，肩部飾三鳥相間而立，其間飾三羊頭。羊頭與鳥之間填以雙勾雲雷紋。腹部有三扉棱，將花紋隔成三組，每組爲象鼻龍紋和獸面紋，地紋爲雙勾雲雷紋。圈足上爲獸面紋，兩側填以象鼻龍紋。圈足上有兩周凸弦紋和三個方形鏤孔。





八七、八八　龍虎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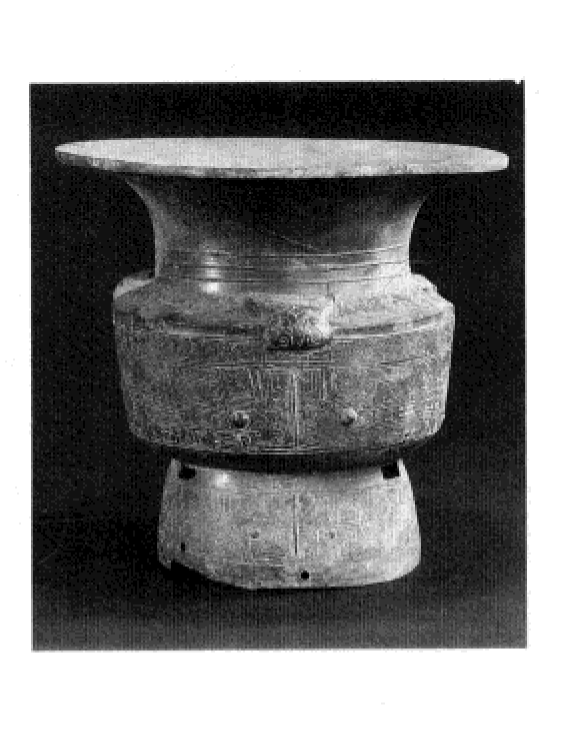
商代中期

肩徑三二、足徑二二、殘高四四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喇叭形口外侈，束頸，寬平肩，深垂腹，喇叭形圈足。頸上有三周凸弦紋，肩上鑄有高浮雕的三龍，呈游弋狀。龍爲圓眼，柱狀角，尾上卷，身飾菱形重環紋。龍身兩側以目雲紋爲地紋。腹部鑄有垂尖狀扉棱，將腹部紋飾隔成三組。每組爲身體嚮兩側展開的虎。虎巨頭，肥耳，尾下垂，尾尖上翹。虎頸下鑄一人形，呈曲臂齊肩、兩腿分開下蹲姿式。虎上方地紋爲羽狀雲雷紋，下方人形兩側地紋爲卷龍紋及刀狀羽紋。圈足上端有三個『十』字形鏤孔和三周凸弦紋，下端有三組雙身獸面紋，每組獸面紋之間有一短扉將紋飾隔開。



八九　三牛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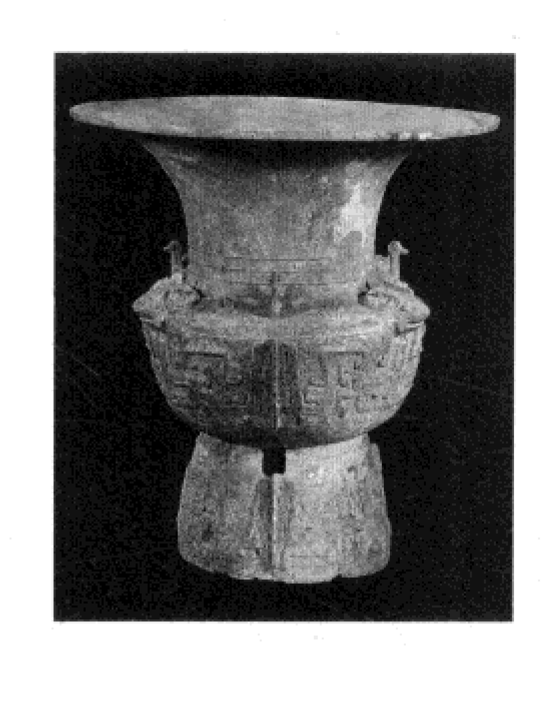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口徑三四、高三一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方唇，斜沿，喇叭口，束頸，頸較短，斜平肩，直腹，下腹成弧形內收，平底，高圈足。頸部有三周凸弦紋，肩部鑄三牛頭，牛頭間爲雲雷紋組成的夔龍紋。腹部紋飾爲上、下兩層。上層飾雲紋一周；下層爲雲雷紋組成的雙身獸面紋，空隙處填以刀羽狀雲雷紋。圈足上端有三個長方形鏤孔，中間爲雲雷紋組成的雙身獸面紋，下側近緣處有六個圓形鏤孔。出土時器表塗朱。



九〇　三牛三鳥尊

商代晚期
口徑四三·五、通高四五·五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方唇，寬平沿，喇叭口外侈，束頸，斜肩，腹斜直，下腹斜收至底，底平，高圈足外撇。頸部有三周凸弦紋，肩部鑄有三個角彎外卷的牛頭和三立鳥，牛頭與鳥之間飾象鼻龍紋。腹部和圈足上有三扉棱，將紋飾隔成三組。腹部爲獸面紋，兩側填以夔龍紋。圈足上端有三個鏤孔和一周凸弦紋；下端爲雙身虎紋組成的獸面紋，兩側填以夔龍紋。均以雙勾雲雷紋爲地紋。

九一　獸面紋尊

商代晚期
口徑二二·五、高三五·五厘米
一九八五年四川廣漢西門外出土
四川省廣漢市文物管理所藏

方唇直沿，喇叭口外侈，腹微鼓，飾粗獷的獸面紋。底部爲高圈足，外侈。圈足內側鑄有『[illegible]』字銘文，有學者認爲應是『晉』字。《華陽國誌》載，古蜀地有『江晉綿洛』四水，江，即岷江，綿即從德陽流經廣漢的綿遠河，洛，即石亭江（古稱洛水），晉，應是從三星堆遺址流經廣漢的馬牧河。（敖天照）



九二　獸面紋尊

西周
高二七、口徑二〇、底徑一四厘米
一九五九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敞口若喇叭，筒身，中腹略鼓。腹上飾對稱饕餮紋，兩側飾夔紋，空白處填以雷紋，上下有弦紋二周。







九三　矮足鼎

戰國

高二五・八、口徑二五・五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成都無線電機械學校出土

四川省成都市博物館藏



蓋略凸，圓形捉手。直口，方形附耳，圓腹，圜底，三蹄形矮足。腹部有一周凸棱，飾蟠螭紋。

（翁善良）

九四　矮足鼎

戰國

高一九・七、口徑二二厘米

一九九二年四川茂縣牟托村出土

四川省茂縣羌族博物館藏

蓋頂有五柱環形捉手，下有四個環鈕，蓋沿有三銜扣。器身斂口方唇，束頸，鼓腹。腹上有對稱二環鈕和二對乳釘。三足極小作獸蹄形。環形捉手上飾雲雷紋，蓋和器腹的環鈕上飾幾何紋。

（蔡　清）　攝影　孫之常

九五　雷紋鼎

戰國

高二一、口徑二一・五厘米

一九六五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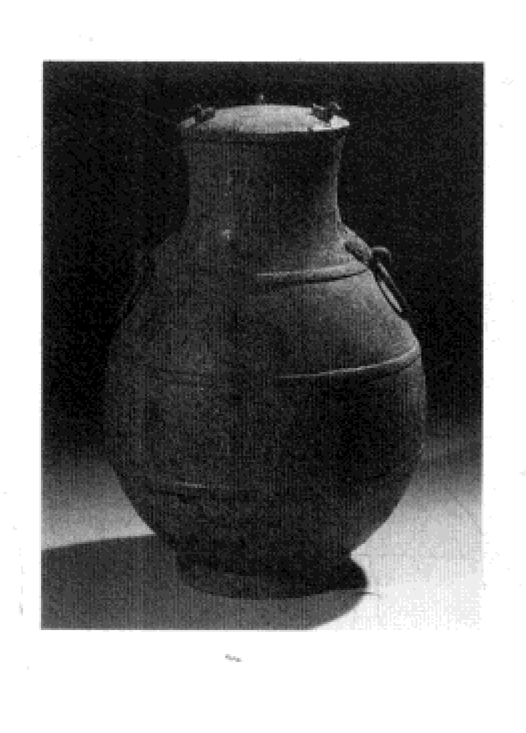
四川省博物館藏

附耳，獸蹄形足。腹略鼓，中有弦紋一道。弦紋上部飾雷紋兩周，下部飾雷紋一周。









九六　邵之飤鼎

戰國
高二六、口徑二二、腹徑二五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該器爲同時出土五鼎中最小、最精的一件。附雙耳，耳上飾三角雷紋。蓋頂略凸，中爲一龍形鈕，套環。環的一面爲斜線紋，另一面爲三角雷紋。蓋上有二圈三角雷紋，將鼎蓋紋飾分爲內、中、外三層。外層鼎立三牛形鈕；中層以圓點爲底，飾以鳳紋；內層飾三角雷紋、索紋和以圓點爲底的弧線連鈎紋。蓋內銘『邵之飤鼎』四字。『邵』之字體風格和安徽壽縣蔡侯墓以及湖北一些楚墓銅器上的銘文十分相似。楚之重器『鄂君啟節』中的『邵』字和此鼎蓋內銘文亦合。鼎耳下飾一圈弦紋，腹飾二圈鳳紋，三象鼻形足。

九七　仿邵之飤鼎

戰國
高二八·五、口徑二九、腹徑三二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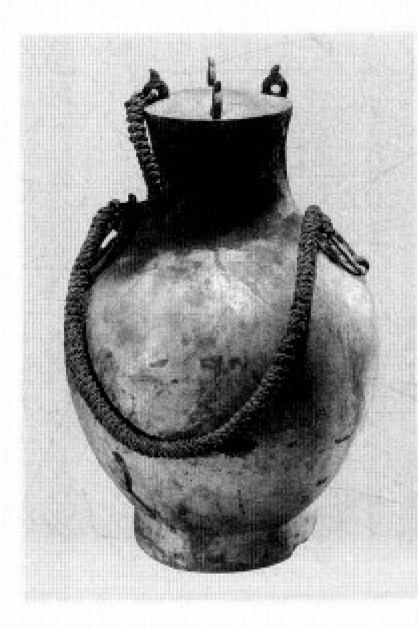
形制模仿邵之飤鼎。蓋面紋飾爲四層，內層飾二周辮索紋，一周雲雷紋。餘三層均飾鳳紋。蓋頂一套環鈕，邊沿有三牛形鈕鼎立。附耳，子母口。中腹飾弦紋，其上下各飾一周蟠螭紋。象鼻形足。鑄造工藝較邵之飤鼎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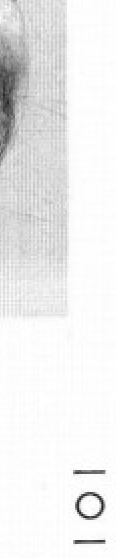
九八—一〇〇　嵌錯宴樂採桑攻戰紋壺

戰國
高四〇、口徑一三·四厘米
一九六五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小口，長頸溜肩，深腹，平底圈足。蓋飾卷雲紋、圓圈紋及獸紋，三鴨形鈕鼎立。壺身以三條帶紋分爲四層畫面。第一層可分爲左右二組圖飾：左圖爲習射、厨

房操作，右圖爲採桑、歌舞。第二層場面宏大，亦可分左右二組，左飾宴飲、舞蹈圖案，右飾射雁、習射場面。第三層飾攻城、陸戰的戰爭場面，有人頭被砍落，敲擊鉦、鼓以令軍隊進退，以及水中駕舟厮殺等圖案。畫面以寫實的手法，表現水陸配合的攻戰場面，生動地再現了戰國時期『殺人盈野』的戰爭情景。第四層飾獵人持矛追殺禽獸的圖案，其下是以雙獸組成的十個桃形紋飾。圈足飾菱紋和四瓣紋。該器通體遍布圖飾，內容豐富多彩，生動地反映了戰國時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同時也顯示了巴蜀地區獨特、精湛的嵌錯工藝。爲研究當時的社會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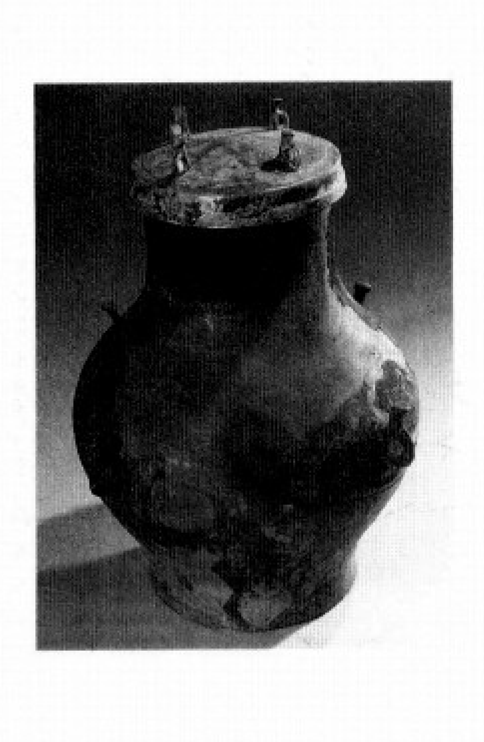




一〇一 棕提梁壺

戰國
高三五、腹徑二四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直口，頸稍斂，溜肩鼓腹，圈足。蓋微凸，有四鈕。肩上飾對稱獸頭鋪首銜環雙耳，以棕繩爲提梁，一短繩連于蓋鈕與環之間。通體素面。以棕繩作提梁的銅壺在四川爲首次發現，出土時以五件爲一組。



一〇二 四耳壺

戰國
高三〇、口徑一四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平口有沿，長頸斜肩，鼓腹，下腹斂收成圈足。蓋有四獸形鈕，中腹有四獸形小耳，遙相對應。素面無紋飾。出土時一組五件。

一〇三—一〇五　嵌錯雲紋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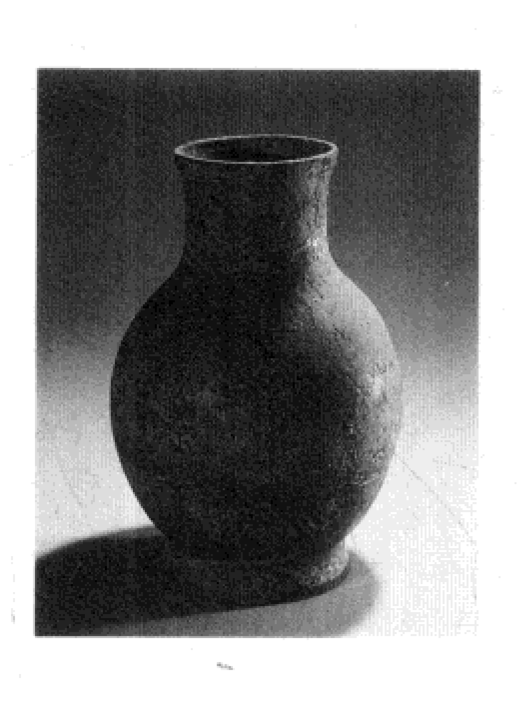
戰國
高五〇·六、口徑一五厘米
一九七二年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蓋面微拱，上飾三鳥形鈕及卷雲紋、弦紋與雲水紋。頸稍斂，溜肩，鼓腹。肩飾獸面銜環雙耳，壺身錯銀，成大小不同連續對稱的雲水紋。腹下素地帶內飾雲紋組成的十二個心形圖案。圈足爲嵌銀的水波紋。此壺錯銀技藝精湛，可見戰國時期巴人的手工、冶煉技術已發展到相當水平。

一〇六　提梁壺

戰國
高三七、口徑一一·五厘米
一九七六年四川綿竹清道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斗笠形蓋，以不同的細密花紋組成四圈環帶紋飾，間以綯紋和弦紋。壺身直口方唇，長頸稍斂，附一對環耳，各繫五節銅鏈，中間以雙頭龍提梁相連。壺溜肩，腹呈球形，矮圈足。頸腹部各有三周蟠虺紋帶，一周竊曲紋組成的三角形垂葉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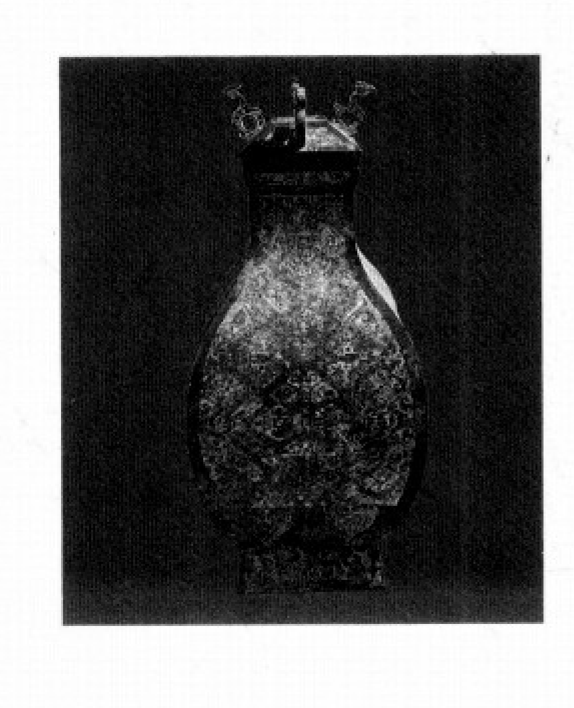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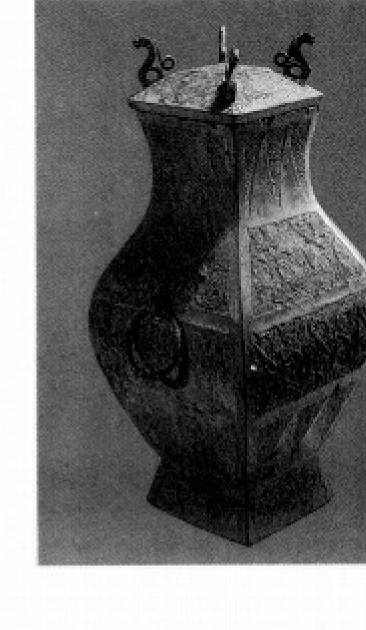
一〇七　嵌錯雲紋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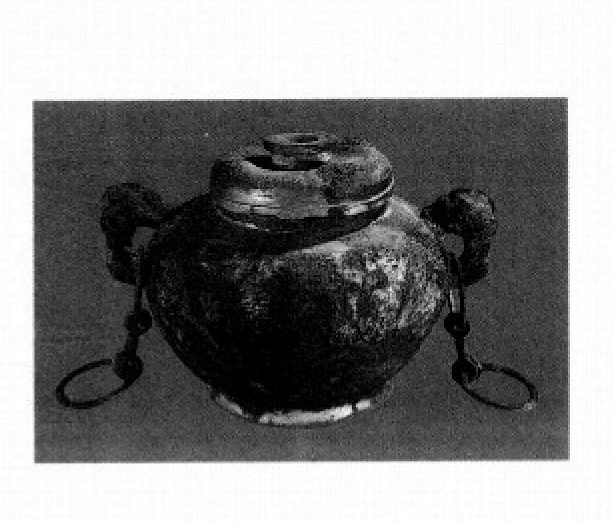
戰國
高三七·六、口徑一四厘米
一九七九年四川巴縣廣陽壩出土
四川省重慶市博物館藏

直口短頸，鼓腹，圈足，腹部嵌錯卷雲紋。

（曾凡模）







一〇八　嵌錯雲紋方壺

戰國

高五四·五、口徑一一·八厘米

一九五〇年四川新津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方口，蓋如梯臺，飾四鳥形鈕及雲紋。直頸，斜肩，鼓腹，圈足。器身飾寬邊斜方格，內填以雲紋。圈足內有陰刻巴蜀符號。

一〇九、一一〇　鳳鳥紋方壺

戰國

高三七·二、口徑一〇厘米

一九五二年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四方體，每面紋飾相同。蓋飾四蛇身鳥頭形鈕，張口銜珠。器身飾對稱鳳鳥紋，長長的尾羽與展開的雙翼相交，構圖十分美麗。腹部飾一對獸形銜環耳。

一一一　蟠螭紋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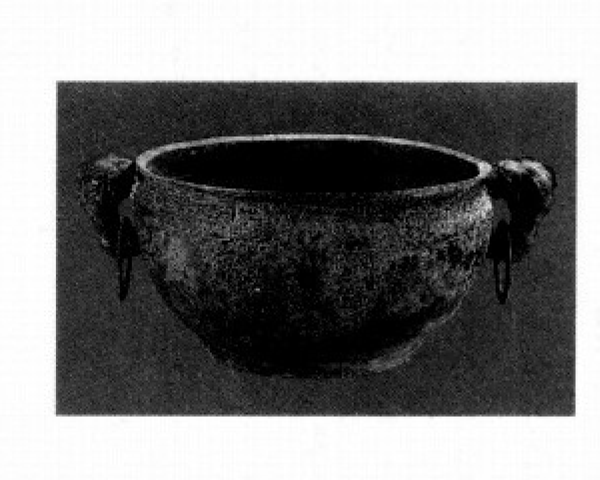
戰國

高二八·三、口徑二〇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覆豆形蓋，飾四個凸起的圓圈紋。直口，寬肩，鼓腹，下腹內收爲矮圈足。肩腹間飾對稱象鼻形雙耳，耳繫一鏈雙環。肩上刻有巴蜀符號，蓋及腹部均飾變體蟠螭紋。



一一二　蟠螭紋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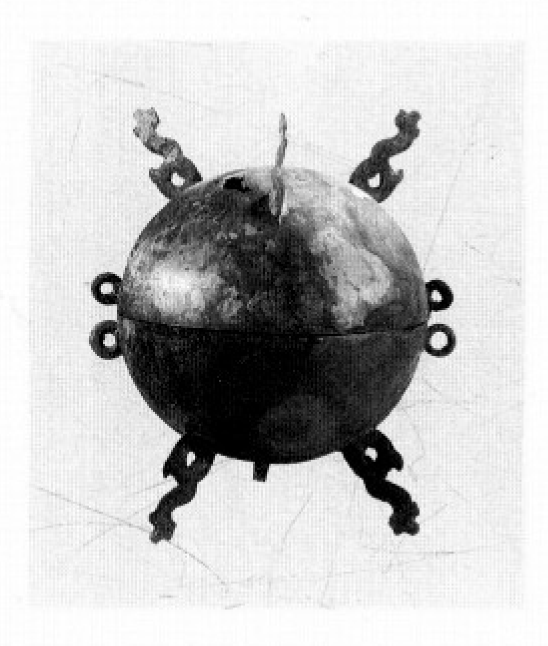
戰國

高二〇·三、口徑三八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直口，寬肩，腹略鼓，淺圈足。肩腹間飾對稱象鼻形銜環雙耳，頸及腹部飾變體蟠螭紋。



一一三　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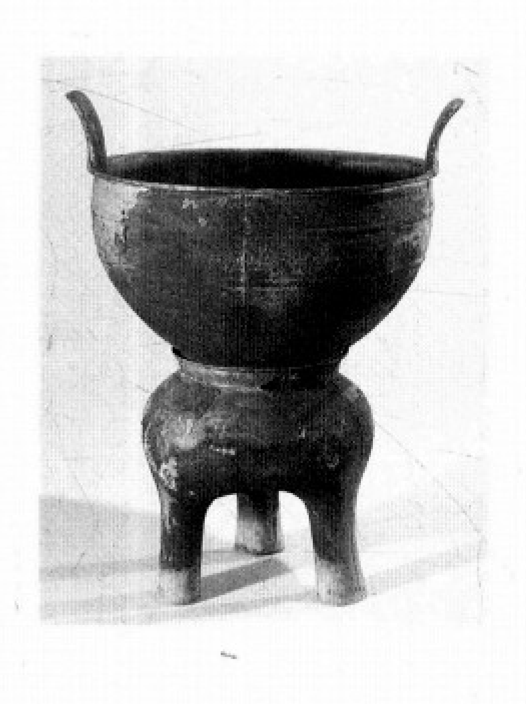
戰國

高二四、腹深九、口徑一九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蓋與身大小形狀相同，各有三個扁體虎形飾。此種形狀的敦普遍流行于戰國時期的楚地。



一一四　雲雷紋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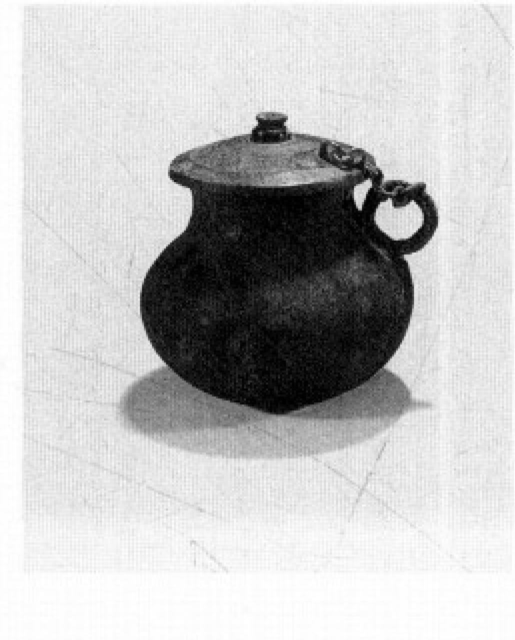
戰國

高四三·九、口徑三三·二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甑與鬲分體，甑口沿上有二方形豎耳，底爲條孔圓箅。耳內側飾雷紋，身飾辮索紋與雲雷紋。鬲爲三獸足，素面。





一一五　帶蓋單耳鍪

戰國

高一三·四、口徑八·九厘米

一九六五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侈口，束頸，鼓腹，圜底。通體素面，肩上有辮索紋環形單耳，一環形鏈與蓋相連。蓋若覆盤，中間稍凸，扣形圓鈕。鈕旁陰刻一蜘蛛狀紋，近蓋邊處飾一周回紋與聯珠紋組成的圖案，并間刻一組巴蜀符號。這種銅鍪，極具巴蜀文化特徵，是巴蜀的典型器類之一。

一一六　雙耳鍪

戰國

高一九·五、口徑一五·五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敞口、束頸、削肩、鼓腹、圜底。通體無紋飾，肩頸間飾辮索紋環形雙耳



一一七　雙耳釜

戰國

高一二·八、口徑一九·三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侈口、束頸、鼓腹、圜底。通體無紋飾，肩上有辮索紋雙耳。



一一八　連體甑

戰國

高二八、口徑二〇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甑釜連鑄。侈口、鼓腹，辮索紋雙耳，通體素面。甑內有一條孔圓箅，以環紐連于甑壁底側。

一一九　分體甑

戰國

通高三六．八厘米

一九七二年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釜甑分鑄。釜爲小口、短頸、鼓腹、圜底，有四枚小釘足，肩有對稱辮索紋雙耳。甑爲侈口，平唇外折，鼓腹，底似圈足，上大下小，恰與釜頸內壁相合。肩上亦有辮索紋雙耳，肩腹間飾弦紋一道，甑底爲呈放射狀的長方條形箅孔。



一二〇　尖底盒

戰國

高九．五、口徑一五．六厘米

一九九三年四川彭縣致和鄉出土

四川省彭縣博物館藏

斗笠形蓋，中飾弦紋。器口微侈，直腹尖底，中腹淺雕鳥紋，下飾一周帶狀卷雲紋。

（丁武明）









一二一　獸紋尖底盒

戰國
高九、腹徑一一・四厘米
一九七三年四川成都青羊宮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傘形蓋，直沿，盒折腹、尖底。蓋及腹部各飾以變形獸紋兩周，間以凸弦紋，以點紋爲地。

一二二　折腹盤

戰國
高一一、口徑三七、底徑五・五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侈口、折腹、平底。口沿下有帶環雙耳，器爲素面。

一二三　豆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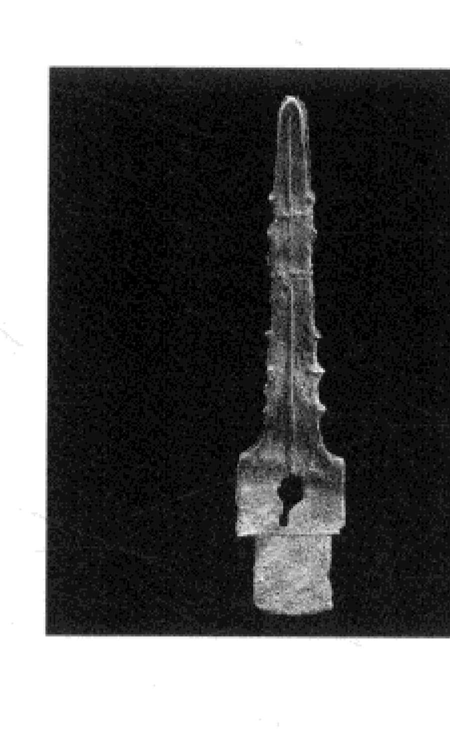
戰國
口徑一七・五、高三・四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大敞口，坦腹，圈足，通體無紋飾。出土時反扣在三足盤形器底。有人認爲是其器蓋。

一二四　三足盤形器

戰國
口徑一六・四、高六・二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大敞口，坦腹如盤，平底，三矮足，中腹有對稱雙耳，無紋飾。



一二五　**燈臺**

戰國

高四三、臺徑三三・七厘米

一九七二年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平臺有沿，圓形座，十二棱形柱，中空。惟平臺周飾弦紋，餘素面。

一二六　**齒刃長援戈**

商代中期

通長一九・七、寬四・七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細長等腰三角形援，援兩邊各有七個齒尖。援兩面正中有一凸弦狀脊線。長方形內，闌上一小圓穿。

一二七　**齒刃長援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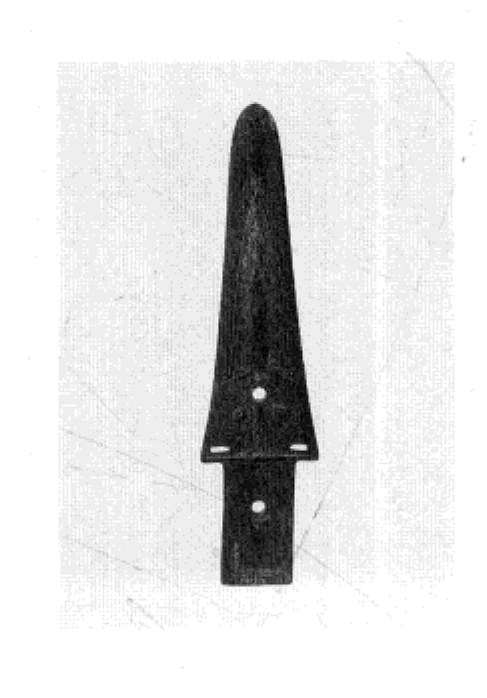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通長二一厘米

一九八六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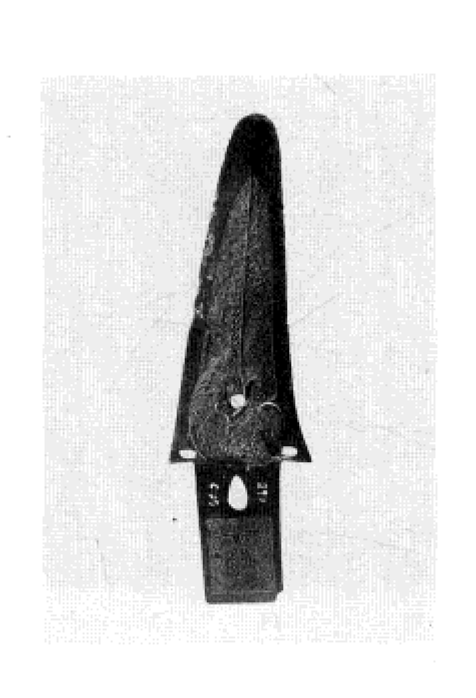
體扁平，援成等腰三角形，正中有一淺脊，兩側刃口呈鋸齒狀。闌較寬，正中有一圓穿。長方形內。



一二八　獸面紋長援戈

西周
長二六、闌寬六·六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長援略弧，近闌處飾變形獸紋，并有兩個條形穿和一個圓穿。長方形內，中部一圓穿。



一二九　蠶紋長援戈

西周
長二六·三厘米
一九七六年四川成都交通巷出土
四川省成都市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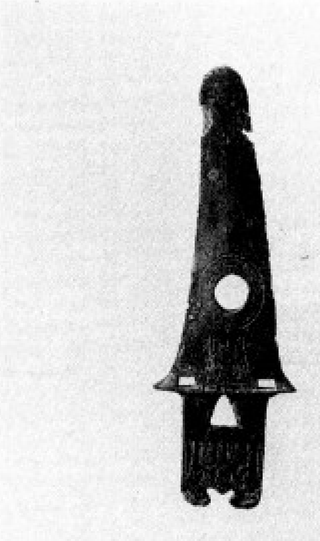
三角形，無胡，中部起脊，近闌處有二穿，本部一圓穿，飾卷身夔龍紋。長方形內，近闌處一桃形穿，飾蠶紋與雲雷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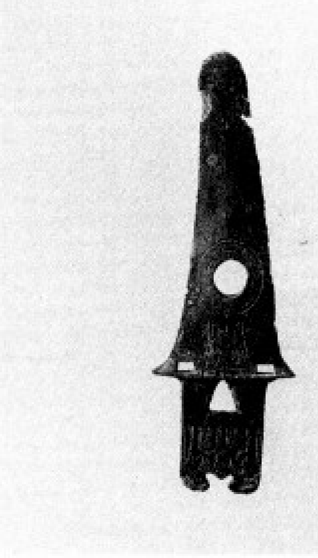
（翁善良）

一三〇、一三一　獸面紋長援戈

戰國
長二三·一、闌寬六·六厘米
一九六五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長援無胡，兩面有脊，近闌處飾獸面紋，有二條形穿及一小圓孔。長方形內，端似山形，內中間一桃形穿。該器型式在四川戰國墓中不多見，與彭縣竹瓦街出土的西周銅戈頗多相似之處。





一三二　人形紋長援戈

戰國

長二四·三、闌寬八厘米

一九八七年四川成都撫琴小區出土

四川省成都市博物館藏

三角形援，無胡，中起脊，本部一大圓穿，近闌處二條形穿，飾人形紋與圓圈紋。長方形內，端若鴟吻，近闌處有三角形穿，飾房屋人物圖案。（翁善良）

一三三　獸面紋長援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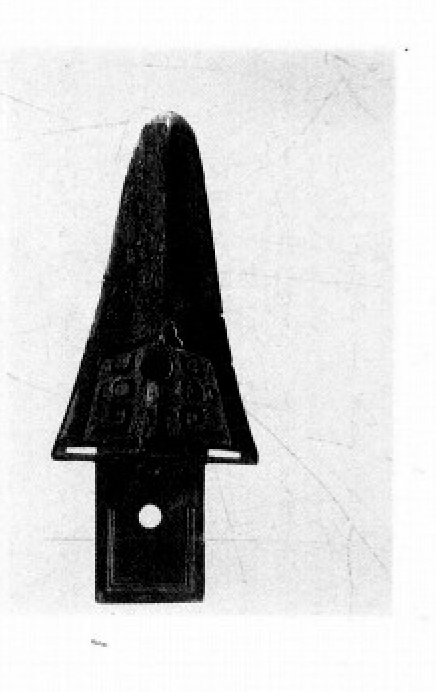
戰國

長三一·五、闌寬九·五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長援有脊，近闌處飾獸面紋，二條形穿。近刃處陰刻該墓出土銅器特有的巴蜀符號。長方形內，中一桃形穿，端呈山形。



一三四　獸面紋三角形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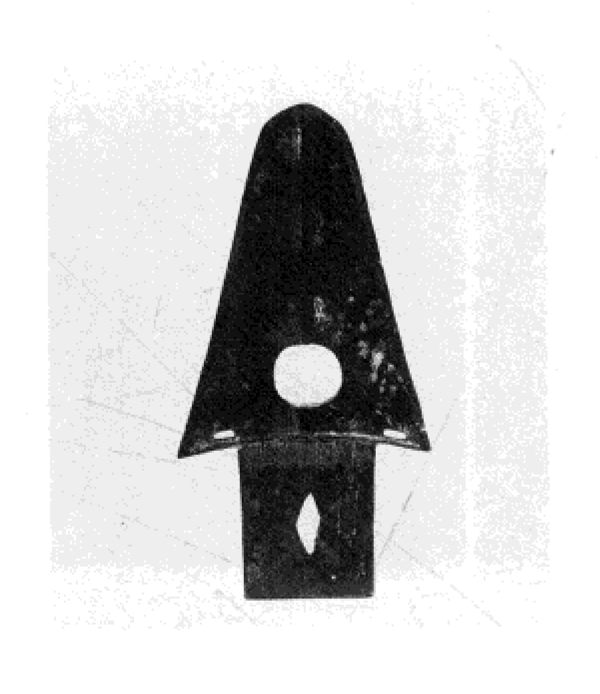
西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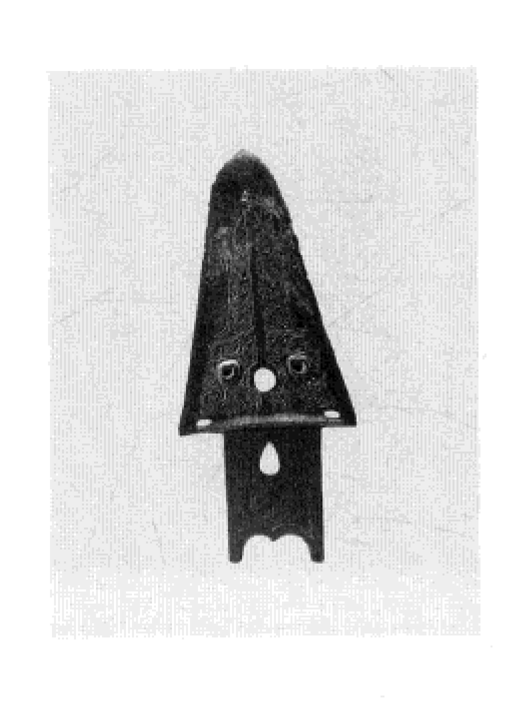
長二七·三、闌寬九·六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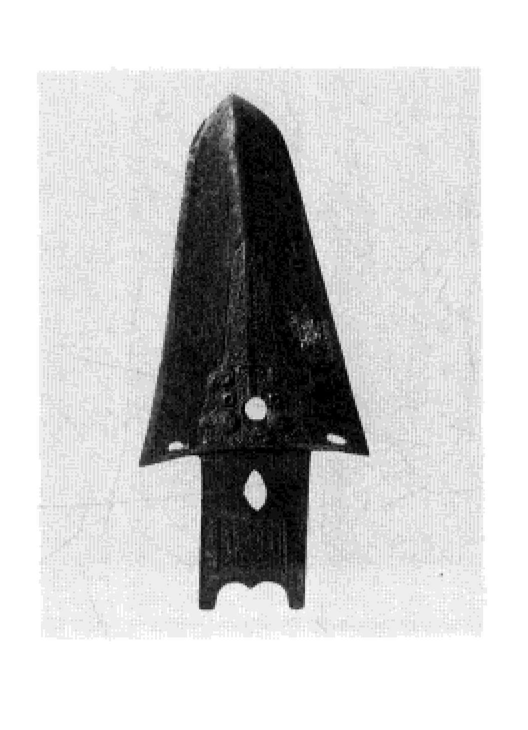
一九五九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三角形援，略內弧，無胡，中脊邊刃明顯。近闌處兩條形穿。援後部飾獸面紋，獸面中一大圓穿。長方形內，中一圓穿。







一三五　**圓斑紋三角形戈**

戰國

長二七厘米

一九九三年四川彭縣致和鄉出土

四川省彭縣博物館藏

三角形援，直內，無胡。近闌處二穿，本部一圓穿。飾銀白色錯格圓斑紋。

（丁武明）

一三六　**獸面紋三角形戈**

戰國

長二一・二、闌寬五・二厘米

一九八九年四川成都青羊區出土

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藏

三角形援，無胡，中部起脊爲弧形。近闌處有二條形穿，本部一圓穿。兩面均飾變形獸面紋，另一面下方陰刻巴蜀符號。

（翁善良）

一三七　**獸面紋三角形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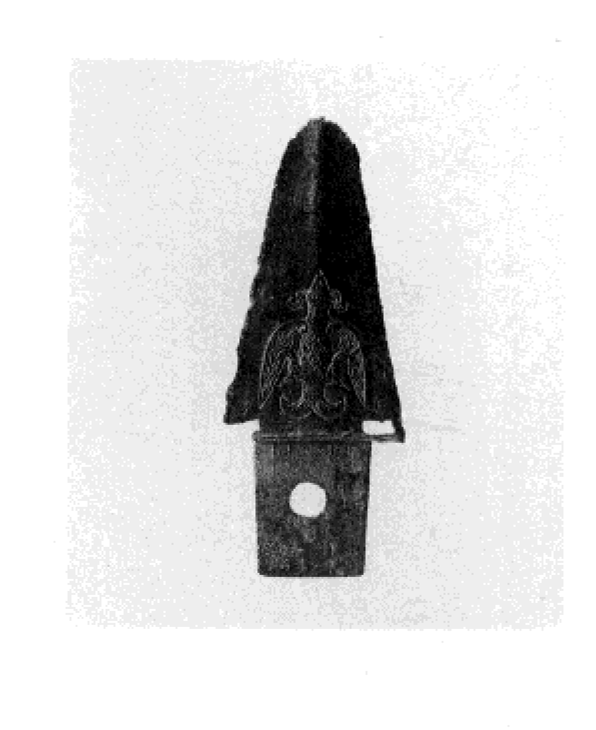
戰國

長二九・二、闌寬一三・一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無胡，援有脊，兩面飾獸面紋。本部一大圓穿，近闌處二小穿。近刃處陰刻該墓出土銅器的特殊符號。方內，中有一心形穿，近闌處有平行線四條。內端呈山形，與穿之間飾一組方形紋。



一三八　鳥紋三角形戈

戰國
長一九・六、寬七・六厘米
徵集
四川省重慶市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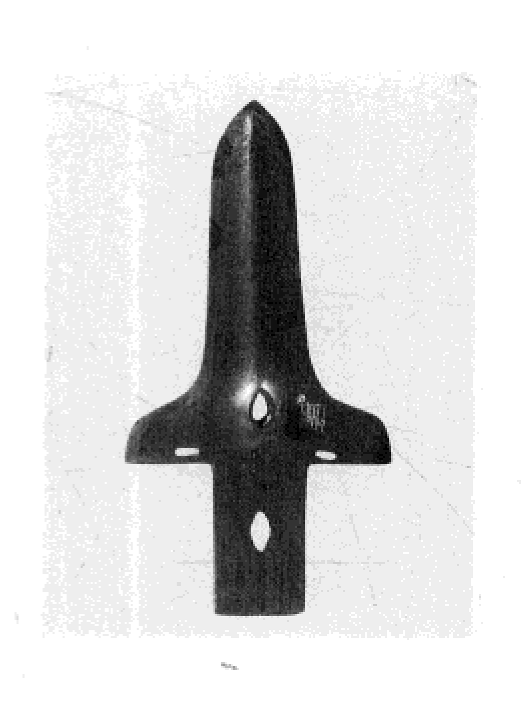
三角形，無胡，援有脊，兩面鑄相同淺浮雕鳥紋。近闌處兩條形穿。長方形內，中有一穿。

（曾凡模）

一三九　龍紋十字戈

戰國
援長二一、胡長八・五、內長六・九厘米
一九七五年四川簡陽糖廠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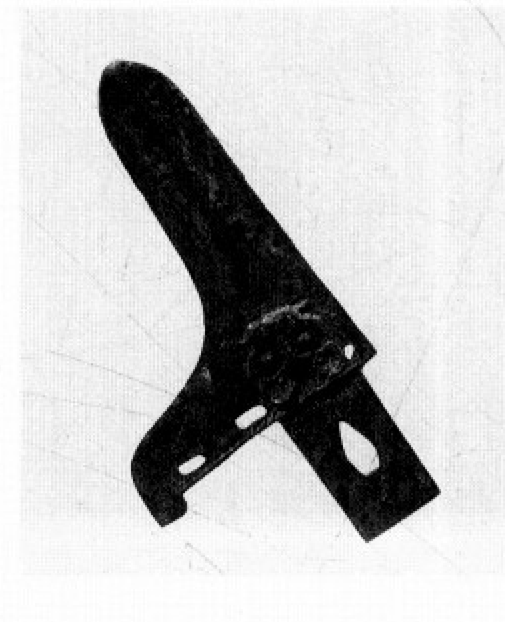
直援有胡，中脊邊刃明顯，近闌處三條形穿，一端有牙。本部兩面對稱翹起一條鼻，直達內部。援中部紋飾略呈三角形，兩面均斜雕人字形回紋，回紋下浮雕雙雙盤纏的蛟龍，條鼻上各飾蟠龍。長方形內，末端內弧成山形，中一圓穿。整體紋飾十分精美生動，形制獨特，在四川出土的銅戈中尚屬首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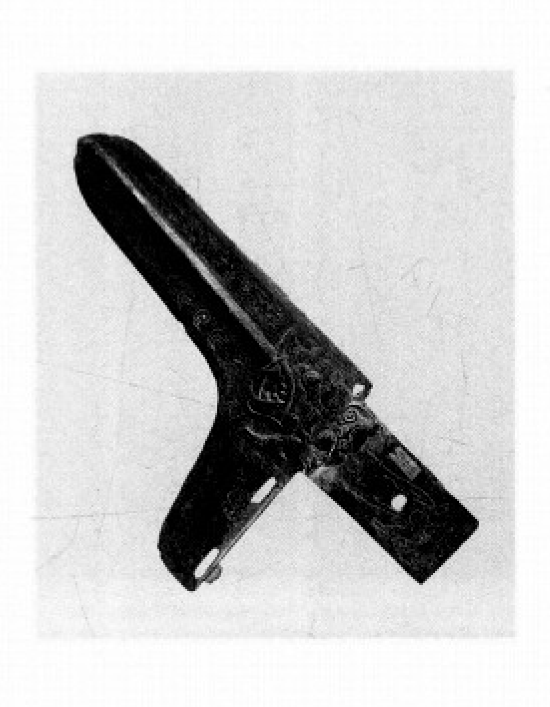


一四〇　虎斑紋十字戈

戰國
長二六・六、闌寬一三・七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長援有脊，短胡，與內呈十字形。近闌處一心形大穿，二條形穿。戈飾虎斑紋，胡援間陰刻該墓出土銅器的特殊符號。長方形內，內中一橄欖形大穿，近闌處有四條平行線





一四一　虎紋中胡戈

戰國
長一七．五、闌寬九厘米
一九五七年四川成都南郊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中胡，胡末端嚮後彎折成一牙。援短而直，中脊明顯。本部凸鑄一虎頭紋，近闌處有三穿。長方形內，中有一桃形大穿。

一四二、一四三　虎紋中胡戈

戰國
胡長八、闌寬一三．六、通長二五．三厘米
一九七二年四川郫縣獨柏樹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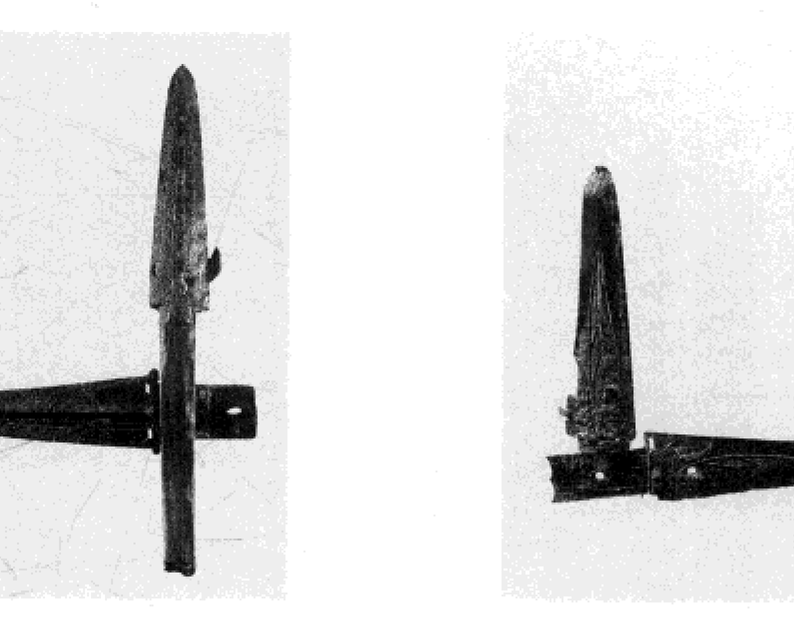
長援中胡，長方形內。近闌處有三穿。援後部至內兩面飾半圓雕虎頭，嚮鋒張口，長舌外吐，口中一穿。虎身陰刻，延于內上。戈的一面鑄椎髻、踞地、腰懸寶刀之人，另一面鑄巴蜀兵器上常見的紋飾。援脊下兩面均飾滴水紋，一面脊上方陰刻巴蜀符號。

一四四　虎紋中胡戈

戰國
長二六．六、闌寬一二．八厘米
一九七四年四川萬縣新田鄉出土
四川省重慶市博物館藏

寬援中胡，中脊明顯，胡末端彎折成牙，近闌處三穿。本部兩面飾虎頭，虎身陰刻，延于內上。援下部有三滴水紋，上半部陰刻一行巴蜀文字。其形制與郫縣出土的虎紋中胡戈完全相似，虎紋亦同。

（曾凡模）



一四五　鳥紋戟

西周
戈長二七・五、刺長二三・九厘米
一九五九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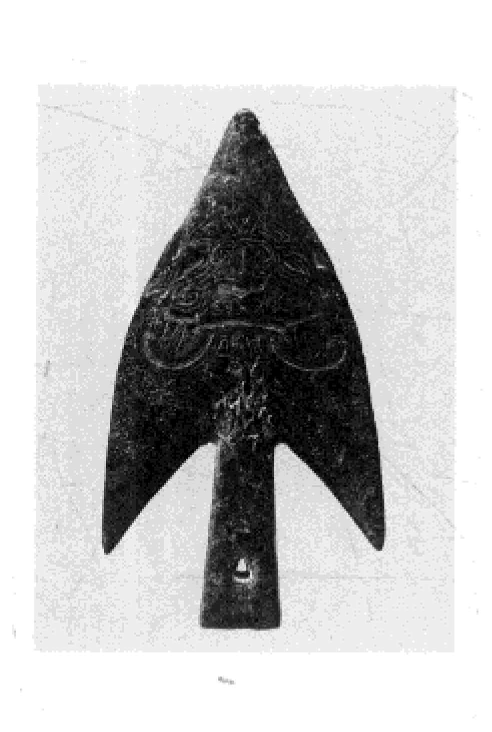
由戈與刺兩部分組成。戈爲長三角形，近闌處有一條形穿。援兩面均飾一鈎喙怪鳥，長翼覆蓋大半器身，下角處飾一展翅小鳥。長方形內，端部成山形，內上有一圓穿及四條横棱形成的竹節紋。刺呈長三角形，銎橢圓，骹後有一小牙。紋飾與戈同。戟集刺、戈之功能，是當時的先進兵器。

一四六　蛇紋戟

戰國
戈長二三・三、闌寬六・三、刺長二〇・二厘米
一九九二年四川茂縣牟托村出土
四川省茂縣羌族博物館藏

戈長援無胡，直內，近闌處有二穿，內後部一梭形小穿。戈身一面飾矩形小框紋，一面沿中脊飾一條張口嚮鋒的長蛇。刺若戈援，銎部有牙，飾太陽紋及回紋。

（蔡　清）　攝影　孫之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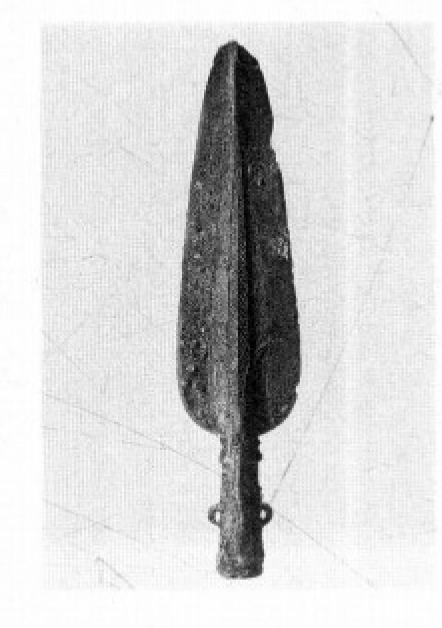


一四七　嵌錯獸面紋鏃

戰國
長一九・九、寬一〇・九厘米
徵集
四川省重慶市博物館藏

戈鋒尖鋭，兩翼後掠，狀若雙翼式箭鏃，兩面飾相同錯銀獸面紋，一面有陰刻巴蜀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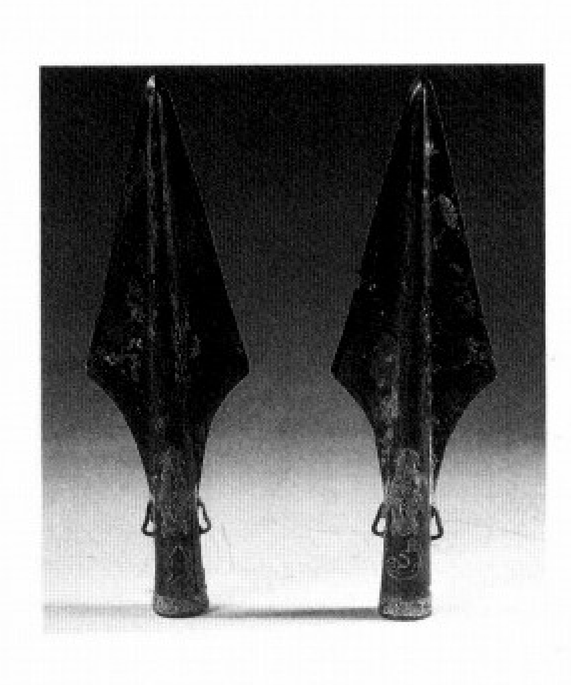
（曾凡模）



一四八　壁虎紋寬葉矛

西周
長三二、寬七·五厘米
一九五九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寬葉形，無鋒，圓銎直達矛端。凸脊兩側飾斜尖角的變體雷紋。銎中部有對稱兩小耳，兩面飾淺浮雕壁虎，極爲生動。



一四九　蟬紋菱形矛

戰國
長二八·三、寬八·六厘米
一九九三年四川彭縣致和鄉出土
四川省彭縣博物館藏

短骹寬葉形，弓形雙耳，骹飾淺浮雕手紋、變形蟬紋。銎處有回紋及弦紋二道。

（丁武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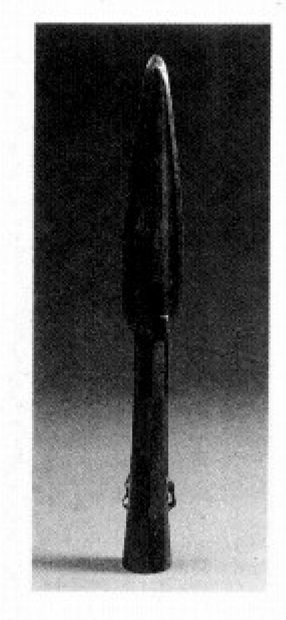


一五〇　蛇紋寬葉矛

戰國
長三三厘米
一九九三年四川彭縣致和鄉出土
四川省彭縣博物館藏

短骹寬葉形，弓形雙耳。骹兩面飾淺浮雕四脚蛇，蛇頭嚮矛鋒，似欲搏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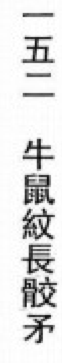
（丁武明）



一五一　長骹矛

戰國
長二五厘米
一九九三年四川彭縣致和鄉出土
四川省彭縣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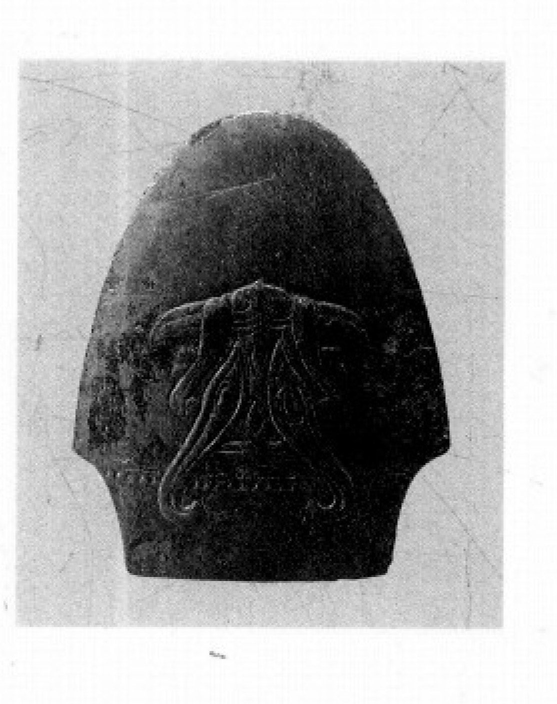
柳葉形，葉與骹長度略等。骹斷面呈八棱形，筒直達矛尖。骹下部有弓形雙耳，通體飾黑白相間的長方形格。（丁武明）



一五二　牛鼠紋長骹矛

戰國
長二一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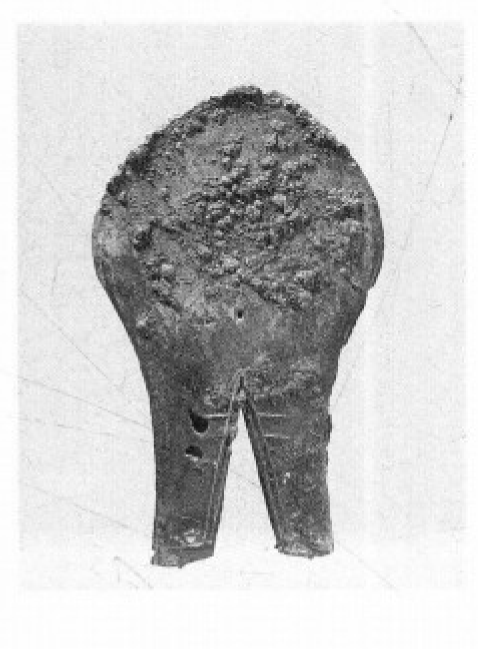
葉狹窄，前聚成鋒。圓銎直達矛尖，凸脊，長骹雙耳，耳間飾牛鼠紋，近銎處飾雷紋一周。矛五件一組，其中一件飾饕餮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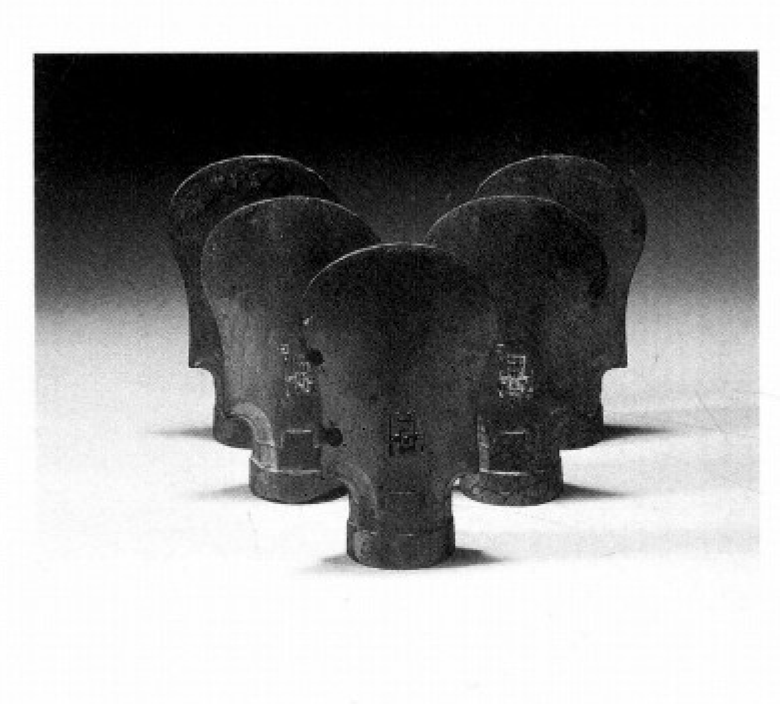


一五三、一五四　牛首紋鉞

西周
長一六·二、銎寬八·四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舌形刃，上部斜收爲肩，短銎，長方形。正面飾牛首紋，肩飾帶狀圓點紋。背面僅肩部有凸弦紋二道。這種形制的銅鉞，到春秋戰國時期發展成具濃郁巴蜀特色的『烟荷包式』鉞。





一五五　素面鉞

西周

長三四、刃寬一九·五、銎寬一三厘米

一九五九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尖圓刃，扁長銎，銎中部一大V形口，斷面成菱形。素面，壁極薄，可能非用于實戰。

一五六　平肩圓刃鉞

戰國

長一八·五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平肩，折腰，銎爲橢圓形。骹有十棱，腰上陰刻該墓銅器的特殊符號。出土時五件一組，形制完全相同。

一五七、一五八　獸面紋短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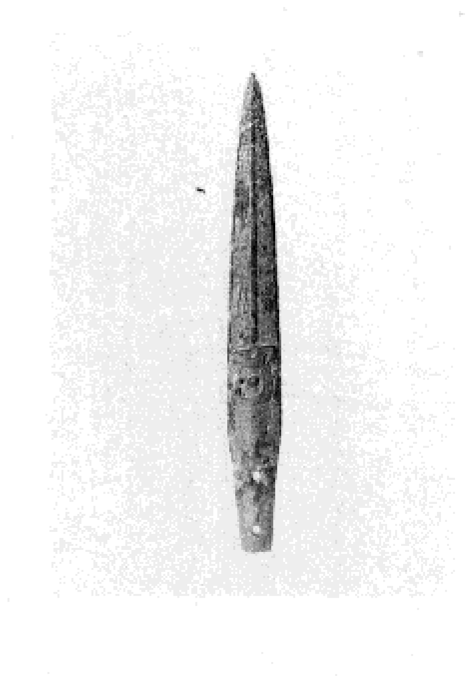
戰國

長二二·七、寬三·五厘米

一九五四年四川巴縣冬笋壩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扁莖無格，有二圓穿，脊若魚背，劍身基部兩面均飾獸面紋。



一五九 鳥紋劍

戰國

長五〇、寬四・七厘米

一九五四年四川巴縣冬笋壩出土

四川省重慶市博物館藏

扁莖無格，有二穿。劍身飾虎斑紋，基部一面飾虎紋與鳥紋，一面飾虎紋與水波紋。

（曾凡模）

一六〇 虎斑紋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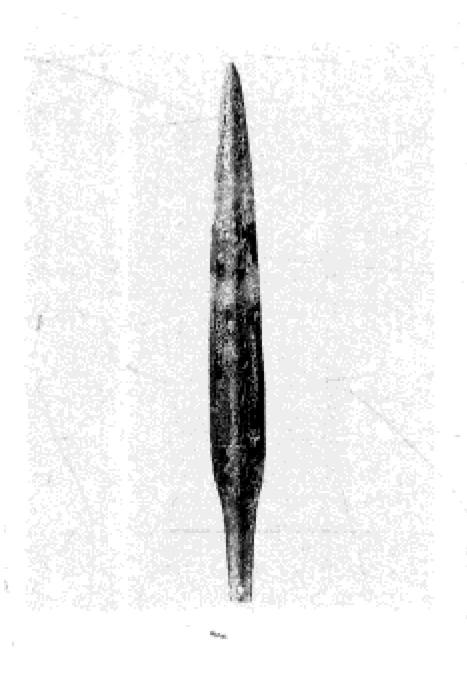
戰國

長三七・六、寬三・三厘米

徵集

四川省博物館藏

扁莖無格，一側二穿。劍身若柳葉，魚背脊，兩面均飾虎斑紋。劍身基部一面飾虎紋、心紋，一面飾手紋、心紋。



一六一 虎紋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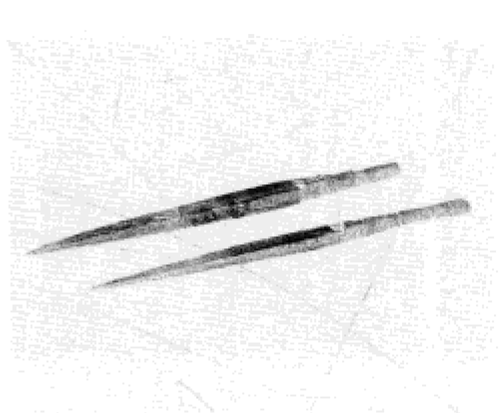
戰國

長四七・五、寬四・五厘米

一九七二年四川郫縣獨柏樹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扁莖無格，有二穿。劍身稍寬，柳葉狀，魚背脊，劍身基部兩面各飾一長身虎紋，口嚮鋒。虎尾卷處陰刻巴蜀符號。



一六二　虎斑紋木柄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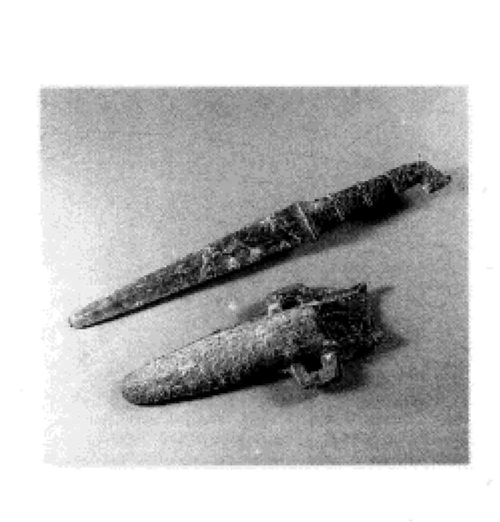
戰國

長四〇、寬四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出土時共五件，長短有序。扁莖無格，劍身鑄虎斑紋，劍柄以兩片木板夾緊，纏以棕絲，髹黑漆。出土時保存完好，體現了巴蜀式劍與中原式劍的不同特色。



一六三　單鞘劍

戰國

鞘長二〇、寬八．七厘米　劍長三一．六、寬四厘米

一九九二年四川茂縣牟托村出土

四川省茂縣羌族博物館藏

劍身窄長，中部起脊，竹節狀扁圓龍首柄，兩面均飾圓圈紋，節飾繩紋，柄中空。鞘爲平府弧面蓋，府、蓋合鑄，兩側有環形雙耳，素面。

（蔡　清）　攝影　孫之常

一六四　雙鞘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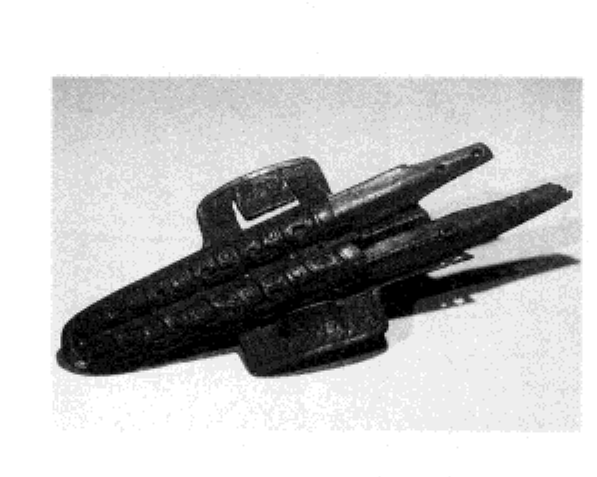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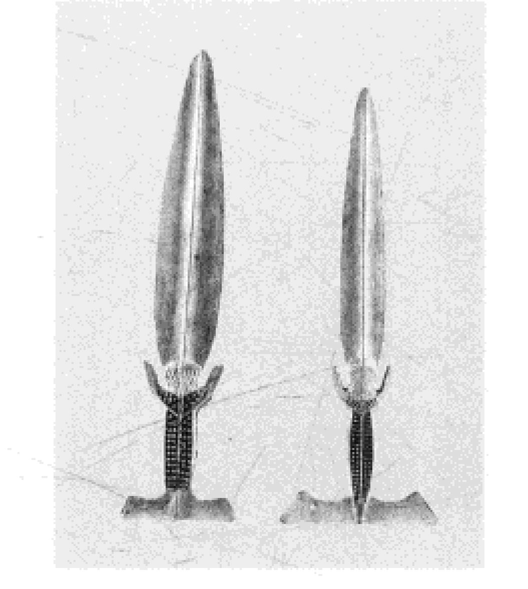
鞘長二八．五、寬一三．七厘米　劍長一九．八厘米

一九七三年四川成都中醫學院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柳葉形劍，扁莖無格，基部二圓穿，劍身凸鑄一圓圈，上下有雙翼。鞘爲袋形，側附雙耳，中以凹槽分爲左右劍室，蓋、府均飾卷雲紋。此種劍在四川多有發現，說明此類既可遠擲、又可近搏的短劍是當時巴蜀地區的重要兵器。





一六五　雙鞘劍

戰國

鞘長二三、寬一四．五厘米　劍長二六．五、寬三．一厘米

一九七五年四川成都金牛區白塔村出土

四川省成都市博物館藏

劍爲柳葉形，中部有脊，扁莖無格，基部有二穿。劍鞘并聯一體，府平蓋微凸，飾雲雷紋，兩側附耳。

（翁善良）

一六六　寬首劍

戰國

左劍長三八．六、葉寬五．五、首寬九．三厘米

右劍長三六、葉寬三．八、首寬一三厘米

一九九二年四川茂縣牟托村出土

四川省茂縣羌族博物館藏

出土時二劍顛倒重合放置。劍身呈柳葉形，中部起脊，基部飾斜線紋，兩側有對稱嚮上外撇的格，扁莖，山字形首，形制較爲獨特。

（蔡　清）　攝影　孫之常



一六七　環首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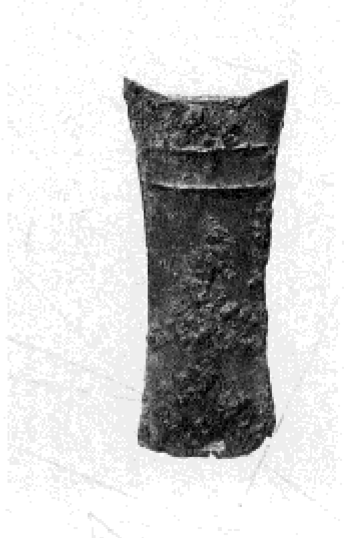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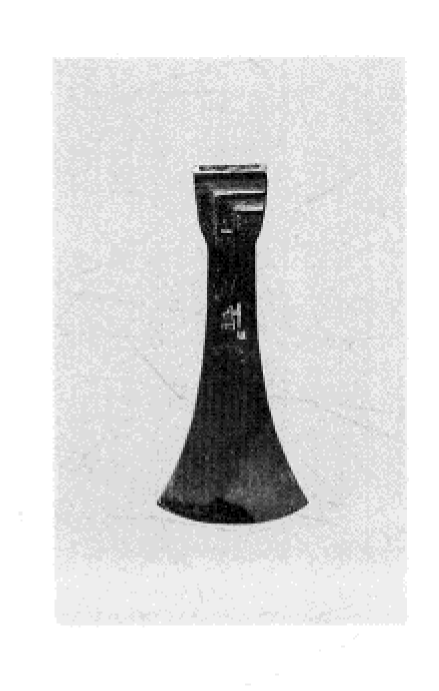
長五三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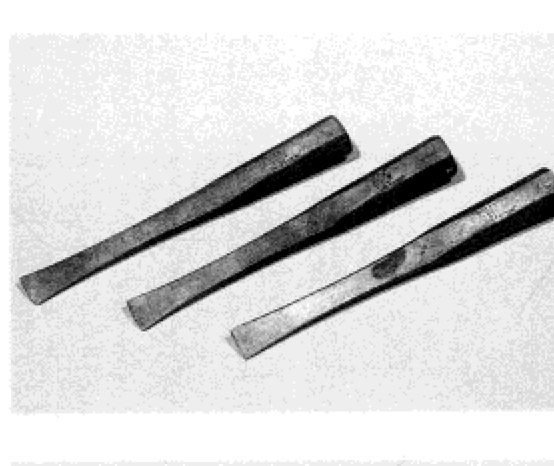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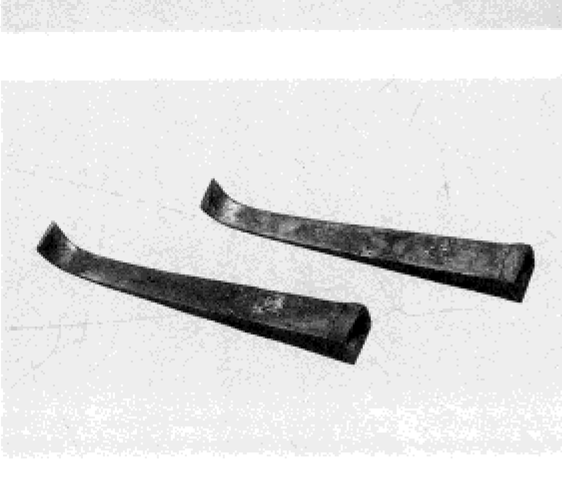
四川省博物館藏

厚背薄刃，環形柄首。柄上鑄該墓出土銅器的特殊符號，無紋飾。









一六八　鏟

西周
長一八·一、刃寬六·五厘米
一九五九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器略呈梯形，束腰。半月形銎，飾棱線二道，刃呈弧形。

一六九　斧

戰國
長一九、刃寬七·八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長方形銎，弧刃，素面，陰刻該墓出土銅器的特殊符號。

一七〇　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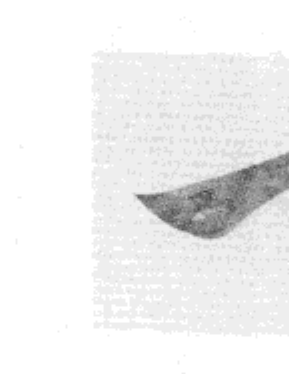
戰國
長二四、銎徑二·六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弧刃，長骹爲八棱形。骹上部陰刻該墓出土銅器的特殊符號。

一七一　曲頭斤

戰國
長二三、銎寬四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長方形銎，上陰刻該墓出土銅器的特殊符號。刃端彎曲。此種形制的銅斤在四川爲首次發現。



一七二　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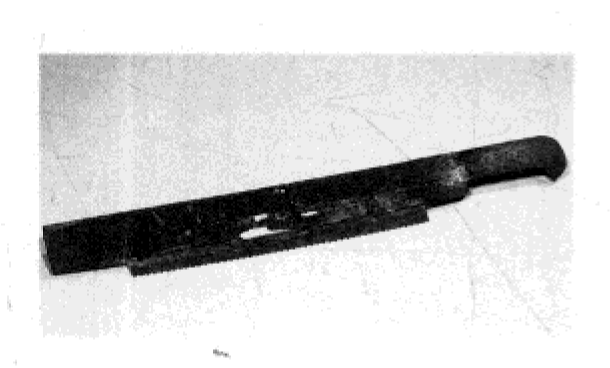
戰國
長二四、寬六．五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出土大、中、小三組，各五件，長度大體相等，刃的寬度各異。此爲最大的一件，弧刃較寬，陰刻有該墓出土銅器的特殊符號，通體無紋飾。

一七三　雕刀

戰國
刀長一八．五、寬二．四、通長二九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共出土五件，有的刀把已朽。刀身微拱，斷面成弧形，刀鋒尖銳，呈三角形。正面有一脊，邊折有棱。木柄，柄尾微嚮上翹。以棕絲纏繞四道，外髹生漆。這種裝置完整無損的雕刀在四川爲首次發現。



一七四　手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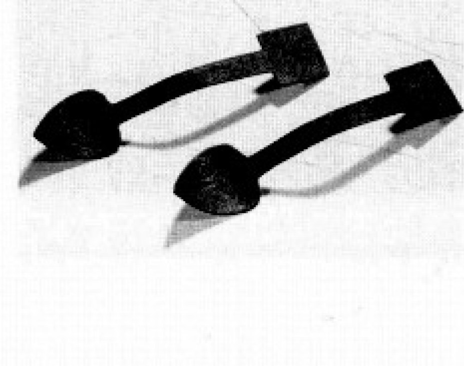
戰國
鋸片長二六、寬四厘米　柄長一四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鋸片較薄，齒較細。中部一側有等距的三個條形穿。鋸身以小楠木板製作，一端爲把手，中部鑿淺槽以嵌鋸片，再用一長寬與淺槽相等的木條掩壓，條與板亦鑿有與鋸片相對的三個條形穿，以細竹篾條穿孔綁固，再髹黑漆而成。

一七五　雙齒鋸

戰國
長三七．八、寬三．三厘米
一九六四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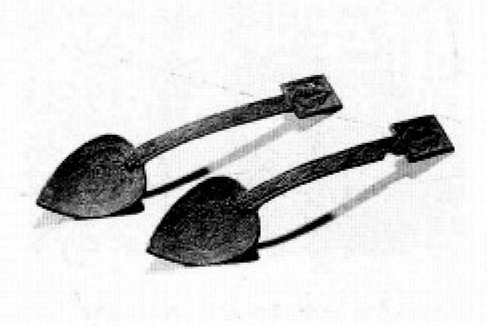
兩邊開齒，較細。中部及兩端各有一條形穿。此種形制的銅鋸在四川地區較爲罕見。



一七六　鳳紋匕

戰國
長二五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內底飾鳳紋，空處填以方格紋。柄扁平微曲，飾菱紋。末端方首，紋飾與內底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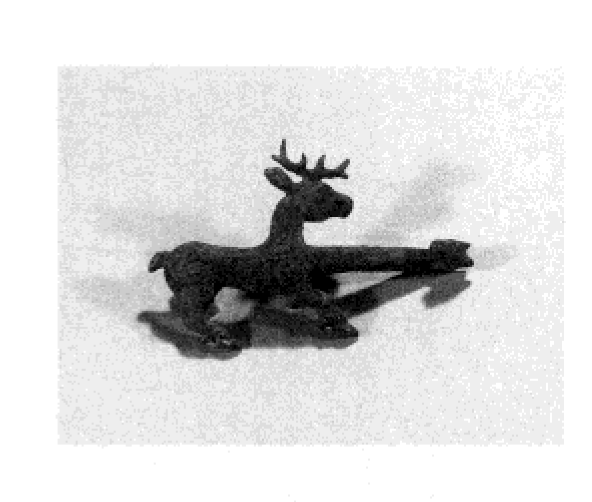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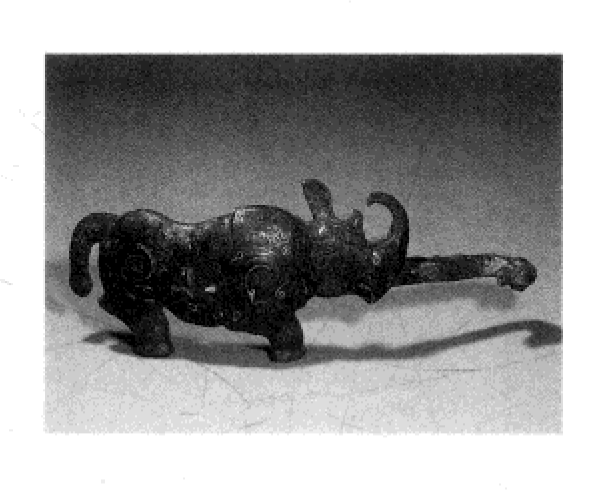
一七七　雲紋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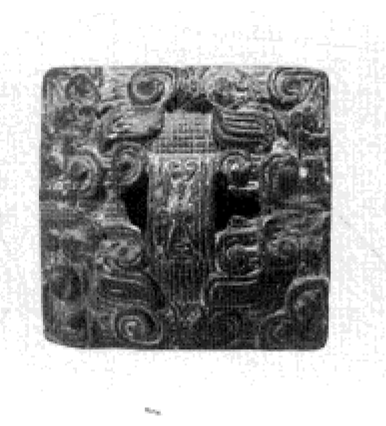
戰國
長二一厘米
一九八七年四川成都青羊小區出土
四川省成都市博物館藏

內似桃形，內凹，飾饕餮紋，周飾雲雷紋，柄中部飾菱形紋，柄端呈矩形，飾蛙紋。

（翁善良）







一七八　鹿形帶鈎

戰國

長八·三厘米

一九六四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梅花鹿形，呈奔騰狀，鈎自鹿頭下側伸出，呈獸頭形。此種形狀的帶鈎，在四川地區爲首次發現。

一七九　嵌錯犀牛帶鈎

戰國

長二三·五、寬九·四厘米

一九五四年四川廣元昭化寶輪院出土

四川省重慶市博物館藏

犀牛形，鈎端爲獸首，一端與犀鼻相連。通體嵌錯卷雲紋。造型生動，製作精美。

（曾凡模）

一八〇、一八一　方印

戰國

高一·四、寬三·五厘米

一九八〇年四川新都馬家鄉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印背微拱如覆斗，中爲鋬鈕，四周飾饕餮紋，極精。印文爲一組巴蜀圖語：其上部與該墓出土銅器上陰刻的特殊符號相同，下部兩側各立一人，似伸手相握，二人之間置一罍。兩人上方又各有一口嚮上的鐸。該印的精美與完整、包涵內容之廣泛，在四川地區出土的巴蜀銅印中是絕無僅有的。







一八二、一八三　印

戰國

直徑一・七—四・三厘米

一九五四年四川廣元昭化寶輪院（上排右、中）、一九五五年四川巴縣冬笋壩（下排）出土

四川省重慶市博物館藏

這組圓形、方形、長方形的印章，均出自船棺葬中。印鈕分爲瓦鈕和鼻鈕兩種。印文均爲巴蜀符號，包括心形、王形、勾雲形、半月形、星形等等，也有漢字混雜其間，如田字。這是先秦巴蜀地區特有的一種圖語符號，廣泛使用于印章和兵器紋飾上。

（曾凡模）

一八四、一八五　虎鈕錞于

戰國

高四七、口徑一四・七厘米

一九七二年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橢圓形，頂平有沿，翻唇。鈕爲一張口呲牙、翹尾欲撲的猛虎，極爲生動。虎身飾卷雲紋。器身爲素面。巴蜀銅器多繪有虎紋，錞于則具虎鈕，可能與文獻記載的巴族以白虎爲圖騰的傳說有關。

一八六　虎鈕錞于

戰國

高五五・一、口徑三二・五厘米

一九八九年四川彭山同樂鄉出土

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隊藏

橢圓形，有沿外侈，短頸廣肩，上腹略鼓。虎形鈕，飾雲雷紋。

（翁善良）



一八七　王紋鉦

戰國
高二九厘米
一九七二年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鉦柄爲八棱形，衡部飾圓渦紋。鉦身橢圓，兩銑下垂，一面飾巴蜀符號，其間并列二篆文『王』字，另一面符號已銹蝕不清。

一八八、一八九　虎紋鉦

西周
高四二厘米
一九五一年四川廣漢徵集
四川省博物館藏

橢圓形鉦，陰刻一張牙舞爪的猛虎，虎尾上卷。虎背上方飾三星，星下飾四葉紋及巴蜀符號。圓柱形長柄，有八棱。柄端較大，呈扣形，飾漩渦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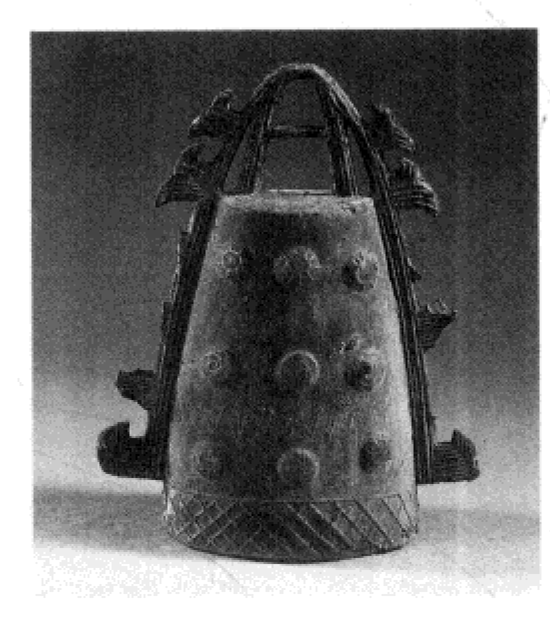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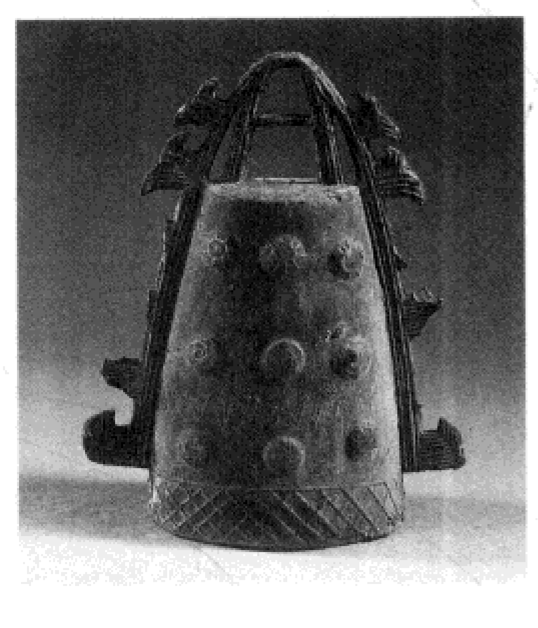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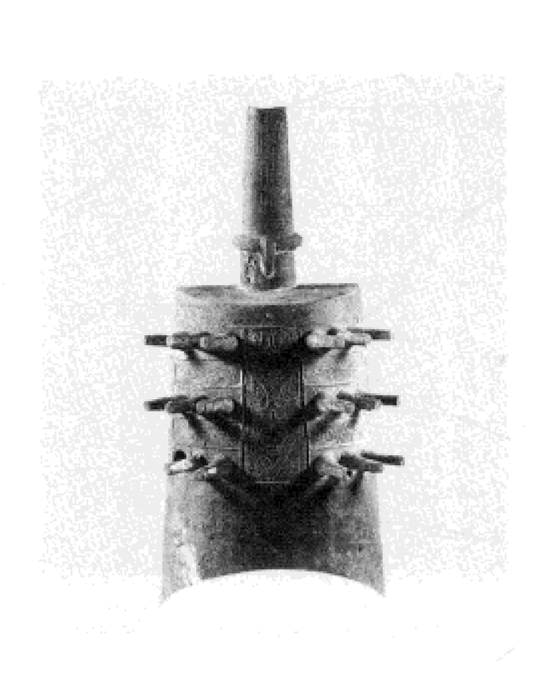


一九〇、一九一　龍紋鎛鐘

戰國
高二六·三厘米
一九九二年四川茂縣牟托村出土
四川省茂縣羌族博物館藏

幾何形鈕，有六個長方形孔。鐘兩側各有六個魚尾狀脊飾。鐘體正面陰刻一條翼龍若飛，龍背上馱一座山。背面飾陰刻圓渦紋、四瓣花紋及十字紋，中心有一微凸的橢圓餅狀枚。

（蔡　清）　攝影　孫之常

一九二　太陽紋鎛鐘

戰國
鈕高四·七、鐘高一三、通高一七·七厘米
一九九二年四川茂縣牟托村出土
四川省茂縣羌族博物館藏

橋形鈕，鐘兩側各有六個魚尾狀脊飾與鈕相連。兩面有三排九個圓餅狀枚，第一排飾太陽紋，第二排飾圓渦紋，第三排飾太陽紋。二、三排之間飾單線水波紋。鼓部飾網狀紋。

（蔡　清）　攝影　孫之常

一九三　蟬紋鐘

戰國
高五二厘米
一九九二年四川茂縣牟托村出土
四川省茂縣羌族博物館藏

甬爲橢圓柱形，甬下部有旋干。兩銑下垂，口不平齊。鉦正面有柱狀枚三排九顆。鉦部飾蟬紋、雲雷紋及竊曲紋。背面有柱狀枚三排八顆，無紋飾。

（蔡　清）　攝影　孫之常

一九四、一九五　編鐘

戰國
最大者高二七·五、銑間一九·五、于寬一四·三厘米
最小者高一四·六、銑間六·五、于寬五·四厘米
一九七二年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該套編鐘共十四個，大小依次遞減。長方形鼻鈕，兩銑下垂，口不齊平。舞部飾雲紋、雷紋，篆帶飾渦紋，鼓面飾蟠虺紋。篆帶上下及兩篆間各有渦紋鐘乳，分四區三層，共三十六枚。甬、衡飾三角紋與渦紋。舞部及枚間有剔鑿的槽，有的透空。其中八個編鐘的鉦、于、銑部有錯金紋飾。

圖一九四攝影　王　露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ISBN 7-5010-0773-X
9 787501 007738 >

文物出版社